

陈云在江西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前 言

陈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在70余年的革命活动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云曾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战斗、工作过。在这期间，他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党团书记，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夏，他负责领导中央苏区的军需生产。在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陈云做了大量经济、工会和白区方面的工作，积累和总结了苏区工作的丰富经验，撰写、发表了许多有关苏区工人经济斗争和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等方面的重要文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及苏维埃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随红五军团长征。

建国以后，在50年代末，陈云曾来江西视察军工生产，关注江西经济建设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下放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他身处逆境，却不顾年老体弱，不避冬天严寒和暑天炎热。除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外，还深入其他工厂、学校、农村，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教学改革等情况。他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处处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处处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给江西人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赢得了江西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为了帮助人们了解陈云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坎坷而多彩的历程，学习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实事求是的崇高品质，关心群众。严于律己的思想作风，坚持原则的领导艺术，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做好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写和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指示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江西锅炉化工石油机械联合公司党委，将已征集到的史料加以整理研究，编写了《陈云在江西》一书。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发行，对于继承、发扬无产阶级革命传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是十分有益的。

《陈云在江西》一书，主要收录了反映建国前后陈云在江西战斗、工作和生活的纪实、回忆文章，同时还附有陈云在江西大事记和3篇研究陈云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生平和思想的论文。鉴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编纂中，有关单位和地、市、县（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提供了文字、图片等资料，中央文献出版社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云在江西

风雨人生路——陈云在江西苏区纪实

1933年1月，参与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作的陈云，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次年10月，他率领红二军团十三师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江西近2年的时间里。陈云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联羊群众，忘我工作，用辉煌业绩铸造了一座座丰碑，也展示了这位伟人的夺目光彩。

初露锋芒

1月的江西，天寒地冻，北风怒吼，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1933年的1月，28岁的陈云，穿着一身简陋的衣衫，满怀着一腔热血，踏上了江西的土地。

对陈云来说，江西并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多少年来，他一直寄予向往与崇敬。

他知道，早在20年代初期，当中国共产党人刚刚走上政治舞台、全国革命运动尚未形成燎原之势的时候，江西的安源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全国树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鼓舞。1922年9月，李立三、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安源成功地领导了1万多人参加的工人斗争，使安源成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也使安源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他还知道，事隔5年之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代英豪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全国人民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之后，江西成了红军的摇篮、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场。

陈云更知道，紧接着南昌起义，毛泽东在江西发动了秋收起义。随后，会同朱德、陈毅、彭德怀等杰出的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发展了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为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树立了典范。不久，他们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燃向江西的南部和福建的西部，缔造了全国最大的根据地，建立了全国苏维埃政权。如今，中共一代要人正在赣南坚持着艰苦卓绝的苏区斗争、抵抗着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进攻。

“十几年来，江西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壮剧，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期望。”陈云疾步走在赣南山区的崎岖小道上，用爱慕的眼光抚摸着路旁的一草一木，流露出对江西这块多彩、辉煌的土地敬仰之情。

一到江西，陈云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身分，立即投入紧张的职工运动。他下基层，进工厂，听取反映，了解情况，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

几天下来，喜中带忧的苏区职工运动的情况，陆续汇集到陈云的脑海。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毛泽东、朱德等艰苦努力，中央苏区的职工运动初具规模，不仅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还开展了不少斗争，取得了足以令人鼓舞的成绩。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苏区后，江西苏区的职工运动更是如虎添翼，获得蓬勃发展。苏区的职工运动同苏区的其他工作一样，“也明显地打上了

‘左’的或右的烙印，存在着让人担忧的现象”。陈云在深入职工、深

入基层中了解到，不少地方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不从实际出发，机械地抄搬别地方的做法，推行过“左”的工运政策。有些地方，又忽视职工的积极性，忽视职工的基本要求，对职工运动冷漠，表现出右的倾向。“左”的和有的错误，导致有些地方的工会工作冷冷清清，处于落后状态，也引起了不少职工情绪上的波动，妨害职工运动的发展。

陈云列举了苏区职工运动中各种各样“左”的倾向：

盲目地搬用只适合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堪承受而倒团；

不问企业的实际情况，机械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还实行青工6小时制，影响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不顾企业的吸收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造成企业负担过重；

把大城市总同盟罢工的做法，搬到苏区，危害苏区的商品流通。

陈云还开出了职工运动中右的倾向的单子：

不深入基层，不深入职工，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运动；

对蕴藏在职工之中的巨大政治热情，熟视无睹，不去积极领导工人运动；

忽视工人的合理要求，不注意改善工人的生活，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

不问各个企业、商店、作坊的实际情况，只是笼统地提出职工运动的要求与纲领。

职工运动中“左”的和右的不良倾向，令初入江西的陈云感到忧虑、焦急。他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进一步引导苏区职工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

决策果断、办事利索的陈云，说干就干。他周密安排，慎重部署，为纠正工人运动中的错误倾向而日夜操劳。

针对苏区工人运动中“左”的做法，陈云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他明确地指出：“这些做法，只能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运动，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在他看来，苏区中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抬高物价，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无不和职工运动中“左”的错误有关。

“职工运动中有的错误倾向，必然妨害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妨害工人和工会之间的联系，造成苏区工人运动缺乏生气，无法深入发展。”陈云同样抨击了有的做法，剖析了它给职工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

长期从事职工运动，对职工运动有着深厚感情以及丰富领导经验的陈云，不仅分析了影响苏区职工运动健康发展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并且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左”、右两种倾向的正确意见。

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人运动时，特别注重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基层的工人群众经常看到陈云削瘦、矫健的身影。他身着一套粗布衣服，头戴一顶帽子，脚着一双布鞋，奔波各地，指导地方上的工运，帮助整顿、健全各级工会组织。

那时，战争频仍，供给困难，工作、生活条件极差。一段时间下来，大家注意到，本来体质就不很好的陈云，身子显得更加单薄。不少人劝陈云注意休息，不要把身体拖垮了。可是，陈云总是笑着加以婉拒。他依然不分白天、黑夜地深入工厂、职工之中，一心扑在职工运动上。

江西苏区职工运动的航船，经过陈云等人的努力，校正了航向，朝着胜利的彼岸驶去。整天操劳、全心投入的陈云，此时也在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在江西苏区，陈云初露锋芒，显示了领导职工运动的杰出才能，给苏区

广大工人群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声誉鹊起

赣南的4月，春暖花开，万物生长，处处透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给苏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纯朴、勤劳的农民群众珍惜时光，忙于插秧、耕地，决心夺取农业丰收，支援前方多打胜仗。刚刚从前线凯旋归来的红军指战员，来不及脱掉沾满尘灰的军装，忙着帮助群众劳动。广阔的田野里，一派繁忙、喧闹的景象。

4月的一天，阳光灿烂，微风阵阵，又是一个明媚的春日。然而，此时的陈云，却双眉紧锁，一脸愁色。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抽着劣质的卷烟，双眼凝视着窗外，苦苦思索着发展苏区经济的对策与办法。

陈云来到江西苏区，转眼已经过了3个月了。这段时间，陈云在指导职工运动的同时，也接触到了根据地内开展经济斗争的不少情况。

陈云了解到，由于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以及猛烈发展的革命战争，迫切要求苏区军民开展经济战线上的斗争，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只有具备宽裕的物质条件，才能支持长期而残酷的革命战争，才能改善军民的生活。”工农出身的陈云，对物质条件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始终认为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斗争，离不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

陈云也了解到，根据地的经济斗争还存在不少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经济斗争的深入进行，必须坚决予以纠正。“错误的路线不能和正确的路线并列，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不去除，经济斗争无法正常开展。”在斗争实践中，陈云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始终旗帜鲜明地加以识别和抵制。

苏区的经济斗争存在着哪些不良的倾向，它们对经济工作在哪些危害，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根源是什么，应该如何领导经济斗争，怎样才是发展苏区经济的正确方式与战术？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陈云的脑际，引起他的苦苦思索。

有时，他也到群众那里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与要求。间或，找各种类型的干部座谈一下，广泛听取反映。

多年来的革命生涯，养成了陈云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那就是，遇上什么难题，一方面走到群众中去，从那儿获得启迪寻找方法，另一方面自己坐下来冷静地思考，从中谋求解决难题的途径。每当思考问题时，陈云总是离不开纸烟。随着烟雾的慢慢吐出，头脑中的思路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陈云决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苏区经济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认真的探讨，从而为苏区的经济斗争提出兴利除弊、中肯实在的意见，也为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花了几天的时间，陈云写成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久，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权威报刊《斗争》第9期醒目地登载了陈云的这篇文章，它在苏区党政机关和广大军民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争着阅读陈云的文章，还纷纷议论开来。有的说，陈云的文章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既富有哲理，又符合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有的称赞道，陈云的文章批判了经济斗争中的不良倾向，剖析了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原因，必将使经济工作中的工团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

无地容身。也有的说，《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提出了正确的苏区经济斗争的方法，揭示了发展苏区经济应采取的策略，是一篇难得的、很有指导性的文章。

这篇文章，如一股徐徐清风，使各级领导的头脑更加清醒。它又如一帖强心剂，给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陈云的努力下，江西苏区的经济工作有了新的起色，获得了新的发展。

陈云的文章，也引起了中共决策者的极大关注。3个月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对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全面的要求。次年1月，毛泽东另一篇重要文章《我们的经济政策》问世，明确阐述了苏区经济工作的各项重要政策。从此，江西苏区经济斗争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自己的艰苦努力，得到了干部、群众的承认，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花呀！”听了干部、群众的种种议论，陈云的脸上再次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也把连日来的劳累忘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陈云初步显露出指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干，这不仅使他在根据地声誉鹊起，也奠定了他成为中共经济专家、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的基础。建国以后，陈云领导经济建设的辉煌业绩，他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非凡贡献，都与他早年在江西苏区接触经济斗争，获得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感性认识有着渊源关系。

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

陈云不远千里地由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他身在江西苏区，心系全国的白区工作，精心指导着这一条特殊战线的斗争。

提起陈云领导白区工作，苏区人民并不生疏。他们知道，陈云富有传奇色彩的早期经历，是和白区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漫长的革命生涯，也是从白区工作开始的。苏区人民可以如数家珍似地，讲出陈云从事白区工作的一连串光辉业绩。

发生在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以及8月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大罢工，处处都可见到陈云那敏捷的身影。当时，他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领导全馆职工参加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也就在1925年，周恩来结识了陈云，对这位比自己小7岁却富有斗争经验的工运领导人倍加赞赏，高兴地把 he 介绍到了党内。此后，陈云成了一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白区工作。也在此后，历史把周恩来、陈云这两位伟人的名字紧紧地系在一起。

在著名的上海三次武装斗争的史册上，也深深地镌刻着陈云的业绩。1926年10月至次年3月，他参加了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在那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陈云不顾个人安危，战斗在第一线，为工人群众作出了榜样。

大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汪精卫篡夺之后，陈云担负了许多重要职务，在更险恶的环境里继续为白区工作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从1927年秋至1931年春，他先后任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

委书记等职，为党的白区工作呕心沥血，战斗不止。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把陈去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在更广阔的白区工作领域里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在1931年1月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央特科书记，9月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成员，翌年3月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陈云有着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白区工作也构成了他辉煌人生的重要一页。

进入江西苏区之后，陈云依然念念不忘白区工作，依然念念不忘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党员和群众。每次白区工作的同志来向陈云汇报工作，他总是认真听取。然后，耐心而又明确地加以指点，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向他们传授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陈云还制定了白区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斗争策略，引导白区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有一个时期，陈云得了感冒，整天咳嗽，并伴有低烧。

幼年的贫困生活，使陈云的体质先天不足，一开始就很差。投身革命后，陈云工作十分劳累，生活条件又极其恶劣，以至后天失调，使本来就差的体质宛如雪上加霜。所以，陈云常常诙谐地把自己的身体比喻为一辆“木炭汽车”，随时随地都会抛锚，出故障。感冒、伤风，是陈云常患的疾病。

战友们看到陈云又感冒了，都劝他好好休息。可是，强烈的责任感驱使陈云振作精神，抱病工作，仍然热情地向白区来的同志指点工作方法，传授工作要领，帮助改进工作。

“在建立白区党组织时，要注意培养当地的干部。”这是陈云指导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

陈云认为，当地干部更加了解那里群众的情绪、呼声与要求，更加熟悉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便于在白区隐蔽立足、开展工作。这一切，都是外来干部所不能比拟的，也是他们通常所缺少的。因此，要设法培养群众自己的领袖，让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陈云提出，对当地干部的培养，应在日常工作中进行，也可以组织他们到苏区接受短期培训。

陈云向白区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发动、领导白区群众开展斗争时，既不要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又不要放过每个机会提高他们的斗争勇气和政治觉悟。

“提出过高的要求，容易脱离群众。不善于抓住斗争的机会，无法提高群众的觉悟，无法让群众得到锻炼，从而不断提高斗争的水平。”陈云不厌其烦地揭示白区工作的这一重要原则。

陈云还主张，应该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反日、反帝的斗争，把更多的群众争取到苏维埃旗帜之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把战火烧到中国，在我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大肆进行法西斯的侵略。为此，富有爱国主义热情的陈云明确指出，白区的党组织应在群众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恶面目和豺狼本性，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抵制，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把群众吸引、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运用秘密的工作方法，密切与群众打成一片，紧紧依靠群众作好各种形式的掩护。”这是陈云指导白区斗争的又一重要思想。

陈云始终认为，白区工作有着和根据地斗争不同的特点，应该有着不同的斗争方式。“秘密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陈云还认为，苏维埃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方向，白区工作要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

对于国民党士兵的工作，陈云也极为重视，认为它是白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防止白区党组织的忽视。

陈云经常告诫白区工作的同志：做好白军士兵的工作，既可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壮大红军的力量，也可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动摇南京反动政府的统治。

陈云还要求各级党组织，经常讨论、检查白区工作，给白区工作以具体、切实的指导，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以供其他地区借鉴。

陈云还提醒白区工作的同志，必须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斗争方针，以便灵活、有效地开展工作。

在江西苏区，陈云提出的白区斗争策略，指导着全国白区工作的正常进行，也得到了党内的高度赞扬。1933年2月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专门安排陈云作白区工作的报告。12月，中央将陈云撰写的《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在党的刊物上全文发表。次年6月，中央又把陈云撰写的《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为前言。收入编印的一本小册子，向全党广泛介绍陈云的白区工作策略思想。

陈云不愧是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为白区工作的深入发展创造了卓越的功绩。

解剖麻雀

6月的南方，已进入盛暑季节。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滚烫。在骄阳的肆虐下，常给人以闷热、难受的感觉。

一天，陈云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又沉到基层调查研究，解剖麻雀。

进入江西苏区后，陈云发现不少地方在领导当地工人与雇主订立劳动合同时，往往照抄照搬，千篇一律，既没有地方特色，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结果，合同书成了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执行。

“问题的症结何在，怎样来纠正这个弊病？”对工作一丝不苟、求真务实的陈云，打算挤出时间，到基层作一番调查、了解，然后和基层的同志一起探讨解决的办法，并以此为典型加以推广，引导这项工作在苏区正常开展。

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向工农群众请教，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成了陈云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无论在白区工作还是在苏区工作，陈云经常一头扎到群众里面，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开展调查与研究，进而取得工作的发言权和领导权。这次，签订劳动合同遇到问题时，陈云首先想到的是，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用以点带面的办法来解决难题。

陈云戴了一顶草帽，挎了一个小包，独自走在崎岖曲折的小道上。一路上，热风拂面，酷暑难当。在烈日下，陈云汗流满面，衣衫也湿了大半。一到基层，陈云顾不上抹去脸上的汗水，立即出现在工人中间。

陈云来到一家经营南北土特产的食品杂货店。找到两位党员工人，向他们了解该店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陈云问得很细，也记得很多。

“南北土特产经营的情况如何，有多少利润？”陈云浓重的上海语音，在两个党员工人的耳边响起。

两位党员虽说是第一次和陈云见面，但对他的情况还是略知一二。

他们知道，陈云是党内的一位大干部，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两岁丧父，4岁丧母，从小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陈云待人和蔼，作风正派，工作认真负责，很有领导才能，在全党都有很高的威信。

两位党员还知道，陈云经常深入基层，是工人群众的知心朋友，得到工人群众的广泛爱戴与拥护。

长年累月在基层工作的两位党员工人，没见过职务很高的领导干部。如今，陈云来到食品杂货店找自己了解情况，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他们拘谨地望了望陈云，又互相注视了一会，嘴里说不出什么。

“有多少就谈多少，说错了也没关系。”陈云亲切、随和地说。

没有一点干部的架子，待人是那样的诚恳、热情。在陈云再三启发下，两位党员的拘束、不安的心理渐渐消除。

“上半年食品杂货店签订的合同，是否每一条都实行了？”“工人对于下半年订立劳动合同的意见与要求是什么？”“怎样才能确保合同的兑现？”“工人对于5月1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态度如何？”把两位党员的话引出后，陈云又提出了这样一连串的问题。

陈云性格内向，平时言语不多。然而，在和群众一起时，却善于循循诱导，启发他们打开话匣子，谈各种情况。有时，陈云自己也会幽默地说上几句，或者插上几句话，使群众越加产生亲切感、信任感。

陈云不停顿地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他一边问，一边在脑中思考。不一会，陈云对企业的情形，对工人的情绪以及签订合同的原则与要求，有了一个大致而又清晰的轮廓。

“还应在党的支部中作广泛的调查，以掌握更多的情况。”陈云和两位党员工人告别后，在路上又思考着下一步的工作。

随后，陈云接连3次召开支部大会，组织党员讨论劳动法草案的精神，讨论各店签订的合同条文，讨论工人对合同内容的意见。

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几个党员围坐在陈云旁边，争先恐后地讨论着，还不时引起争论。讨论一次比一次热烈，气氛也一次比一次活跃。听着大家的发言，望着一张张纯朴的脸庞，陈云也在脑海中把工人党员的意见加以梳理、分析、归纳。

太阳渐渐西斜，四周的农舍冒出了缕缕炊烟。晚霞映红了西边，也把余辉撒进了屋内。大家围着陈云，忘掉炎热，忘掉疲劳，还在兴奋地谈论着。有时，陈云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插上几句风趣的话，使讨论的气氛更加活跃。

经过多次讨论，陈云不辞劳苦，开始动手草拟一份合同式样。

南方的夏夜，不仅受到酷暑的煎熬，而且还备受蚊虫的骚扰。在一盏小油灯的弱光下，陈云伏在小方桌上，认真地、逐条逐句地拟写草案。他一面不停地写，一面用扇子拍打蚊虫，驱散炎热。

第二天，陈云带着拟好的合同草案，又跑到支部那儿，要求每个成员到各店征求工人对草案的意见。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加以讨论通过。陈云办事最忌草率、马虎，凡经手的事都要办得十分妥贴、十分完满，这回也不例外。

在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供各食品杂货店参考的合同书。

陈云亲自拟定的合同书，文字简练、条文明确，共9款、500多字。它没有重复《劳动法》上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处处体现了食品杂货行业的实际情况。

“这个合同书，很实际，很管用，会受到工人群众欢迎的。”一向自信

的陈云，对这个合同书也十分满意，认为它来自于群众，来自于基层，符合实际，符合食品杂货行业的特点。

陈云拟定的食品杂货业劳动合同书，内容明确，操作性强。适合订立劳动合同的要求，很快被中央向各地、各行业推广。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还全文登载了陈云拟定的《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介绍食品杂货业合同书形成的过程以及合同书的全部条款。

看到自己辛勤的工作成果被组织充分肯定，对各地签订劳动合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陈云的脸上荡漾着欣慰的笑容。

陈云为江西苏区做出了又一重要贡献，他的杰出才华又一次被记载在苏区历史上。

诲人不倦

盛夏的一天，骄阳似火，烈日炎炎。正在和基层干部交谈的陈云了解到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

有一位巡视员，在农业工人工会任职，曾先后在一个县的两次基层工会负责人会议上作报告，都引起了不好的反应。第一次是在一个区的农业工人工会负责人会议上作长篇报告，足足讲了好几个问题。第二次是隔日在城市杂货工会和屠宰工会负责人会议上作报告，一口气又讲了几个问题。

在第一次会议上，工人讨论时很少发言，“空空洞洞地讨论了巡视员的报告。”第二次会议，工人对巡视员的报告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很爽快地反对了这个报告。”

为什么这个巡视员的报告不受工人的欢迎，而且连续遭到他们的一致抵制，是工人的觉悟太低还是他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有问题，怎样帮助他总结教训，提高领导艺术，增强工作能力？

细心的陈云苦苦地琢磨着，还找人详细了解了那两次会议的情况。

那几天，高温依然肆虐于赣南地区，烈日烤得大地也直喘气。陈云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短衣衫，分别找了那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把两次会议的来龙去脉弄了个一清二楚。

第一次会议，是一个区的农业工人工会支部书记联席会。本应有8个支部的书记参加，实际上只来了5人。会议一开始，巡视员作了报告，讲了支部的7项工作。

一是加强查田运动；二是扩大工人武装；三是经济动员，要求工人无偿退还向政府购买的公债券以及借给红军的谷子券。以支援革命战争；四是发展农具生产合作社；五是组织犁牛站，解决部分农户缺乏耕牛、农具的困难；六是发展农业工人工会组织，健全党的支部；七是统一工会经费收支。

“希望大家讨论支部的7项工作，发表各人的意见。”巡视员满头大汗地讲了支部的一大堆工作后，要求大家表态给予支持。说完，他坐在那里，悠然自得地等待支部书记发言。

出乎巡视员意外的是，与会者态度冷漠，很少发言。隔了很长的时间，才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饭吃，怎么办？”

也有人不悦地说道：“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工人可以免缴土地税。可是，我们这个区还照收不误，该怎么办？”

“……”巡视员对支部书记提出的问题，茫然不知，无从回答，只得吱

吱唔唔，闪烁其词。他不仅回答不了，而且还不让工人讨论这两个问题。

工人是很讲实际的。既然对工人的切身利益不加关心，那么，只好消极应付，空洞洞地议了议巡视员的报告。随后，大家不欢而散。

巡视员参加的第二个会议，是城市杂货工会支部和屠宰工会支部的全体成员联席会议。他丝毫没有吸取先一天的教训，一到会又作报告，讲了3个大问题。

一是过去经济斗争中“左”的和有的问题；二是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三是在工会和政府工作的人员取消他们的长期工资。

报告时，巡视员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神气十足。可是，会场上的气氛却并不很热烈，工人的反应也很冷淡。

“停止向雇主介绍失业工人，那么，他们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在工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被取消长期工资，那么，他们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城市工人比农业工人更敢于说话，敢于提出意见。自然，这次会议的火药味比先一天还足。巡视员一作完报告，工人们就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长串问题。

“这个，那个……”巡视员更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又一次给搪塞过去。

最后，只能是毫无结果地宣布散会。

陈云听了情况介绍之后，细细思忖着：“从工作热情来说，这个巡视员不算很差，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工会干部。但是，为什么他在两次会议上不受欢迎，他存在什么问题而导致两次会议都遭到失败，他有哪些地方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呢？”

进而，陈云还联想到，近一二年来，苏区得到很大的发展，各地、各部门补充了不少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来自于工厂和农村，都有一股子想把工作做好的热情。然而，由于缺少培训与锻炼，不少干部不太懂得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更缺乏工作艺术。因此，虽然他们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往往效果并不很好。那个巡视员的遭遇，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应该帮助那个巡视员懂得不受欢迎的原因，从而改进工作，提高领导群众、为群众服务的本领。”陈云的眼前似乎展现出动人的情景：辛勤工作在各地的基层干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和群众紧紧贴在一起，到处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陈云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着手剖析这个巡视员在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上所犯的致命错误。

“出席会议前毫无准备，只是仓促上阵。”陈云认为，巡视员在会前应对工人有什么要求，有哪些愿望，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所了解与掌握，作好应有的准备。可是，那个巡视员却胸中无数，毫无思想准备。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在两次会议上布置了一大堆任务，提出了种种要求，根本不和工人的情绪、思想和生活结合起来。其结果，必然招致工人对会议的抵制。

思维敏捷、讲究实际的陈云，还在继续剖析：“在会上不分轻重、不分先后他讲了一连串的工作。叫工人无所适从，只好消极应付。这是他所犯的第二个错误。”

在第一次会议上罗列工会的7项工作，到底哪些工作是和工人有关的，哪些工作是紧要的，不能拖延，又有哪些工作可以缓一缓，巡视员分不清楚。在第二次会议上，又不分主次地一口气布置了三大任务。“这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工作方法，不是好的有效的方法，应该坚决反对，在实践中加以克服。”

陈云指出的那个巡视员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

起。”从基层提拔到领导岗位的陈云，最了解群众，摸清了群众的脉搏，掌握了群众思想活动的轨迹。他始终认为，一个干部在开展工作时，关键是要提出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时，陈云喝了一口茶，脑中想起了一个通俗的譬喻：一个锁着的大门，只有用钥匙打开铁锁才能进去。工人愿意做工作，就是那把铁锁。不从他们需要的事做起，我们就进不了大门，也无法完成各项任务。“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联系那个巡视员在两次会议上的表现，陈云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他不受群众支持的症结所在。

“缺少具体的方法，把握不住群众的情绪，是做不好工作的一个容易犯的毛病。”陈云还在认真地分析那个巡视员在领导方法上所犯的错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经验，明确指出：“只有具体的细心的领导，才能推动支部工作而获得成效。”

这时，大地沉睡，夜深人静。一轮明月高悬空中，四周涂满了银辉，操劳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陈云的窗户，还透出一丝弱光。

陈云从桌边站了起来，在房内来回踱步，他的思路，依然是那样的清晰、明朗：“要让更多的干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提高工作能力，从而为江西苏区多做贡献。”陈云想得很多，想得很远。

不久，陈云结合那个巡视员的实例，在党的刊物上撰文，建议发起关于领导方法的大讨论，借此帮助各级干部学会工作方法，增强组织、领导能力。

在党的刊物上，陈云还全面、透彻地分析那个巡视员在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以及产生的原因。同时，也给予热情的勉励，希望他在困难面前不要失望，要继续努力，取得更好、更大的成绩。

陈云的倡议，在江西苏区引起极大的反响。许多干部纷纷响应号召，在改进工作方法上狠下功夫，在提高工作能力上刻苦磨练自己。

由于陈云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没有很长时间，干部队伍的素质有了提高，不少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获得长足的进步。

这一切，江西苏区的干部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会始终刻骨铭心的。

文武双全

1934年9月初，立秋已近一个月的江西南部，气温还是居高不下，依然酷热难当，令人烦躁。然而，此时更让人心烦不安的，还是前方接二连三传来的不利消息。

这几天，陈云一直在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惦记着前方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红军将士。但是，听到各方面汇总的消息，却越来越让陈云焦虑、烦恼。

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下了最大的赌注，不惜孤注一掷。

他从四面八方调集了100万军队，其中用50万对付中央苏区，妄图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来压垮工农红军。

他不惜重金聘用一大批外国军事专家，充当向苏区军事进攻的智囊和参谋。

他不顾财力状况，运用大量国外贷款购买各种新式武器、装备，进攻苏区的各路军队。

他接连举办了3期“军官训练团”，把近万名军官送到江西庐山，强制

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蒋介石磨刀霍霍，虎视眈眈，大有一脚把苏区踩平的架势。

然而，来自苏区内部的消息，更让陈云揪心、焦虑。

“左”倾错误在江西苏区开展的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挫伤了一大批干部的积极性，使错误路线更加为所欲为、凌驾一切。

在历次反“围剿”中屡建功勋的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近10万人马的红一方面军顿失主心骨和掌舵人。

临时中央一开始就提出两个拳头击敌的错误主张，造成红军兵力分散，过分疲劳，也失去了极为宝贵的准备反“围剿”的时间。尔后，又接连不断地瞎指挥，使中央红军越来越被动，江西苏区也越来越缩小。

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打仗的军事顾问来中央苏区，对中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给第五次反“围剿”增加了新的困难。

种种消息表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更加艰难，越发引起陈云的忧虑。

游击区传来的消息，也不容乐观，同样让陈云忧心忡忡、坐立不安。

有的游击区缺乏党的组织与领导，处于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状态。

有的游击区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只有少数武装力量单枪匹马的军事活动。

有的游击区一味追求单纯、消极的坚壁清野，没有主动地出击敌人，始终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因为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不当，不仅使自身难以巩固、发展，也加重了中央红军的困难，加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陈云一直在思考着对中央苏区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游击战争的问题：“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当前游击区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改变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

连日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食不甘味，寝不成寐，两颊明显地消瘦，双眼也陷进了不少。

自去年1月进入江西苏区以来，陈云一直操劳不停，不是到下面检查、帮助工作，就是听取汇报，开会研究工作。加上生活条件极差，供给困难，还经常从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一部分支援前方。这样，陈云的身体一直处于较为虚弱的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早到晚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近几天，他又在为游击区的军事斗争操费心思。

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陈云仔细地研究着反映各游击区的材料。这是一间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民房，也是陈云的居室。靠窗放了一张小方桌，旁边是一张木床，桌上堆了不少材料，还放了一包烟。陈云正专心致志地阅看来自各地、介绍游击战争情况的书面材料。

不一会，陈云点燃了一支烟，凝视着窗外沉思。他一边吸烟，一边思索：“当务之急，应该向游击区提出正确的斗争方式。”陈云抬了一下头，又沉思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游击区域，同时也给中央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带来转机。”

陈云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和军事斗争接触不多，只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去年年初进入江西苏区后，如同进入了一所军事大学校，有机会了解、接触军事斗争的实践。同时，由于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因而对军事工作也获得不少发言权，成了一名既懂

文又懂武的领导干部。如今，他要运用正确的军事理论，结合江西游击斗争的实际，及时向各级党政军干部提出自己的建议，为挽救游击区的命运而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连日的深思熟虑，陈云草拟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意见书，对游击区的斗争策略提出了独特、精辟的见解。经中央同意，陈云的文章在苏区刊物上全文发表，登载在《斗争》第72期上。

陈云的文章，言简意赅，主题突出。它分析了游击区域的斗争现状以及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党组织在游击区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是专题论述游击战争的一篇好文章，也是游击区军民开展斗争的一篇好教材。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苏区广大军民被军事斗争连遭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游击区的斗争徘徊不前、处于低谷。陈云的文章，无疑成了很强的兴奋剂，极大地振奋了干部、群众的斗志。它也如同迷雾中的一盏灯塔，照亮了游击区军民前进的方向。

不论是红军指战员，还是地方上的干部、群众，对陈云的文章赞扬不已，眉宇间流露出对陈云文武双全的杰出才能的敬佩。

陈云的文章，没能挽救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悲惨命运。就在陈云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中央苏区成了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尽管如此，陈云的文章不失为一篇重要的军事文稿。

1934年10月，是江西人民世代难忘的日子。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告别了生死与共、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陈云也率领一支部队撤离了江西这块洒满烈士鲜血的红土地。

虽然陈云离开了江西，但是他在红土地上留下的闪光的足迹，留下的光辉的思想，以及他在红土地上创造的非凡的业绩，是值得江西人民永久地眷恋与怀念的。

（桂玉麟）

深深的情深深的爱——陈云关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工人纪实

1969年初冬，中国上空，乌云密布，寒流滚滚。陈云等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悄然离开北京，被迫“疏散”到江西。陈云被安排在南昌市南郊福州军区青云谱干休所。11月12日，陈云来到与居住地一湖之隔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现江西锅炉化工石油机械联合公司）“蹲点”。此后2年又7个月的时间。陈云的足迹遍布该厂的每个角落，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科室、车间、仓库、医院、学校及职工的家庭。他先后参加了200余次大大小小的会议，接触了各方面的人，而更多的时间，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他慈祥的目光，爽朗的笑声、高尚的情操、博大的胸怀，深深地印在工人人们的脑海里。他的谆谆教诲，亲切的关怀，殷切的期望，牢牢地铭刻在工人的心头。工人们每当谈及和陈云相处的日子，言语中总是满含着深情，满怀着敬意。

初到化工石油机械厂

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背靠浙赣铁路及南莲公路，面向滔滔赣江及南高（南昌至向塘机场）一级公路，北有江南名楼“滕王阁”，南有闻名于世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一湖碧水点缀其侧，一脉青山隔江相望。水陆交通便利，自然环境幽雅秀美。

该厂的前身是南昌新生汽车修理厂，1953年由南昌市公安局创办，原厂址位于南昌市闹市区邮政路2号。初创时只有十几名职工，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1958年根据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经江西省经济计划委员会的批准，将该厂迁往青云谱区现址，扩建为年产3万吨炼油、化工机械设备的通用机械厂。1953年底，基本完成迁厂任务。1959年6月，改名为江西新生通用机械厂，同年12月，江西省计划委员会报国家计委批准，定名为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1968年，该厂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编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基本上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1971年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划归地方管理。

从建厂开始，风风雨雨，几经变迁，工人们压根就不曾想过，有一天会迎来一位伟人，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陈云来厂之前，上级部门交待，不许暴露他的真实身分和姓名，只冠以“北京来的客人”，以免群众知道。然而，当陈云从那辆米黄色的华沙牌轿车走出来的时候，陈云来厂的消息便不胫而走。“陈云来我们厂啦！”先见着的人急切地想把信息和感受传给别人，尚未见着的人则焦急地盼望能早一点一睹这位伟人的风采。

时令虽然已是冬季，但大自然却不时透出点点春的气息。容器车间一位青年工人蓦然发现，金工车间东北边的几株桃树，枝头竟绽开了一朵朵鲜花。他惊喜地告诉同行的福建籍退伍军人老刘：“你看，桃花开了！莫不是大自然也有灵气，知道陈云来了？”老刘仔细看了一眼后含笑说，“也许是吧。不过你们江西地处亚热带，夏秋、冬春季节界限不分明。俗话说，‘十月小阳春’，农历十月，气温回升，桃花开放是有的，只是你过去没留心罢了。”

不管怎么说，一种不可言表的自豪感从工人们的心底油然而升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暖流在工人们的心中涌动。是啊，过去工人们只是从照片上看到过陈云的神采，从报纸上读到过陈云的文章，从广播中听到过陈云的讲话。那

时，陈云离得那么遥远，而今，陈云来到工人们中间，就在眼前，近在咫尺，怎么会不令工人们激动、联想呢？

班组里的中央首长

陈云听取厂情汇报之后，便径直深入车间、班组，到最基层了解情况。他先后到铸工车间木模二班、造型班，金工车间中车组、划线班、钳工班，容器车间划线班、装配班，机修车间机电班，锻工车间锻工班等许多班组参加学习，现场看工人操作，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促膝谈心。

1969年11月下旬至1970年2月，陈云大部分时间在铸工车间木模二班。陈云一到车间，首先看望工人，与每一位工人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参加工作时间，并要求班、排安排工作。望着这位全国人民深深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人们心里已是感慨万千，谁也不让他干体力活。于是陈云每天准时来木模二班参加学习。

陈云衣着朴素，冬天穿一件棉布军大衣，春秋着一身深灰色卡机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对工人非常随和，平易近人，说话实在，语言幽默风趣。和他在一起，工人们如同过节一样，心情轻松愉快。他初到一个班组，总是要工人们随便一些，不要把气氛弄得很紧张。一次，他问福建籍工人林久珍是哪人，小林心情紧张，竟错答成“江西莆田人”，陈云听后，哈哈大笑，拍着小林的肩膀说：“如果你是江西莆田人，那这里就是福建南昌市了。”几次类似的情形之后，工人们不再拘谨了，他们和陈云亲密无间，无话不说。陈云到哪个班组，那个班组就笑声不断，气氛热烈。工人们和陈云多相处一天，就多长一份知识，视野放得更远。

对工人提出的问题，陈云都及时答复，有些不便直言的，婉言回避，尽可能不使工人们失望。1970年他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回来，车间里有的工人同志向他打听会议有什么新精神，他马上说：“你们看报纸，报上都登了。”有的青年工人好奇地问他我国究竟有多少军队。他脱口而出：“七亿人民七亿兵嘛。”说完与工人们会心同声地哈哈大笑起来。

陈云在木模二班学习，正逢“斗私批修”的时候，每人从8岁讲起。他以班组普通一员的身分，先后讲了4次话。他讲了自己的出生地，讲了在商务印书馆的学徒生活，讲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讲了35年前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工作，讲了红军长征，讲了张国焘危害革命，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如何挽救革命，讲了对日作战，讲了解放战争，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工作，讲了第一汽车厂筹建……他衷心拥护毛主席，把功绩都归于党，归于毛主席。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不论到哪个班，他先要班长写一份全班同志的名单，然后逐个对照着问哪里人，哪年参加工作。第二次见面，他就能一个个叫出名字。有一次，离开锻工班一个多月后，回到锻工班来看望工人们。他一个一个叫着工人的名字，最后说：“还有×××、×××两位怎么不在？”大家都非常惊讶，65岁的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赶忙把这二位工人的去向告诉了陈云。

陈云平时与工人谈笑风生，爱和工人开玩笑，乃至根据工人的长相特征取个有趣的外号。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特有的沉默。每次政治学习前，两个敬祝是必不可少的。当大家挥动语录本“敬祝××副统帅身

体健康，永远健康”时，他保持沉默；开会呼喊“打倒×××”时，他一声不吭，眼神里流露出深深的忧虑。这沉默是无声的抗击，是启示，无声无息地感染、影响着工人。

工人们深深爱戴陈云。每次学习前，大家都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陈云乘坐的小车一开到车间门口，无须任何人招呼、组织，工人们自动排成行迎接陈云。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工人们铲去门口的积雪，清理通道，让小车直接开进车间。听说陈云要到农村了解情况，青年工人陈天赋悄悄地在家里精心做了个帆布小折椅，带进车间，送给陈云。陈云非常高兴地对人说：“我要把这只小折椅带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这是工人师傅给我做的。”锻工班学习的地方是集体宿舍，每逢学习，大家分坐在4张单人床上。工人们听说陈云要来参加学习，特地找来一把旧本沙发，修好后给陈云坐……陈云每到一个班组，这个班组的同志就为之自豪。在工人心目中，陈云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伟人，又是一位豁达、开朗、慈祥、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诲人不倦、胸襟开阔的长者。

谆谆教诲

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日子，给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他的谆谆教诲，令工人们水志不忘。

工厂要经常研究生产当时空气中火药味很浓，人们的神经都绷得很紧。谈运动，谈革命，谈路线，谈政治，千篇一律、众口一声。谁要是试图标新立异，越雷池一步，便有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被当做批判的“靶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抓生产却要担心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学文化、钻技术要冒“走白专道路”的风险。然而，陈云每到一处，就要讲生产，就要大家研究生产。有一天他找二位同志谈话，疑惑地问：“你们这里是否研究生产？我参加了73次会，没听你们讨论过生产问题。”他特别注意经济工作，经常提出有关生产方面的问题。在金工车间，他问中车组组长：“你们什么时候开生产会？”组长知道陈云问话的含意，为了不令他失望，只好含糊地回答：“我们一般晚上开会研究生产。”陈云马上认真地对组长说：你们哪天晚上开生产会，通知我一声，我一定来。

1970年5月24日，陈云参加容器车间划线班学习后说：“你们班的会开得很好，大家既谈革命又谈生产，既谈成绩又讲缺点。这样的学习会，我不是百分之九十五，也不是百分之九十八赞成，而是百分之百赞成。”他每到一个车间，总要了解生产组织、工艺、材质、牌号、性能以及操作时要注意的问题。他常对工人说：“不研究生产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不能一天停止生产。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只谈革命，不搞生产，那我们吃什么？”他在金工车间说：“职工学习结合业务太少。大破大立，要破也要立。立就是要搞生产，发展国民经济。”

要讲真话陈云与工人坦诚相见，同时要求大家也要讲实话、真话，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陈云问一位青年工人如何看“文化大革命”，那位青年工人不加思索地回答：“‘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陈云语重心长地说：“你讲的不是你心里想的话，青年人要讲真话，不要说假话。”那位青年工人承认自己确实不知道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话是从报纸上学来的。

增加工资一定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班里有工人向陈云面前抱怨工资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加工资。陈云开导大家说：“加工资要根据国家财力，要看生产有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了。比如一只茶杯五角钱，如果加了工资在同样的时间里还是生产一只茶杯，那这只茶杯就要涨价了。所以加工资后只有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2只、3只、4只、5只同样的茶杯，钱才不会贬值。”1971年2月在机修车间的机电班学习时，应职工要求。他再一次讲了工资问题：“战争年代，我们没有什么工资，大家都是吃大灶。1956年实行工资制度前，我带200名代表到苏联学习实行工资制的一些经验，了解工资制的具体做法。当时，我想通过工资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看来增加工资一定要根据国家的财力，要看经济是否发展了。”

浪费也是犯罪。陈云对企业中大手大脚的浪费现象很重视。一次他到容器车间，看到地上撒了很多电焊条头，便对陪同的同志说：“这太可惜了。能不能把这些电焊条头收集起来，加工成铁链条？”在机修车间机电班，他看到许多废弃的旧漆包铜线，很心疼。他问：“能不能造一台机器，将报废的旧漆包铜线一根根接好，拉细拉长重用？”听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仍不灰心，为此还专门到江西电机厂去了解过。他多次对工人说：“小偷、小摸、贪污，法律都可以管，铺张浪费几千几万法律管不了。要通过立法把浪费管起来。”“我们国家大，底子薄，要处处注意节约。”

革命没有到底的时候。在金工车间划线班，有的青年工人问陈云：“怎样才算革命到底？”陈云解释道，“没有革命到底的时候。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不能算革命到底了。比如你有了一顶帽子，后来看到一顶新的，比自己原来的好，又拿了一顶，这就有一个思想问题，一个觉悟高低的问题。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一个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差别。”

亲切的关怀

陈云对工人的劳动条件、身体健康、家庭生活非常关心。他到金工车间装配班看工人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很大，便提出：“你们这种装配方法太落后了。要改进，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他到锻工车间时提出：“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部行车，解决车间内的搬运问题。”看到车间的烟尘很大，对人的身体不利，便要求工人们把加热炉搞好，改善劳动环境。后来看到锻工车间的工人把落地行车造出来了，他非常高兴。

1970年底，厂里从山东买来一批苹果，挑选了一些送给陈云。他不肯收，说：“分给工人吃，吃的东西我有。”

在路上，每当看见厂里的工人，他都要司机把车停下来，招呼步行的工人上车。那个岁月，坐小轿车是普通工人不敢奢望的。

陈云在造型班时，发现别的工人都在学习，惟有一名老工人独自在一边劳动。陈云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学习，那位老工人哽咽着回答：“有人诬告我写反标，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云沉思良久，宽慰他：“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问题总会搞清楚的。”后来经过调查，问题被否定了。这位老工人满含热泪向陈云致谢。

陈云深入工人宿舍、职工医院，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去得最勤

的是职工食堂。他与在食堂用膳的工人亲切交谈，问工人吃什么菜，多少钱一份，一个月伙食费要多少。冬天还用手摸摸职工的饭碗，看饭菜是不是热的。还到售饭窗口看当日菜牌，关心花色品种多不多。1970年夏天，他在食堂蹲了半个月，参加炊事员的学习，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做炊事员的思想工作。有的炊事员反映，食堂工作难做，起早摸黑，饭菜不合胃口还要挨骂，待遇又低，不好请农民来干。陈云听后笑着反问：“农民掏粪种田，又请谁去干呢？”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关键是这个，还是个思想问题。以前打仗，我们的炊事员行军背米扛锅，一到宿营地，就动手挖灶做饭给战士吃，烧水给战士洗脚。现在和平环境，生活条件好了，但炊事工作少不了。车间工人生产很辛苦，要千方百计让他们吃好。要搞经济核算，价格要便宜，饭菜质量要好。”他勉励喻金生：“要安心食堂工作。厨师是一门很深的技术活，要好好学习。这是手工操作，一万年后还是要的。我这次带了个有13年资历的炊事员来，弄得菜口味也不见得怎么好，学习是没止境的。”

殷切的期望

陈云对青年工人寄予殷切的期望。当时的青年工人大部分是从学校分配进厂的，且大都有“红卫兵”的经历，相当一部分人单纯幼稚，热情冲动，容易盲从。陈云对他们身上的缺点多次进行善意的批评。这是充满爱心的批评，蕴含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期望。

1970年1月，陈云在木模二班对青年工人说：“你们以前都是红卫兵，红卫兵怎么样？”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大家，右手握成拳向上一挥，喊道：“冲啊！我就被游斗了好几回。你们大部分人是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国家培养一个中学生要花许多钱。”陈云站起身，两手拍拍口袋，接着说：“我两手空空，这些钱都是工人，农民的血汗。”尔后，他又说：“从过去的冲冲杀杀，到现在进工厂安心生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陈云教育青年工人要抓住机会多学习技术，掌握本领。1970年3月，他在金工车间划线班对青年工人说：“当学生的不能不加分析地批判分数挂帅。学生不好好学习，错过了机会，以后要学习就难了。你们现在年轻，不认真学习技术，错过了这个阶段，年纪大了再想掌握技术，难度就大了。”

副班长佟明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言，陈云听后鼓励她：“你谈得很好，你现在十几岁就当上了副班长，很有出息。”佟明受到巨大鼓舞，买了很多业务书籍看，工作积极肯干，年年评为先进生产者，自学外语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后来调到学校任外语教师、华侨商场任干部。

陈云调查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历史和现状后，再三说：“你们厂设备不错，生产搞不好不应该。”他在金工车间划线班对青年工人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个厂，像你们这样规模的厂，上海也不是很多的。你们金工车间机床种类多，设备齐全，上海以前不少工厂没有电动设备，工人生产时只得用手摇，用风车来代替电动机。”

告别

1972年4月19日中午，陈云的秘书肖华光骑自行车从东大门进厂，告诉该厂负责接待陈云的同志：首长要回北京了，已定好22日的火车。

第二天上午8时，陈云准时到厂，先找到厂领导张守信、李健、李彪，就如何办好这个厂谈了许多宝贵意见。随后，他到各个车间与工人告别。

工人们一听陈云要回北京，一下子都围了过来。陈云与工人们一一握手，“谢谢工人师傅们，我要回北京了，再见了。”握着陈云的手，望着他那稀疏的银发，慈祥的面容，工人们的心头陡然产生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依依惜别之情越聚越浓。大家不知说什么好，百感交集，千言万语，都汇成同一句话，“祝首长身体健康，一路平安。”

陈云走到哪里，那里就掀起一股感情的波澜。有的工人跟着陈云，走过一个车间又一个车间。“再见，再见……”带着工人们深深的祝福，深深的情谊、深深的爱戴，陈云离开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他把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留给了工人，他的谆谆教诲、亲切关怀、殷切期望成为激励工人们不断向上的巨大力量。

（祝国仁）

廉洁自律与关心群众的楷模——陈云在青云谱干休所纪实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在“文革”中被下放江西，在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现江西省军区第一干休所）居住了2年又7个月。这是一段令人值得回忆的历史。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干休所接到江西省革委、省军区通知：从北京来的一位叫陈元方的人到干休所居住，要求做好接待准备工作。翌日，省军区派人来到干休所布置接待工作。经商定住干休所中区八号房东。要求3天之内将房子整修好。时间紧迫，怎么办？管理员沈玉贵立即到青云谱区请了几名泥木工来抢修，日夜奋战，两天半就完成了任务。

八号房，坐落在干休所大院中区一高坡的顶部。这是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文化速成中学领导的宿舍，为砖木结构，座北朝南。在正房的背后，设有一排小平房，主房与小平房由一条篷式走廊连接着。东、西、南面砌有青砖围墙。正房后中间至小平房中间隔有一道砖墙，形成东西两个独立小院。房前修有“T”字形道路，车辆通行便利。房屋正前方设有一个花坛，四周栽有樟树、泡桐树、木棉树、槐树、广玉兰树、桂花树、雪松、小翠竹、桃树、枣树、葡萄、含笑花、茶花、月季花等。整幢房屋周围，由众多的树木花果簇拥着。

化名陈元方

1969年11月4日晚，陈云乘坐的轿车驶入干休所八号房前缓缓停下。他老人家走下车来，早在等候的副所长兼管理员沈玉贵迎上前去表示欢迎。他一看，觉得这位中央来的要员很面熟，但一时没有想起来，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啊！这位中央领导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吗？！上级怎么通知称‘陈元方’呢？”沈玉贵几乎喊起来，碍于上级有通知精神，才没有作声，只好照章行事。但沈玉贵心里有个疑问解不开，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翌日上午，沈玉贵怀着解开疑问的心情，去看望这位中央领导，问问需要办什么事。沈玉贵笑嘻嘻地走进门去。陈云觉得有点奇怪，便发话问道，“今天你这么高兴，笑什么呀！”沈玉贵有点不好意思地用手抓抓头皮，说：“首长，我认得您。”陈云慢而应之：“哦”。沈玉贵笑的又进一步说：“我常在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怎么把名字都改了，叫陈元方？”陈云沉思片刻之后，面带难色而幽默的回答道：“上头叫改名字的，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姓陈嘛！”沈玉贵又说：“首长怎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陈云答道：“上头叫来的！”接着又说：“我到这里来要麻烦你们。”沈玉贵说：“首长，这不是麻烦，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有什么事就让我们去办。”话说到这里，沈玉贵心中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老乡话家常

陈云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成员，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的人。当沈玉贵第三次看望陈云时，他像往常一样热情，边打手势边说：“请坐，

请坐！”当两人几乎同时坐定后，陈云亲切地问道：“小沈，听你的口音，你是江苏人。”沈玉贵答：“首长，我是江苏射阳人。”陈云听后说，“啊，我们还是老乡。你工作生活怎么样？”沈玉贵说：“首长，我是1947年参军的，南下到福建，在守备13师73团工作了16年，1963年11月调来干休所工作，现在行政18级，月工资82块钱。家里7口人吃饭，4个孩子，老家有一个老岳母，爱人没有工作，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还可以。”陈云听到这里插话说：“啊，你生活很困难啊！”沈玉贵没有往下说了。陈云很关心沈玉贵的身体，担心他的身体因家庭经济生活困难受影响。语重心长地对沈玉贵说：“做一个人，要思想品德好、工作好、身体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坚持锻炼身体，以后，你经济条件好时，应注意调养身体。当然，调养生活，借钱不行。花钱、借钱容易，赚钱、还钱难啦。我现在是有钱吃不了什么东面，每餐只能吃一片面包或一点米饭，一小碗肉饼汤或一个苹果，有时一个苹果还要分二次吃。你正当年，正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候，要注意身体啊！”

一顶军帽

1970年春节前夕，省军区政委张志勇受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之托来到陈云住处看望。张志勇说：“首长，我刚从福州开会回来，春节快到了，来看望首长，首长有什么事要我办的”。陈云说：“我什么都很好，谢谢你们的关心。”这时，他边说边用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个还有没有（意指草绿色军帽）？”当时，张志勇一时不明白首长指的是什么意思。又问道：“首长，你刚才说的是讲什么有没有？”陈三说：“解放军军帽。”当张志勇明白首长意思后说：“有、有，我帮您解决。”当天下午，张志勇就派人送来了一顶草绿色军帽。陈云十分高兴。一次，红军老战士罗维道上门去看望陈云，在交谈中，陈云说：“罗维道哇，你看我这顶帽子好不好呀？！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戴过这种帽子。解放战争后我就没有戴这种帽子了。过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戴着这个帽子，武装夺取政权成功了。现在，戴上这种帽子，心里觉得很舒服。我要把这顶帽子戴回到北京去”。

要多读书看报

陈云由北京到江西南昌，简装轻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随行携带的30个草绿色书箱，每个箱内都装着满满的书籍。刚住下，秘书肖华光请示首长，书房里摆些什么书，陈云说：“哎呀！放点马列毛主席著作就行了。”

陈云平时话不多，却很精。他有一大特点，就是喜欢读书看报。他不爱玩，从不下象棋、打麻将、打扑克牌。前几年，我们从陈云夫人于若木口中了解到，他在家也不玩这些东西，就是喜欢读书看报。他老人家在干休所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列宁、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1—4卷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一次，陈云在书房问沈玉贵：“你们的工作学习怎么样？”当沈玉贵谈

到，干休所工作与正规部队工作各有特点，在干休所主要是从事为老干部服务的工作，繁杂量大，服务性强，要求也比较高，但不像正规部队那样紧张。陈云说：“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服务要第一呀！你们订了多少份报纸呀？”沈玉贵回答说：“订了十几份报纸杂志。”陈云接着说，“报纸订得不少，你们要关心了解国家大事，了解国际上的一些大事，了解江西情况。那么多份报纸，你一下看不完，要抓住几份主要的报纸看。一是《人民日报》，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二是《解放军报》，要了解军队的情况；三是《江西日报》，你们所领导、工作人员对这三份报纸要抓往不放，对《人民日报》、《江西日报》这两份报纸要对照起来读，才能发现问题。有些人光讲空话、假话。要调查研究，不能光听。有些报纸只能参考。我是主张讲实事求是的。我到你们南昌市场上看了一下，你们南昌市商店有什么，哪里来的我都清楚，我看了后的感觉是，你们江西的工业发展不快，水果糖大部是从上海等地进来的。前不久的一份《江西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发现了一个大盐矿，现在怎么样了。”1970年，江西主要负责人程世清在江西农村推行“八字头上—口塘，新村盖在山两旁……”的政策。陈云从《江西日报》看到这一消息后说：“程世清呀程世清，看你将来怎样向江西人民交待。”

沈玉贵担任副所长后，准备给工作人员讲课，讲的内容要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可一时找不到这段话，心里非常着急。这时，他想起陈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非常熟悉。于是，他冒昧地个到陈云任处请教。当沈玉贵说明来意后，陈云说：“你要找的这段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X卷的第X页，倒数第X行。这段话字数300多，不到400个字，你可以去查。你有没有书？没有书的话，把我的拿去”。沈玉贵说：“我们有书，我回上查。”说完，沈玉贵回到办公室，照着陈云提示的线索，一打开书就翻到了这段话。

讲货币回笼的故事

1971年春的一天，陈云因咽喉炎吃了药引起皮肤过敏。干休所卫生所军医秦贞仟给他老人家看过病后，请陈云讲革命故事。起初，陈云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在秦贞仟再三要求下，陈云说，“那好，我就给你讲个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货币回笼的故事。”秦贞仟高兴地说：“好呀！”

陈云说：“1958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1959年由于重工业继续急剧增长和基本建设继续猛烈大上，而农业却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出现更加严重的失调局面，存在不少问题。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证购数量大量增加，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更加紧张，农民吃不饱的现象多处发生；重工业继续增长，农轻重结构更加畸形发展。在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大国和吃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畸形的农轻重结构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基本建设继续大上，积累率过高，投资效果显著下降。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达到350亿元。基建大上，使积累率高达40%之多，是建国以来积累率最高的一年，严重地挤了本来就较低的居民消费。由于基建战线过长和积累率过高，使得投资效果很差，财政收支大量赤字，市场供应相当紧张。由于基本建设大上和职工人数大增，使国家财政支出急剧增加，造成1959年财政赤字高达65.8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3%。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农业产品和轻工业的产品供应又很不足，造成市场供求相当紧张。

这样，粮油库存下降，供应以紧张，这年的6月份，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是随调随销。许多地区的粮食库存已经挖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下降。1959年这一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下降更加厉害。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处于困境，加上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苏联专家，扰乱了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工作，加重了我国经济困难。农业减产，基建规模过大。这两个方面的困难，导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城乡人民的生活都下降。出现手上有人民币，在外面没有东西买，一时拿不出办法。针对我国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和当时经济情况，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包括恢复、发展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两个阶段问题；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要求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当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我还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目前第一位的问题。在具体办法上，包括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拿出4000万—5000万元的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饭馆。这样，就来了个实行高价，结果很快就把人民币收回来了。那件事就是我搞的。当时，不实行高价政策，人民币是回笼不了的。最后，国家渡过了暂时的经济难关，整个经济开始脱离险境，并在有些方面开始出现回升，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初战告捷”。

为干休所修围墙操心

1972年2月间，陈云应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邀请去福州。启程前，陈云嘱咐秘书肖华光告诉一下干休所的领导，我们要到福州去，看所里有什么事需要办的，我们可以带去办办。干休所需要解决办理的事很多。有的同志曾想过陈云住在我们所里，有些事情可以请他老人家出面解决，可又考虑他是中央大首长，因而不敢启齿。这次首长主动关心我们，正好将干休所修建围墙的问题向陈云作个汇报。干休所占地面积0.3平方公里，合500多亩地。院落大，四通八达，杂草树林丛生，大院周边仅拉了一道简易的铁丝网，老战士住在这里，缺乏安全感。离休老战士急切希望能在大院周边建上围墙，以安心休养。干休所领导听取离休干部的反映，为加大干休所大院的安全系数，曾筹划过修建围墙，可苦于经费没有着落，一时想办而办不了这件事。陈云把这件事挂在心里，带到了福州。一天，韩先楚问陈云说：“您在青云谱生活安全怎么样？”陈云说，“我在青云谱很好，生活安全。我住的房子有围墙，还有岗哨。我这次来，他们要求我向大区反映一下，给于休所修个围墙。”韩先楚当即表示说：“可以呀，叫他们（指干休所）打个报告来，我给他们批一下。”翌日晨，韩先楚陪陈云散步。陈云又对韩先楚说：“昨天跟你讲的事，看来还不行。层层报批，什么时候到你手上批呀！我看报告写好后，直接送到你手上，这样会快些。”韩先楚答曰：“这样也可以呀。”

3月中旬，陈云返回南昌，干休所政委尤云儒等同志前往车站迎接。陈云一见尤云儒就说，“你们要求修围墙的事，我跟韩司令讲了，他同意了。你们要抓紧打个报告，直接去找韩司令员批。”陈云还建议，修围墙时，要

搞一个大门。遵照陈云的嘱咐，干休所把报告直接送韩先楚司令员批给了4万元。接着，很快就把围墙建起来了，离休干部的安全问题得到了解决。离休老同志非常感动他说，陈云没有忘记我们，把我们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真是同我们心连心啊！

陈方的婚礼

陈云与于若木结成革命伴侣，生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在当时的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陈云的家庭与许多的家庭一样历经沧桑，一家7口人被四散于全国各地。陈云化名陈元方南下江西，于若木被关押在北京植物园。他们的孩子，三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干校、农村、部队，两个男孩分别下放到工厂、部队，有一个下放到祖国边陲西藏。他们在那儿与工人一样做工，与农民一样种地，与战士一样扛枪，与教师一样教书，他们在下放期间，都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幸运的是，他们被当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对待，不大受歧视。最后，由地方、部队照顾送到大学里，都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拼搏，有所作为。1971年春节，陈方携新娘来到青云谱探望父亲并举行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嫁妆，新房用的是干休所配发的旧床架、铺板，床上盖的是军用草绿色被子，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吃请。陈方这次办喜事，他的爸爸只给了200块钱。后据我们了解，陈云给每个孩子结婚用的钱都是一个样。陈方结婚，事前没有声张，大家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在陈方结婚那天，卫士李奇到所里告诉政委尤云儒、副所长沈玉贵，说首长找两位领导有事。尤云儒、沈玉贵两人听说首长有事，就往陈云住处去了。在客厅里见到陈云，一一向陈云行举手礼，陈云站立着向前自然伸展双手上下摆动说：“坐下！坐下！”这时尤政委、沈副所长、肖秘书、李卫士、汪师傅、驾驶员、新郎新娘与陈云欢聚在客厅。接着，陈云说，“今天。我儿子结婚，没有酒席，买点烟、水果糖，大家在一起玩玩。”讲完话后。大家热烈鼓掌。当陈方夫妇完婚后，陈云嘱咐身边肖秘书将两斤水果糖、一包前门烟送到干所值班室、请干休所工作人员吃喜糖、喜烟。工作人员人人吃上喜糖、抽上喜烟后，才知道陈云孩子结婚的事。工作人员感慨地说：“没想到，一位伟人的孩子婚礼办得这么简单、朴素！”

不接受宴请

陈云居住在青云谱干休所的日子里，非常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生活简朴，严格要求，谦虚谨慎，以身作则。日常生活中，他很愿意接触干休所的一些老同志，常在一起谈谈心，了解情况。离休老战士也很喜欢接近他，在他面前吐真言，讲心里话，聆听老首长的教诲。他的生活十分简朴，每餐吃的大都是粗粮，而且量很少。比如，二两米饭，一小碗肉饼汤或一片面包，十几粒花生米或一个小馒头，一个蒸熟的苹果，就是一餐饭。他的生活确实太普通不过了。他从不搞铺张浪费，不喝酒，不接受宴请。干休所每逢八一节、国庆节，元旦和春节都要组织工休人员进行传统会餐。每次会餐，花的不是军费，是工休的生产经费。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到了，自然忘不了陈云老首长，这种感情来自于对首长赤诚的爱戴和尊敬。每次会餐前夕，所领导、工作人员觉得是难得的机会，主动上门请他与大家

一道会餐。可陈云总是说：“谢谢大家。我不参加，我不参加。等你们会完餐，我去看看你们。”这样，在参加会餐人员即将离席时，陈云来到了干休所餐厅。一进餐厅门，他就拱着双手对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祝大家节日愉快！”接着，与工休人员一一握手后离去。

陈云在干休所生活的2年7个月里，与离休老战士、工作人员结下深厚的感情。临别之际，干休所为表达对陈云一片心意，特意安排了便宴话别。所领导、离休老同志三次上门请他做客，他一再婉言谢绝，并说：“我怎么能接受吃请哩！以后我还要回到青云谱来的。”后来，我们得知，陈云从来就是不接受宴请的，可他自己家里有喜事时，却总把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挂在心里。陈云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一次，陈云散步时，听说罗维道同志生病了，回到住处，他找来了汪师傅交待说：“罗维道生病了，我们水他里养的那两条扁鱼我不吃了，你快把鱼给罗维道同志送去，让他调剂一下生活。”当罗维道从汪师傅手中接过两条活蹦乱跳的扁鱼时，落下了热泪。至今，罗维道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铭刻难忘。

为女儿发工资

陈云的厨师汪师傅，江苏镇江人，跟随首长多年。这回陈云南下江西，汪师傅也跟随着来了。有一段时间，汪师傅生病。为照顾他养病休息，陈云把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下放到干校的女儿伟力叫来帮助做饭。伟力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是56块钱。陈云觉得孩子大了，参加了工作，成了党和国家的人了，她离开了干校，到这里替代汪师傅做饭，就不能再拿干校那份工资了。于是，陈云与女儿伟力商量：“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没有去上班，没有工作，就不能白拿工资。”硬是把干校的那份工资退了，改由陈云每月给女儿伟力发工资，在国与家、公与私的问题上，陈云是何等的分明啊！

陈云居住生活在青云谱干休所期间，他的夫人于若木由于被关在北京植物园未能伴随同行，他的四散于全国各地的儿女。媳妇、女婿都先后来到了青云谱看望陪伴过。

197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云回北京。临行前，所领导和红军老战士谢忠良、罗维道等许多工休人员前往陈云住处话别送行。交谈中，陈云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照顾。你们去过北京，去过中南海吧？”罗维道答道：“去过。”陈云接着说：“哎呀！这里比中南海好，空气新鲜。我在这里住过后、对这里很留念。这个房子很好，冬暖夏凉。我在这里看了不少书和报纸，接触了不少的人。我以后还要回到这里来住。”陈云一行告别青云谱干休所，由于休所原政委欧佩璋护送，乘火车启程，于4月24日顺利返回北京。5月1日，陈云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分参加了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活动。

1977年，干休所组织离休老同志前往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在京逗留期间，干休所两名领导带一名工作人员前往陈云住处看望他老人家。当陈云听说青云谱干休所来了人，心情格外高兴，即安排时间会见。他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使人备感亲切。交谈中，陈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清茶一杯。我离开你们那里时，你们三次请我的客。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接受吃请呢？”关于我住过的那个房子，离开时，我曾讲过，我还要回来住，这次，你们回去跟福州军区讲，我以前住的房子，我就不去住了。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就

是一些报纸。你们处理一下就行了，由谁住由军区去决定”。

（刘志文）

“工人阶级了不起”——阵云考察江西汽车制造厂则记

1969年10月20日，陈云来到江西“蹲点”。这时在名义上，他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但他不顾身处逆境，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状况，深入实地进行考察。

青云谱，地处英雄城南昌市区的南部、西临抚河战道。清顺治十八年，中国画史上明末清初的“四大高僧”之一，朱耷改僧皈道，更名“八大山人”，在此建造青云谱道馆成为境内名胜因而得名。

这里是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城南工业区。宽60米长4.6公里的井冈山大道纵贯南北，大道旁有全国“七大拖拉机厂”之一的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修造所的基础上建成的江东机床厂，还有初具规模的汽车制造厂……大大小小的工厂鳞次栉比。

1970年5月的一天。

天空阴阴的，偶尔露射出一线阳光。江南的5月，天气忽阴忽晴。

8点钟，江西汽车制造厂上早班的工人，急匆匆的鱼贯入厂。机器声、榔头声……工厂那特有的喧闹，在江西汽车制造厂各个角落响起。

江西汽车制造厂厂区东部，一幢不起眼的两层灰砖楼，楼中间的门旁，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面赫然写道：“江西井冈山汽车制造厂革命委员会”几个大字，这是江西汽车制造厂的生产指挥中枢。楼内的每一间房间，每一个人都忙碌着……江西汽车制造厂的上上下下，正在为生产1000辆“井冈山”牌汽车，大战“红五月”。

8点半，厂值班室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

“是江汽吗？我是省革委，请你们厂负责人接电话。”话筒传来的话是严肃的。

值班员不敢怠慢，立即找来厂革委会主任。

“今天上午9时左右，有一位首长要到你们厂去参观。”

“不要主动向首长提问。”

“要做好接待工作，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电话里一个干练的声音交待着接待事项。

江西汽车制造厂的前身是省交通厅汽车修配厂。当时，省长邵式平很重视江西的汽车工业。1958年在汽车修配厂的基础上筹建成汽车制造厂，并迁址于青云谱包家花园。10年的创业，10年的磨砺，终于在1968年4月30日，江西汽车制造厂在仿制“跃进”牌汽车的基础上，生产出第一批12辆载重2.5吨的汽车，并命名为“井冈山”牌，圆了江西自己生产汽车的梦。尽管当时的生产设备等条件十分简陋，甚至还没有冲压机，但工人们敢想敢干，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用18磅重的大榔头敲打而成汽车驾驶室。

按照惯例，江西汽车制造厂接受接待任务，是由南昌市机械局通知的，直接接到省革委会的电话通知，对江西汽车制造厂来说屈指可数。厂革委会主任没有多想，立刻与几位领导商议了一下，便到楼前等候。

上午9点钟，一辆伏尔加牌轿车，没有鸣笛，悄然地驶入厂区，在办公楼前停下，厂革委会主任史直忠迎上前去表示欢迎。

一个头戴便帽，身着中山装，脚穿黑色市鞋的长者从车上下来。厂革委会主任史直忠一眼就认出了来参观的首长，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陈云。

陈云在史直忠陪同下，来到厂革委会的小会议室。

这是陈云来江西 8 个月用后，第一次离开化工石油机械厂外出考察。他早已经知道江西生产出汽车，并从报纸上看到江西在制造汽车的过程中，用竹木代替一些汽车附件的报道。“文革”中的“假，大、空”比“大跃进”更是过犹不及，后害更大。陈云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掌握江西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手材料。这也是陈云的一贯作风。1933 年 6 月间，陈云发现苏区工会的工作普遍存在着一种“忽视工人利益”、“空讲原则不去联系实际”的“左”的倾向，便亲自找工会党员和工人谈心。有时与一个工人的谈心，就化了 11 个小时，把他们“任何细小的怀疑与不满，统统解释了与实际的解决了”。

陈云坐走后，面带笑容亲切的询问厂革委会主任史直忠是哪人，接着拉了会家常，然后，话题一转，询问起江西汽车制造厂的生产情况、职工的生活状况。

史直忠是一个“老工业”，他 60 年代初期就来到江西汽车制造厂，先后任过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厂长乃至革委会主任，参与了“井冈山”牌汽车的研制的全过程，他一说到生产，话就流畅起来。他先向陈云介绍了江西汽车制造厂的历史沿革。接着汇报了创业的过程和全厂的规模。

陈云听到江西汽车制造厂是靠白手起家，用极其简陋的设备，尤其是没有冲压机，就用大榔头一锤一锤的敲出汽车的一些零部件的情况后，说：“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国家投了资的，这里是白手起家、能够生产出汽车来，不简单。”

陈云接着又询问江西汽车制造厂职工生活状况。

江西汽车制造厂革委会主任，这段时间正在为工人的生活条件的困境感到头痛，听到陈云问到这方面的情况，就介绍说江汽的厂区规模已经扩大了近一倍，因原来与江汽毗邻的江西手扶拖拉机厂搬迁到靖安县，厂地给了江汽。同时，江西汽车制造厂现在有近千名工人，工人的组成有三部分，一是江汽原有的工人，二是从在江西“支左”的 6011 部队等招收的复转军人，三是在社会上招收的青年学生，生活条件比较困难，大部分新来的工人只能住在原江西手扶拖拉机厂的仓库里，有的工人，干脆就住在用车箱搭成的简易工棚中……

陈云了解到江西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的生活条件，是这样艰苦，他没有说什么。平静的脸上如果不是眉头皱了皱，是察觉不出他的不满情绪的。

陈云对普通职工群众的生活，几十年来始终是十分关注的。

苏区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推行不切实际的政策规定和做法，严重影响苏区工业的发展和苏区工人的生活状况。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中，针对工人提出的“如何解决没有饭吃的问题，如何向政府要求免土地税的问题”，陈云提出“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去提出工人所迫切的要解决的问题。”这样一些正确的主张。

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陈云走访工人家庭、走访厂托儿所、食堂，了解工人的生活，并且多次提醒化工石油机械厂负责人注意关心职工的生活，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陈云听完了江西汽车制造厂负责人汇报后，又说：“工人阶级能够生产出这样的汽车，了不起。”

“走，去车间看看。”陈云边起身，边对厂里的负责人说。

陈云先后到了煅工、铸造、金工等3个车间。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但是，在参观生产车间时，他始终一言不语，只是默默地观看工人操作生产。

陈云看到了满身是汗、是油泥的工人们，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用简陋的生产工具埋头苦干；陈云从车间墙上张贴的，悬空挂着的标语上，看到了一些正常的生产操作规程被称之为“陈现陋习”……

10点30分，陈云离开江西汽车制造厂。

陈云在江西汽车制造厂整整考察了90分钟，他没有更多的说什么话。他从这个工厂的生产条件、生产环境等情况，再一次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江西人民的勤劳朴实；同时，他也深感“假、大、空”对生产的损害……可是，人民是好的，因此，他说了“工人阶级了不起”。

又是一年景色新、无限春光入目来。今天，南昌城南出现了一个新型汽车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生产出李鹏总理称之“质量好，工艺水平高”的“江铃”系列车。江汽人正在市场的海洋中遨游。“工人阶级了不起”始终在激励着他们。

（史爱国）

身处逆境心系农村——陈云考察南昌县农村纪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安排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他不顾身处逆境和年老体弱，在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的同时，心系农村，时刻惦记着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关心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1971年他二次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分到南昌县农村，调查研究，给南昌县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1年5月16日上午10时许，陈云轻装简从，驱车直抵被省革委负责人定为“新农村”典型的罗家公社参观，公社革委会主任殷丑子等迎上前去表示欢迎。客主一见面，殷丑子向陈云敬上一支壮丽牌香烟，陈云拱手以示谢意，并津津乐道地谈起了他的“烟经”。他说：“我抽了18年烟，戒了18年烟。大革命时期什么烟都抽，纸烟、黄烟、连茶叶都当烟吃，最困难时，没有点烟的火，就你我他大家接上抽，不熄火”。几句话使大家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听后，备感陈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原来紧张，不自然情绪一扫而光。小小的接待室充满着轻松愉快的气氛。

公社几位负责人向陈云汇报“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时，陈云只是听听而已，不作记录。当讲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具体情况时，陈云津津有味地细听，边听还要边问，并用本子记录下来，听不懂的话，他就说：“请再讲一遍。”陈云真正关心的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

殷丑子用试探的口吻问道：“老领导，我以前听说你在中央是管尖端武器的。”

“我主要是管经济财贸的。过去，我在中央留了10个亿，以应付方方面面的急需”。陈云面带笑容地回答说。

当殷丑子谈到自己身为公社一把手，几年来手头没有一点机动钱时，陈云告诫说：“你不能留小金库，层层留小金库，国家就要失控。”在场的人连连点头称是。

当殷丑子汇报公社利用氨水肥田很好时，陈云颇感兴趣，显得激动，用手拍拍桌子说：“氨水还能肥田？新鲜事，以前我没听说过。”

第二天，陈云在殷丑子等陪同下，视察公社农科所两稻一麦“三熟”试验田和胡家大队“新农村。”

一路上，大家亲切地称呼陈云“老首长”、“老领导”，陈云幽默而风趣他说：“你们不要称我老首长，我是老机，老右，老犯错误。”说完便哈哈大笑。没走多久，就到了“新农村”。陈云看到一排排新建房子，若有所思他说：“房子的窗子要开大些，窗小空气不流通，人的寿命受影响。”陈云不仅关心农民的生活，更关心农民的身体健康。

当殷丑子汇报养猪情况时，陈云问道：“社员上交毛猪任务怎么个交法？”

“交给食品公司收购站，每只猪还要扣除10至12斤馊。”殷丑子如实说。

“除馊就不合理嘛，哪有空着肚子卖猪的呢？”陈云一句简朴的话道出社员群众的心声！

临别时，陈云与在场的干部和群众一一握手告别，并说：“毛主席是领导，关键还要靠自己干，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生产要搞

好，生产不搞好，群众生活就提不高，社会主义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他的话句句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同年9月秋天的南昌，秋高气爽，月桂飘香，被誉为“鱼米之乡”的南昌县广大农村，稻浪滚滚，呈现一派丰收景象。广大农民正满怀喜悦之情，等待挥镰收割晚稻。28日上午8时半左右，陈云在秘书、警卫员陪同下，乘坐一辆老式优尔加轿车，来到八一公社淡溪大队。那天，他身穿一套青色卡机布中山装，脚穿一双黑布鞋，显得额外朴素大方，脸部显得有点消瘦，但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视察南昌县八一公社淡溪大队。

大队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谢正棋等人热情接待，陈云一一询问在场干部姓名、职务、年龄，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谢正棋详细汇报社员生活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当陈云了解到淡溪大队解放20余年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社员生活有较大提高时，他说：“农村主要靠发展生产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要发展生产，关键是你们这些在座的人要带好头”。“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来说，既是指导和帮助，又是鼓舞与鞭策

50年代末，60年代初，南昌县农村和全国各地一样，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食堂。谢正棋汇报中提及这个问题时，陈云插话，“这个不必提倡，那还是10年前的事，大家都知道，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不是靠吃出来的，而是靠干出来的”。

当谈到普及农村教育，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时，陈云高兴他说：“这个事情很新鲜，是一个创举，我都只读过小学，现在条件好了，农村的小孩不但要读小学、中学，将来还要考取大学！”

大队干部反映农村用电紧张的情况，陈云颇有感触他说：“我一直是搞经济工作的，电也是我管，就全国来说，不仅农村用电紧张，而且工业用电也紧张。”谈话中，流露了陈云对我国电力事业落后的不安。

在座谈时，陈云还强调“要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发展不能那么快。中国是个大国，比较穷，人口发展过快，中国的事情就难办”。他老人家高瞻远瞩，早就把计划生育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了。

大队干部在汇报时，都一致认为，20多年来，淡溪大队各项工作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陈云举双手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

座谈过程中，陈云非常诚恳、认真听取大队干部发言，并作记录。大队干部头来当地最好的茶叶，泡茶给陈云喝时，他婉言谢绝，并解释：“我有胃病，喝了井水肚子会不舒服。”并用激动的语调说：“我在萍乡搞社会调查时，老乡们很辛苦。从很远的地方挑河水泡茶给我喝”。这足以看出，陈云关心老百姓。老百姓更是爱戴和关心自己的领袖。杯水之情，体现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

座谈会一直在充满亲切、热情的气氛中进行。时钟到了11时半，秘书说要走了。在场的大队干部恳切请求与陈云共进午餐，他拱手谢绝，挥手告别，他那艰苦朴素的作风、勤政廉政的崇高品德，至今仍留在南昌县人民的心中，成为今天加强廉政建设的光辉榜样。

正当举国上下喜庆1971年国庆之际，陈云第三次到南昌县农村视察。10月2日上午8时左右，他来到南昌县八一公社大昌大队进行社会调查。当时，大队办公室正在改建中，没有接待的地方，只好临时借用养路队的办公

室。这间办公室只有十几平方米，非常简陋，四面墙均是用泥巴筑成的，里面只有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几条长凳。附近的群众听说是中央一位老首长来了，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

10月的习习秋风，略带一丝凉意，但小屋里面笑语盈盈，热气腾腾，陈云一进屋便与大家一一亲切握手。坐下后，先后询问在场干部、群众的基本情况，当他得知大队党总支书记魏际福年纪轻又有文化，便站起来兴奋地说：“你是跨世纪的干部，大有希望啊！要想得更远些，要胸怀世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有成绩，但不能说很大，如果说很大，就会骄傲自满，停滞不前，我们并不算富裕，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你们青年一代身上，你们要勇挑重担，加倍努力工作啊！”魏际福等听后，深受教育，激动他说：“这是首长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和鞭策，我们决不辜负老首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一定努力工作，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永远做一个朝气蓬勃的先锋战士。”

接着陈云说明来意：我这次来主要是作点社会调查，了解一下农村情况。一是解放前的粮食生产情况；二是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他的秘书补充说：“请你们不要受拘束，随便谈谈，知道多少讲多少。”魏际福等如实向陈云作了汇报。解放前每亩平均年收稻谷300余斤，解放初每亩平均年收稻谷500余斤。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是尚未普遍推广双季稻，我们大队的双季稻仅占60%。解放前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苦，贫雇农都是靠打长工维持生活。1958年兴建赣抚平原灌溉工程，解决农田用水问题，一季稻变双季稻。人民公社期间，亩产年收稻谷近千斤，跨了纲要（800斤），粮食产量的提高，主要原因：一是赣抚平原水利工程建成，解决了农田用水的问题；二是科学种田技术的推广，如优良品种的选择，农药的使用；三是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另外资金比较足。这时，陈云插话，“你们有土地对比情况吗？早、晚稻各打多少？”魏际福等如实汇报：“合作化时期，晚稻尚未超出早稻，早稻500斤，晚稻300斤，人民公社时期早稻600—700斤，晚稻300—400斤。社员人均口粮500斤左右。”陈云建议：“现在粮食是提高了，但不算高，还要花力气解决水的问题，力争晚稻赶早稻。晚稻超早稻。”

当陈云了解到社员群众生活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20%的人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三大件”时，非常兴奋他说：“老百姓有现在的生活，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好啊！今后只要我们一心一意跟党走，生活定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大昌大队对无子女的孤寡老人实行“五保”即保住，保吃。保医、保穿、保葬。逢年过节进行慰问，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陈云得知后非常高兴！他很幽默而风趣他说，“我到你们村里来当‘五保户’，欢迎不欢迎呀？”他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魏际福等还向陈云汇报了大队历年收入、社员分配、政治运动，党团骨干、多种经营、文教卫生、粮食征购、工农互援等情况。谈到群众生活问题，陈云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群众生活都提高了，战争年代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多苦啊，连盐都没有吃，只好从老土砖中熬出硝盐来吃”。临走时，陈云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仍未吃饭就回南昌去了。

20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陈云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谆谆教诲，时时在南昌县人民的耳边回响，永远难忘。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人民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

起抓,现在,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21.12 亿元,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全县粮食总产已达 77.91 万吨,跨入全国“农业百强县”。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硕果累累,全县财政收入已达 14637.9 万元。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乡乡镇镇程控电话正在开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 1322 元,是 1971 年的 10 余倍。现在,全县农民正朝着小康目标迈进!

(熊才水、杨友根)

逆境中的钢城之行 陈云在新渝考察纪实

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以普通而特殊的身分，到新渝（今新余市）参观考察。历时6天。陈云是建国后到新渝考察的最高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新渝人无不引以为豪。

“神秘”的领导

1971年9月8日上午，中共新渝县委书记张炎，正在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没有理睬，无奈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看来是有急事，他径直走进办公室，拿起了听筒。

“喂，你是哪里？”

“我是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对方回答。

“哦，你好，有什么事？”张炎问。

“你是张炎主任吗？”

“我是。”

“有件事通知你。”

“好，你说。”

“明天有位领导到你们新渝来，请你们接待一下。”

“好的，他是谁。”

“这你就不要问了，见了面，你就知道了。”接着对方交待说：“这位领导来了以后，你们不要提问，他问什么你们回答什么，并作好记录。这次他来主要是了解一些有关经济方面的情况。他明天坐南昌至萍乡的火车来，请注意接站。来后要注意保密。”

接完电话后，张炎立即找来了办公室主任谭发瑞，研究落实接待的具体事项。

但他心里总感觉有些问题不好理解。这次来的领导连他都保密，要等见了面才知道，对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没有提出要求。要去接站，来的是何人都下知道，怎么个接法？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南昌开往萍乡的火车准时抵达新渝车站。陈云在女儿和随行人员陪同下走出车站。等候迎接的刘勤、谭发瑞等一眼就认出了这位领导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急忙迎上前去与他亲切握手。但不知如何称呼，倒是在部队锻炼多年的刘勤反应快，他脱口而出地叫道：“首长，您好，一路辛苦了。”陈云微笑地向他们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当时，新渝县委还没有专门招待所，只是在县委机关院里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人称，“小客房”，供外来客人居住。一楼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客房。县委书记张炎正在客厅焦急等待迎接客人，都在猜测来的领导是谁。这时，小汽车驶过来的响音，使坐在客厅等待的张炎等人触动了神经似的，不约而同地从各自座位上站了起来，向门外走去。当小车停稳以后，陈云在女儿的挽扶下走下车，张炎等人一眼就认出是陈云，便急忙上前表示欢迎。他说：“陈云同志，是您呀！欢迎！欢迎！”陈云谦虚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罗！”张炎当即撇开话题说：“领导同志，什么错误呀，难免。”张炎紧紧握住陈云的手，把他老人家迎进了客厅。

在客厅里，陈云神情严肃，静静坐着，有些疲倦似的，不大讲话，仅仅

询问了在座的人的姓名等简况。张炎说，“什么时候给首长汇报合适。”陈云摆摆手，说，“不用了，我看看就行按照“小客房”的接待惯例，安排陈云住二楼，随行人员住一楼。因为二楼房内设备较好，也较安全。陈云女儿以商量的口吻说：“还是先看看房间再说吧！”县委通信员傅可新领着陈云女儿，从楼下到楼上边看边介绍。回到客厅后，陈云女儿与父亲耳语了一阵，然后对大家说，“我看这样，我与父亲住楼下靠西面的两间客房，其他几位同志住楼上好了。”她这样一说，张炎等感到意外，他们说：“这怎么行呢，还是请陈云同志住楼上吧，楼上更安静。”大家婉言相劝，但陈云女儿微笑着解释道：“我爸爸的身体不大好，还是住一楼方便。”张炎等同志就不再坚持了。

简朴清廉的楷模

陈云生活简朴。他女儿告诉接待的同志说：“我父亲的膳食问题就不用麻烦你们了，他吃的饭菜由我来弄。只请你们每天帮助准备一点新鲜蔬菜、几两精肉即可。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饮食习惯与年轻人不一样。本来，他有厨师，了解他的饮食习惯，因厨师家人病故回家奔丧去了。临时找人代替，一时找不到了解我父亲饮食习惯的厨师，只好由我临时代替。做饭的油、盐、酱、醋、米、面和花生米等都自带了。不过，食用水要水质好一点的。其他几位同志的膳食，就请你们安排”。

陈云在新渝的膳食非常简单，早餐稀饭、几片面包、一小碟花生米和一小碟蔬菜；中晚餐是米饭、白菜、豆角肉丝、花生米，有时吃面条，数量很少，每餐都吃完，从不浪费。

陈云轻车简从下厂考察，不要县领导陪同。县里只派了武装部副部长刘勤力他带路。到厂后，不进厂部和车间办公室，直接到生产第一线，观看工人操作生产，不要厂里介绍情况。

陈云穿着非常朴素，初秋的新渝秋高气爽。陈三身穿一套普通淡灰色的中山装，朴素大方，没有一点架子。在参观毛主席在新渝革命活动陈列馆时，讲解员还误以为他是陪同的炊事

陈云在新渝的日子里，既不要宴请，也没有抽公家一支烟和品尝为他们准备的点心、水果。离开新渝时，他要秘书把用膳的钱、粮等费用一一结清，如数付了款，真正是清政廉洁的楷模。

马不停蹄地参观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尽管处境艰难，仍不顾年老体弱，不避寒暑，十分关注经济建设。

陈云到新渝考察，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没有什么事，下来走一走，看一看。”到新渝看什么呢？70年代的新渝是个小县，远不如其他地市的知名度。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不多。但境内工矿企业比较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特别是钢铁工业比较发达。新渝钢铁厂、江西钢厂生产规模比较大，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产品品种较多而独特。陈云很关注这两个厂的生产 and 职工生活状况。

9月10日，天气晴朗，秋日高照。

陈云在县武装部副部长刘勤的陪同下，驱车来到新钢焦化分厂，没有进厂部惊动单位领导，直接到炼焦炉前观看出焦的情景。陈云站在离炼焦炉不远的茅棚下。聚精会神地观看出焦，既高兴又陷入沉思。他回忆起1959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炼1吨铁，需要1吨半焦炭；炼1吨焦炭，需要1吨半洗煤；1吨洗煤，需要两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一亿吨炼焦煤。”现在新渝钢铁厂有了年产60万吨焦的生产基地，对提高钢铁的产量和质量将起到推动作用。看到炼焦工人在认真操作，生产出合格的焦炭，很是高兴。

陈云考察新钢焦化厂后，不顾劳累，11日又驱车前往江西钢厂考察。

江西钢厂是1965年兴建的，坐落在距新渝县城以南22公里处的周字山区。厂区周围群山叠嶂、竹木茂密。所属各个分厂分布在几条山沟里。

陈云一行从新渝县城出发，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颠簸行驶，一个多小时才抵达钢厂。下车后，陪同的同志劝他老人家先休息一下再去车间参观，陈云摆摆手说：“不休息了，抓紧时间去看。”汽车接着直驶薄板分厂。

陈云是冶金工业的行家。他走近加热炉旁，仔细地观察加热炉的操作和炉温。这时，一伙工人围过来，陈云向工人招招手，以示问好和谢意，并语重心长他说：“你们现在烧的炉子很先进，很省力，烧的是煤气。过去上海的工厂的炉子是烧煤的，工人用铁铲一铲一铲地把煤往炉子里甩，很辛苦罗！”工人们听后都笑了。这时，陈云发现加热炉前后都冒出火来，便对操作工人说：“煤气喷嘴风量没有调好。”炉前工刘荃主很不好意思地赶快去调整喷嘴的风量，炉尾不冒火了，恢复了正常燃烧。一位上海籍的炉前工用尊敬的眼神看看陈云，并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你老人家对工业炉这么熟悉，真是行家呀！”陈云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心里十分高兴！并用上海话回答说：“阿拉也是上海人。”并面带微笑地举起右手向车场的工人们招手致意！边走边说，“再见！”工人们高兴地鼓掌送行。

陈云离开薄板分厂又到丝带分厂参观。该厂距薄板分厂约5公里，在另一条山沟里。这里环境安静，机器响声小。陈云参观了丝带生产的过程中，仔细地观看每道生产工序。当他看到能生产出系头发那样细的钢丝时，十分高兴地把它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连声称赞说：“很好！很好！”并叫女儿拿一点作纪念。

陈云从丝带厂出来，又到七分厂参观金工车间的两米滚齿机和大型龙门刨床。他老人家连续不停地参观几十分厂，有些疲倦。随行人员给陈云端来了一个小板凳，他坐走后向陪同参观的钢厂办公室主任陶尚连问道：“江西钢厂有多少职工？”陶尚连回答：“有6900余名。陈云又问道：“从上海来的有多少？”陶回答说：“80%是从上海来的，20%是当地的。”听到这里，陈云关切地询问工人的生活情况。他用上海话问道：“你们在这里生活习惯不习惯？”工人回答说：“还可以。”他又问道：“上海人很喜欢吃大饼、油条、豆腐浆、糍饭糕、你们食堂做吧？大伙回答说：“我们食堂会做，能经常吃到油条、豆浆，但不是天天有。”陈云听了十分高兴！风趣地对陶尚连说：“好！给我留些大饼、油条，我下次来吃罗！”接着，老人家又问道：“上海的日常生活用品，你们这里能买到吗？”大家回答：“基本上可以买到。”陈云微笑地“哦”！随后起身向大家告辞。

陈云告别七分厂，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一分厂参观电炉炼钢和浇钢场。陈云问陪同的陶尚连，“你们厂一年炼多少钢？”陶回答说：“去年生产了65800

吨，今年计划生产 72000 吨。拉丝轧带钢是我们厂自己炼的。”陈云说，“我们去看看出钢。”陶尚连急忙跑到炉前问炉长，炉长说：“要再等 10 分钟左右。”陈云同志说：“好！”等了 10 分钟左右，还不见出钢，陶尚连非常着急，再次跑到炉前问炉长，炉长说，“还没有炼好，还需 10 分钟。”陈云听说还要等 10 分钟，他看看表，时间不早了，忙说。“到其他地方去看看吧！”

在陈云的提议下，陶尚连带着陈云到五分厂参观热芽孔和冷拔生产工艺流程。分厂负责人和工人拿出生产的无缝钢管样品给陈云看，并讲解生产过程和钢管的性能。陈云边看边听，非常高兴，连连点头称赞，并语重心长地鼓励说：“还要增加一些新的优质产品，以后会非常有用的。”

陈云来到三分厂参观时，正巧车间停产检修。于是，到车间里转了一圈，仔细地观看了生产设备。他看到先进的设备和高大的厂房，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厂规模大，设备好，样样都有了。”是的，江西钢厂始建于 1965 年，通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已初具规模。

陈云参观了江钢的各个分厂，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当厂负责人提出向他老人家汇报全厂情况时，陈云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们要休息，我也要休息。我看了之后，心里明白了，不要汇报了。”

上午 11 点半，陈云一行，告别江西钢厂，返回县城往地。参观毛主席在新渝革命活动陈列馆

9 月 11 日上午考察完江西钢厂后，下午，陈云连续参观两整天，对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这已够累的了。何况他老人家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本应休息。但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毅力，于 12 日上午又风尘仆仆步行前往坐落在县城里的毛主席在新渝革命活动陈列馆参观。他对当时参观者必须虔诚地朗诵：“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 X……”那一套，并不感兴趣，不声不响地一走了之，迅速步入第二展厅，兴致勃勃地听讲解员讲解毛主席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失败后，带领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尔后，向赣南、闽西进军，直至古田会议的情况，以及新渝人民革命斗争情况。他边听边看，尤其对毛主席在罗坊会议作出不打大城市、诱敌深入的决定以及在罗坊和兴国进行农村调查等内容以及相关文物看得特别仔细，听得非常认真。但对其中美化林彪的内容，不屑一顾。

“慈父”般的教诲

县委通讯员傅可新，临时在“小客房”当服务员，负责照顾陈云的生活。陈云生活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起床后，洗漱完毕便到室外散步。回房后，不是听广播，就是看书报，或思考问题。每次小傅蹑手蹑脚地进入陈云住房送开水或其他东西时，他老人家无论是在沉思还是在看书报都会抬起头来面带笑容，他看看小傅。如果开着收音机，他老人家就会把音量调小，亲切地招呼小傅坐下。陈云觉得这位小青年忠厚老实，办事认真负责，很可爱，于是主动与小傅交谈，聊天，并关心地问小傅：“小傅，你晚上睡几个小时觉？”小傅如实告诉他老人家说：“五六个小时，”陈云面带惊讶而“责备”的口吻说：“睡得时间太少了。”小傅笑咪咪地回答：“没事，习惯了。”一次，陈云笑笑地询问小傅的身世及家庭情况，小傅毫无顾忌地介绍说，“我今年 19 岁，6 个兄妹，我是长子。父亲在县委机关工作，月薪 45.5 元，母亲没有

工作。”陈云听后很同情说：“太苦了。”小傅又说：“因为家里生活困难，1965年小学毕业后，还不到13岁就到县政协当通讯员。”小傅又接着说：“记得1965年9月学校开学，家里没有钱，当时县水电局局长高景树爱人给我10元钱到学校报名上初中。因生活所迫，我父亲又去学校退回了学费。”小傅哽咽着继续说：“从此我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陈云听完，沉默了半天，伸出一只温暖的手抚摸着小傅，声音低沉他说：“太委屈你了，孩子，你不要责怪父母，要体谅父母的苦衷。”小傅点点头，感激的说，“感谢首长的关心。”陈云又鼓励小傅，说，“你是先天不足还可亡羊补牢嘛，在工作实践中好好学习，也一样可以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接着，陈云语重心长他说，“小傅，你在领导身边做通讯员工作，对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作风以及工作方式方法，注意观察，好好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社会上的青年要学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法跟你比。当然，观察问题、看事、做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遇事不要人云亦云。要全面准确地看待一切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不要被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所迷惑。”这些哲理名言，慈父般的教诲，小傅一时吃不透，不太理解。但他铭记在心。深深感到这是一次最生动、最深刻的教育。

在亲切交谈中，陈云询问小傅的政治学习情况。小傅兴奋地向他老人家汇报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读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6本书。”陈云边听边点头，表扬小傅说：“小学毕业，能读这6本书，不错，”并试探地问小傅，“你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了解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谈谈看。”小傅就自己所知道的，向陈云汇报了《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大体内容及意义等。陈云问：“你知道《共产党宣言》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来的么。”小傅回答道：“大概是五四运动吧！”陈云再问：“你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么。”小傅说：“不知道。”“我是上海青浦人，印刷工人出身，《共产党宣言》传入时我参加了印刷。”接着，陈云意味深长他说：“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要多读原著，读原著与看其他书就是不一样。读原著才能看准事物，才能帮助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掌握主动权。”听了陈云一席话，小傅深感胜读十年书。陈云关心小傅政治上的进步。小傅向陈云汇报说：“我早已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多次找我谈过话，准备吸收我加入党的组织。由于去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之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我入党之事也被当时全国这件头等大事耽搁了。”陈云听后鼓励小傅，说：“不要泄气，要经得起党组织的考验。时间的考验，也是一种形式。要积极创造条件，从思想、政治、组织上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思想上、政治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重要。”

在陈云的教育鼓励下，小傅严格按照党员条件要求自己，终于在1972年5月19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交谈中，陈云还向小傅了解新渝的一些基本情况。他问小傅：新渝县有多少的面积和人口，多少个公社（场、镇），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等基本情况。小傅就自己所知道的一一向陈云作了回答。但有一个问题把小傅给难倒了。陈云问道：“新渝的经纬度是多少？海拔高度是多少？”这使小傅傻了眼，答不出来，陈云看到小傅的窘态，不仅没有批评小傅，反而夸奖小

傅：“不错，情况清楚，是个明白人。”接着耐心地给小傅解释了经纬度，海拔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几个概念的定义。并告诉小傅说：“新渝地处鄱阳湖平原区的西部边缘，整个地形与地势以氏陵为主，而县城及袁河两岸的海拔高度仅为50米左右。新渝的经度为东经114度44分至115度24分1秒，纬度为北纬27度35分21秒至28度5分5秒。”小傅听后感到非常惊奇，下意识地第一次违反不准向领导同志提问的规定，问道：“您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陈云乐呵呵地说，“来新渝之前，我已经看过你们县里的有关资料。”深入的谈话，聊天，使小傅感到面前的这位领导，不仅是一位和蔼可亲、慈父般的领导。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领导。

在另一次闲谈中，陈云给小傅谈到他为何不住楼上时悦：“你们县里领导要我住楼上，意思我清楚，好搞保卫工作，也安静。但我有心脏病，不宜住得太高。我到庐山开会。也不在山上住。”小傅插话说，“你老还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什么，我现在不才67岁么。”听了这些话，使小傅深为陈云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强烈地期望为党、为国、为人民多做工作的精神所感动。

9月15日，陈云告别新渝登上西行的列车前往萍乡。

（李俊贤）

一尘不染为政清廉——陈云考察萍乡安源纪实

昔日的往事，随着时光的推移，许多已变得淡漠，模糊起来。然而陈云视察萍乡安源的活动情景，却还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大概是因为在我 20 多年接待工作中接待职务最高，在萍乡逗留时间最长，接待方式最简朴的一次。所以当年直接为陈云服务过的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感慨万分他说：“陈云同志生活俭朴，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没有半点特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代表，是一尘不染，为政清廉的楷模”。

“生活安排应尽量简单”

1971 年 9 月 15 日，正值中秋前后。煤城的天气不冷不热，天特别的高，特别的蓝，云朵格外白柔娴静，风也显得格外轻曼幽香。这天，阳光明媚和煦，向萍水河撒下一片温和的光芒。

晌午过后，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从南昌方向轻盈地驶入萍乡宾馆。江西的西大门——萍城，迎来了一位特别受人民爱戴崇敬的客人，他就是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他这次视察专区萍乡，轻车简从，随同来访的只有他的女儿、警卫和司机。

小车停稳后，陈云和已在宾馆迎候多时的萍乡市委书记李开禄、市计委副主任孟昭玉等一一握手问好。这位多年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半点架子，身着一套深灰色旧中山服，脚穿一双黑色布鞋，显得衣着整齐朴素。他待人随和，脸带微笑，语言不多。举止文雅严谨，给人以和善亲切之感。虽然没有热闹非凡的欢迎队伍，也没有使用特别接待礼仪，但整个接待的气氛足热烈和融洽的。

这时陈云虽已年近七旬，又经历“文革”的摧残；患有严重的肠胃病，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但他精神矍铄，神态乐观，步履稳健。住在萍乡宾馆二楼一间普通的客房里，室内陈设简单，水磨地板，木板床铺，既没摆烟，也没摆水果。虽说这是陈云本人的要求，不让对他有任何特殊的款待，但李书记心中总觉着有点过意不去。他带着歉疚的心情来到陈云的房间，十分抱歉他说，“首长，我们萍乡条件不好，不到之处，还请多多包涵。您在这里还有几天的时间，生活怎么安排好呢？”陈云诚恳而认真地悦，“不用麻烦你们了，这样已经很好了，有些吃的东西。我自己都带了，生活安排应尽量简单，有豆腐、菠菜就行了。对了，萍乡有豆芽吗？有的话，可以买一点。”李书记即说：“豆芽我们这里有，不过没有北方的好，芽子长得老长老长。”陈云听后，抿着嘴笑了，说：“那太好了，豆芽、菠菜都有了，这样的生活我很满意了。”李书记试探着问，“我们想请你吃顿便饭。什么时候好呢？”他马上严肃他说：“请吃就不用了。”“那么，我们自己掏钱请您吃行吗？”李书记补充说。陈云风趣地反问道。“你们老要请吃饭，萍乡有什么好吃的？”李书记马上说：“包顿饺子给你吃嘛。”“水饺又不是萍乡的特产，是北方的呀，所以就不用吃啦。”陈云对多次的邀请都婉言谢绝了。

此外，陈云还反对市委主要领导陪同。本来市委书记已安排好，自己陪同两天，其余时间由另一副书记陪同。但陈云知道后，硬是不让，说：“我不用陪同。你陪着我还不自在。你们工作很忙，你们白天都干你们的工作吧，晚上你们有时间可以来聊聊天，就这么定了。”他“自带干粮来办公”，每

天需定量进食的花生米，还是自己从南昌带来的，视察工作所到之处，统统都只准清茶一杯。这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这就是一位敬爱的领袖的模范行为。

“到实地去看看”

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陈云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主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他到萍乡后，市委有关领导安排先汇报工作，但他不同意这样做，马上说，不用忙于汇报，先找点有关材料给我看看，然后我要到实地看看，至于汇报以后再说吧。16日，本来市委领导安排他休息，但他架着老花镜在居室内扎扎实实地看了一天的材料，以便从中了解萍乡生产发展情况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从中捕捉各种信息。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虽身处逆境，但心里装着的依然是国家和人民。

萍乡钢铁厂坐落在赣西门户的湘东区境内。50年代萍钢就跃入了国家钢铁生产的先进行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授给萍钢一面红旗。用自己汗水和努力，这面红旗一直在湘东上空迎风高高飘扬。所以，陈云执意要到萍钢去实地考察。

9月17日，秋阳高照，晴空万里。陈云欣然驱车早早向萍钢奔驰而去。远远看去，萍乡钢铁厂，高高的烟囱、水塔、一排排的厂房，镶嵌在碧蓝的天空里，像是一幅瑰丽的油画。

钢铁厂大门口，汽车装着铸铁，原材料穿梭般地进出着，厂区的西边尽头，一列列满载铁矿石的小火车在铁轨上像一条朱红色的长蛇向厂区蜿蜒伸展……厂内人声喧嚷，车间、道路，扩建厂房的建筑工地，到处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此情此景，给陈云脸上带来了满意的笑容。小轿车在钢厂办公楼前刚刚停稳，陈云忙下车，满脸堆笑，一边伸出饱含热情的手，和厂长罗宗文等同志握手，一边十分亲切他说：“你们辛苦了！”这亲切的问候，就像一股暖流注入了大家的心窝，顷刻间流遍了全身，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连连说：“首长辛苦了！首长辛苦了！”到了厂部会客室里，刚刚坐下，陈云就急切地问道：“你们厂里有多少工人？生产情况怎样？工人生活怎样……”罗厂长连忙就陈云的提问一一作了详细的汇报。汇报了炼一吨焦煤需要多少吨原煤，炼一吨铁需要多少吨矿石和焦煤，炼一吨钢需要多少吨生铁，炼一吨铁、一吨钢的成本多少，一吨钢价值多少。然后除掉成本，损耗、管理费、利税等等，生产一吨铁、一吨钢获纯利多少。经过一问一算，陈云对该厂的生产现状与发展前景，工人的生活情况等等，已经心中有数了。

听完汇报后，陈云高兴地对罗厂长说：“你们是基层领导，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厂的工人是一支很好的队伍，你们当领导的应很好地关心他们，他们是主要骨干力量。”又说：“萍钢这个厂，你们在汇报中讲是个小厂，其实你们现在已有三十100立方米的高炉，这就不是个小厂罗，另外，有一定规模了。”接着，陈云对萍钢的领导说：“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子，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没有多少枪，更没有多少炮，武器一部分是靠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一部分还要靠自己武装。这就需要我们自己造土枪上炮，造土手榴弹。这些从哪里来呀？我们当时在延安办了一个5立方米的小高炉。当时的厂长叫徐驰，后来是冶金部的副部长，现在到四川去

了。你想想5立方米的高炉比现在你们100立方米的高炉，那相差多远啊？！可是在战争年代给我们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啊！你们厂现在已经利润达150多万元，贡献不小了……”

“钢铁是国家的重点企业，你们知道么？我们国家这么穷，受帝国主义欺负，就是因为经济发展需要钢铁，机器设备都需要钢材，所以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随后陈云又深入到高炉生产第一线去考察。他亲切和蔼地与工人谈生产、叙家常，亲热异常。本来他还想去工人家里看看，但因时间所限，未遂心愿。离厂前，他以满意加赞扬的口吻说，萍钢过去是红旗高炉，现在仍然保持了先进。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永远保持先进。此番贴心的鼓励，确实成了激励萍钢工人不断前进的动力。多少年来，他们在钢铁行业一直是佼佼者，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

晚上，陈云带着浓厚的兴趣，在住处与李开禄书记亲热地攀谈起来，了解掌握萍乡更多的情况。李书记首先关切地问。“首长今天累了吧？”“不，一点不累。”陈云高兴地回答道，他似乎还想往下说什么，李书记插话，“首长，您今天看了萍钢，有什么指示吗？”陈云谦和而恳切他说：“我没有什么指示，指示都听毛主席的。”接着他又关切地问到萍矿工人的生活情况，煤炭生产情况，萍乡的农业生产情况，李书记都一一作了简要的汇报。当汇报到萍乡矿务局领导将“文革”中形成的群众中的两派都引导到“抓革命、促生产”中去，因此萍矿的生产情况很好，年产量可达300万吨时，陈云欣喜而肯定他说：“这样很好，以抓革命促生产力总体是对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的就是对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的就是错误的。”当汇报到，两派都出现过打人的现象时，他严肃地指出：“打人历代都是犯法的，打人就是不对。”最后，李书记汇报了萍乡的农业生产情况，萍乡的单产很高，亩产达1600斤，实现了亩产双跨纲要，但总的生产水平不高。吃饭还要交粮票，不过我们会继续努力，萍乡要争取达到年产粮8亿斤。陈云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赞赏。

陈云在萍乡考察期间，天天都是白天考察晚上与地方领导交谈，尽量从多方面获取一手材料。

“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安源，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同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书写了我国当代工运史上光辉的一页，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同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叱咤风云，许许多多革命先烈曾在这里流血牺牲。为了宣传和纪念这段辉煌的历史，筹建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云此次萍乡之行，当然少不了要去安源纪念馆参观访问。

9月18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的同志们听说陈云要来馆视察工作，万分高兴，早早就在馆门前等候。上午9时许，一黑一灰两辆伏尔加小轿车缓缓驶进了安源纪念馆广场，停在陈列馆门前。迎候的人群开始有点发愣，心想，这大概不是我们要迎接的陈云吧？因为他曾任党中央副主席，上面交待是一级保卫的接待规格，可现在，前面没有公安摩托开路，后面没有后卫车护驾。正疑惑间，黑色小轿车车门开了，陈云出现在大家面前。

陈云步履轻快地走进展览厅第一室——“安源工人的苦难和斗争。”他静静地听着解说，当讲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安源表现很突出时，他点头表示赞同，当讲到旧安源煤矿简直像一座人间地狱，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时，他深沉地叹着长气。当讲到工人在经济上怎样受剥削时，他紧锁双眉，似乎心里还在算着什么细账——原来他敏锐的目光早已发现了文字说明上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他抬起头，凑近陈列板面，仔细地看了起来。他用手指着文字说明，回头询问他女儿：“你知道一吊钱是多少吗？”女儿听到问话后，忙上前一步，又认真地看了看父亲指着文字说明，显出疑惑不解的神情。陈云瞅了女儿一眼，说：“一吊钱就是一百文钱，当时一吊钱能买一斗米。旧社会工人卖掉一个儿子才得到一吊钱，多惨啊！千万不要忘记过去。”陈云的话不仅是对他女儿的教诲，也是对年轻一代的谆谆教导。

陈云看完陈列馆以后，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总平巷、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所在地张家湾等重要革命旧址。

80间房子旧址，既是当年安源地委办公的地点，又是1930年9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来安源住的地方。当他看到厅堂里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干粮袋、雨伞、文件、行李箱等文物时，饶有兴趣地指着那铁质的行李箱说，我们以前打仗行军时，到哪都是这样的一担。说完，走近文物，伸手将挂在墙上的干粮袋取下，利索地将其往脖子上一套，敏捷熟练地把干粮袋挎到了身上，然后把油纸雨伞夹在腋下，又挺挺身子，笑嘻嘻地对在场的同志们说：“我们当年行军就是这样，”他边说边示范着行军、扛枪、背行李的动作。经过他这么一表演，活生生地再现了当年红军艰苦行军的情景，引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9月19日，正当陈云准备再到其他地方去考察的时候，南昌来电，催促他迅速返昌。

离开萍乡的头天晚上，本来他应作些准备，好好休息休息，以养精蓄锐，适应第二天的长途旅行。但陈云没有顾上这些，他忙里抽闲热忱主动地同为他服务过的孟昭玉主任等交谈叙情，嘘寒问暖拉家常。他感激他说：“谢谢你们了！”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了小本子，递给孟主任，请他将自己的姓名、单位写在小本子上，孟主任用颤抖的手写完后，激动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陈云接过小本子，又把它好好地收起来，他已把普通干部与群众永远珍藏在自己的记忆中。

20日，陈云乘坐长沙至上海的108次列车离开萍乡回南昌，孟昭玉等前往火车站送行。一双双噙着泪水的眼睛望着远去的列车，希望它走得慢些，再慢些，不要在他们的眼中消失；他们又希望火车走得快些，更快些。以便首长能早点平安返昌。他们仁立在站台，直到火车从视线中消失，他们才挪动双脚，依依不舍地离开车站。

（杨桂香）

调查细致奖惩分明 忆陈云在岗面、寨上红军兵工厂视察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在这短短2年另4个月的时期里，蒋介石共纠集了110万兵力，分4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指挥下，红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四次的“围剿”，共歼敌7万余人，共缴枪5.4万多支，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但在1933年9月，蒋介石又重新纠集了10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并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我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使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陈云就在上述战争形势与环境下，于1933年9月，视察了我党领导和创办的第一个兵工厂——中央苏区岗面红军兵工厂。他决定去视察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准备在3天以后，让我同他一道去红军兵工厂一趟。我当即表示：遵命奉陪。3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到了瑞金下洲坝村和陈云见了面。我们随即一道骑马前往，随身只带了日常用品。从瑞金城向西经过七堡、九堡，途中住了一宿，第二天中午到达目的地——岗面红军兵工厂。我原来是在这个红军兵工厂工作，后来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所以陈云特地要我陪他到这里视察，我自然不愿意错过这么个难得的机会。

陈云这次到红军兵工厂视察，主要是到基层去个别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有时几个人在一起谈，谈的题目是他自己想知道的。一个题目谈完了，又出一个题目。在这个厂有一个多星期，调查由厂部到车间和科室，主要调查了枪炮科和弹药科，找了几十个人谈话，白天和晚上都在进行。谈的时候，他总是集中精力听别人讲，讲的越细越好，他自己决不轻易插话。如果他有感觉不清楚的地方，就反复提出，一直到问清楚为止。他有时也做一点笔记，但并不是什么都记。兵工厂的职工虽然是第一次和陈云见面，但都毫不拘束，谈得很自然。很热忱。别人也不知道他的职务，只知道是上级机关去的干部。陈云的态度，是要先当学生的，他的谈吐和表情很客气，别人也就愿意和他多谈厂里面的事。他并没有责成书记、厂长、工会委员长、青年团书记等，以开会的形式向他作全盘的汇报，或者听他作指示，他不愿给厂领导增加任何形式的负担。厂领导有什么困难或意见，他都在个别谈话时谈及了。兵工厂也没有因为上级机关去了人，表示一些招待，一切都表现得很平等。凡接触过陈云的人，都有好感，说他与别人的作风不同。实际上，陈云采取的这种做法，很使他们满意。作为调查者，他只花很短的一个多星期，就取得了全厂全面的第一手资料。陈云这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的作风，始终贯穿在他的全部革命实践中。这正是他始终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正确地指导工作的基点，也是他始终受到尊敬、爱戴的地方！据我回忆，陈三在兵工厂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们还参观了全厂的各个部门，作过如下几个问题的调查：每月各种产品多少？各种产品的质量怎样？支援第五次反“围剿”能再贡献多少？各种设备与工具情况，行政管理有什么问题？党政工团协调动作怎样？工人的团结教育与生活福利情况，供给制可否改为经济核算制，等等。

这个红军兵工厂的创立和发展，是与红军的创立和发展史用一致的。它经过艰难困苦的奋斗，于1931年10月成立于江西兴国县官田村。1933年

又随着战争的形势的发展，才搬来瑞金岗面的。它的设备和技术，显然还是落后的，但它的影响和对革命战争贡献的力量，在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发展史上，都是最早的。独一无二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对这个厂的创立和发展都很关切。第一任厂长吴汉杰，就是毛主席亲自派去的。1931年9月，朱总司令在瑞金叶坪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曾子自对广东一批兵工厂工人参加红军，表示过热烈欢迎，他说，红军缴了敌人几万支枪，但缴枪时被损坏了很多，不经过修理就不能用。现在好了，你们参加，如同“旱禾见水”，很快把红军兵工厂成立和扩大起来，把这几万支枪修好，就等于扩大了几万名红军战士。叶参谋长对红军兵工厂的困难尽量帮助解决，每逢过年过节，都派人携带礼物慰劳红军兵工厂工人。高自立、杨立三、杨志诚、叶季壮先后直接领导过红军兵工厂的工作。江西省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都给过这个厂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岗面红军兵工厂，先后集中了江西和福建各地方与红军各部队的许多修械处所的工人，对于缺少的各类技术工人，如车床、翻砂等，又通过上海和沈阳地下党组织选派此类工人党员参加，或以高工薪聘请，通过秘密交通线，不远千里护送到中央苏区。这样的技术工人，据我知道的就有11名。从红军前方也选择一批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如蒋师傅、高师傅等。兵工厂的男女学徒，规定有一定的条件，许多是从江西兴国县直接介绍来的。

这个厂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官田时，曾侵犯过本地的利益，闹过纠纷；AB团问题也牵连过厂的领导人；闽粤赣三省有的工人，也闹过地方界限；在银坑时，有过一堆地雷爆炸事件等，这些问题和事故，都经过上级的关怀和帮助，比较及时地解决了。红军总政治部郭化若和全国总工会冯新，还有共青团中央也派一人，到银坑解决处理这个地雷爆炸事件。刘少奇还派我去处理过闽粤赣三省工人闹地方界限的问题。

陈云在岗面红军兵工厂时，给了厂方应有的鼓励，期望继续努力，为支援第五次反“围剿”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这里视察结束后，我们又一道到寨上兵工机械厂进行了几天视察，这个厂是从1932年冬至1933年上半年才成立的，实际上，是岗面红军兵工厂的一个分厂。陈云在这个厂视察中，发现职工们普遍对该厂厂长不满意，意见很大。这个厂长姓李，大家不满的主要是他作风不民主，甚至打人、骂人，有的被罚刑。在个别谈话了解中，职工们纷纷要求陈云及时处理这个厂长的问题。陈云与有关部门商议后，认为这个厂长有严重的军阀残余，地不仅不能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上成了阻碍工人生产积极性的绊脚石。因此，必须及时地加以处理。

我还清楚地记得，陈云在大会上讲话时，对情况了如指掌，把他了解到的存在的严重问题，如实地端了出来，并严肃地指出了纠正的办法，当场宣布李厂长的错误，必须撤职查办处分。职工们好像在他们头上搬走了一块石头一样，当即雷鸣般地长时间地鼓掌，表示十分拥护！职工们都高兴地跳跃起来，一个个向陈云投去了敬佩的目光——他是哪里派来的“神仙”、“包公”呀？

陈云及时地果断地处理阻碍职工积极性发挥的李厂长的事，很快传遍了连岗面在内的整个兵工厂，广大职工亲自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的品格。职工们从此更积极地增加生产，支援红军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争取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经过这一次从岗面到寨上的视察，我常常地感到陈云的工作作风是扎扎实实的，是实事求是的。首先，他的思想方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先有存在，后有思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例如，寨上兵工厂的情况，他很不满意，不仅开了一次大会，他讲了话，还亲自宣布该厂厂长错误严重，必须处分。在岗面兵工厂的时候，他对该厂的情况比较满意，因此，他只采取个别谈话，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奋斗。这两个厂的情况根本不同，处理的方法也根本不同，作了明显的区别对待。

陈云丁仅平易近人，深入现场调查，注重了解第一手情况，在生活方面则是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表率。当我们近中午时分到达岗面兵工厂时，我和厂部总务科长打了招呼，请他们安排陈云的食宿，随后我就到基层生产单位找韩日升厂长去了。当我返回厂部时，已过午饭时间，发现陈云还没有吃午饭，桌上放着一个香烟罐头盒子，我以为是进口的香烟，他说，里面装的是辣椒粉，准备没有菜吃的时候，就用它。我好奇地打开一看，的确是辣椒粉。为此，我感到不安和过意不去，怪我疏忽，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使他仍饿着肚子，但陈云对此却毫无怨言，我立即再与总务科联系，才炒了一盘白菜端上来，他和我一同进了午餐。

（马文）

伟人的博大胸怀——忆陈云江西“蹲点”

1969年10月，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被下放江西无限期的“蹲点”。身处逆境中的陈云，不顾年老体弱，不避冬天严寒和暑天炎热，深入工厂、农村、学校，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关注国家经济建设，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思想品德。

陈云在江西“蹲点”中的感人事迹甚多，限于篇幅，这里仅略述若干鲜为人知的事实，以飨读者，表达笔者的思念和缅怀。

相识

1995年4月10日晚上8点钟左右，惊悉陈云逝世，万分悲痛。11日，接到陈云办公室电话通知，12日我和女儿赴北京参加向陈云告别仪式。

从北京归来，心情沉痛，昼夜难眠，思绪万千……

20多年前，陈云被下放江西“蹲点”的情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他给我的谆谆教诲与关怀，历历在目，在我脑海中翻腾。

我从1951年10月参加上地改革工作时，才知道。从那以后，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在文件中看到他的报告、讲话、指示；在新闻纪录影片里看到他的身影；在党、政、军机关会议室等庄重场所看到他的肖像。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与这位伟人相识，而且连续几年当面聆听他的谆谆教诲，目睹他的风采。

“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8年7月我从省委组织部被下放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该厂于1969年5月划归江西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春兵团撤销，恢复原厂名。1992年和江西锅炉厂组建成江西锅炉化工石油机械联合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恰好该厂被选为陈云“蹲点”的地方。我有幸被组织上指定负责安排陈云在厂“蹲点”的有关事项，从此与陈云相识，因工作关系，由生疏到熟悉，交往20余年，结下了深厚情谊。

住与行

1969年春，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形势日趋紧张。

这年10月初旬的一天上午，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陈云到江西“蹲点”。随员有秘书、警卫员和厨师。要求省革委尽快给陈云安排好住房和选好“蹲点”的地方。当时，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确定，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今江西省军区第一干部休养所）负责安排住房和生活，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负责安排“蹲点”。

10月18日，陈云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离京南下，由秘书肖华光、警卫员李奇和厨师老汪等陪同，乘火车途经上海，于20日上午到达南昌，住在滨江招待所一号楼。因青云谱干休所住房尚未准备好，陈云只好任在滨江招待所等待。直至11月4日，陈云才从滨江搬入青云谱干休所。

陈云的住房，坐落在干休所院内的一座小山坡顶上，是50年代建的一栋简陋平房。原来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彭德怀元帅曾在此住过。

南昌的冬天，寒气袭人，室内外气温几乎一样。在北方生活惯了老人，

要一下子适应室内没有暖气的生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秘书、警卫员有些发愁、担心。为解决这一难题，地方领导决定，临时安装一台小锅炉。

陈云没有从北京带司机，江西省革委会给配了一辆破旧的华沙牌轿车和一名司机。轿车的废气排放管严重破损，第一次开到厂里，厂汽车队帮修理了一下，勉强使用。司机徐广勤对陈云说：“首长，这辆车太旧了，坏了难修，换一辆吧！”陈云听后，笑了笑，说：“配给我们什么车，我们就用什么车。”司机了解陈云一贯俭朴的作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直至1970年7月初，陈三回京休假，司机徐广勤趁机找省革委车队换来一辆稍微好一点的天蓝色伏尔加轿车，一直用到离别江西回北

陈云的住房、生活和交通工具等问题虽得以基本解决，但饮水问题，青云谱干休所难以解决。干休所内的水质不好，陈云的肠胃消化功能适应不了，一喝所内的水就泻肚子，不得不三天两大从别处运水来喝。

当年，陈云身体虚弱，易感冒和泻肚子。1970年春的一天，我到他住处，陈云说：“老马，我只吃了8粒用水煮熟的花生米就泻肚子。”干休所的卫生所医疗条件有限，不得不到市内的九四医院检查治疗。

青云谱干休所的生活环境，虽说还可以，但毕竟不如北京的条件。陈云身边几位工作人员远离家属，长年累月分居两地，家里有些实际困难，无法关照解决，希望早日回北京。陈云在深表同情的同时，耐心告诫他们：中央什么时候通知回去，我们就什么时候走，没有通知，就安心住下去。可是一住就几个年头，渡过了三个冬春的艰难岁月。

巧合

陈云之所以被安排在青云谱干休所居住，据说原因有三：一是便于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因两地相邻很近，往返方便。二是部队干休所，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三是离市区不远，生活比较方便。

青云谱干休所与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两地紧相邻，仅隔一狭长的小湖——青云湖，一南一北，遥遥相望，直距300米左右。从干休所驻地乘车途经小湖北岸前往该厂，约3分钟左右的路程。

青云谱干休所东北面约300米左右的地方，有座驰名中外的“八大山人纪念馆”。这里古树参天，修竹摇曳，流水潺潺，风景秀美，幽雅寂静……不满朝政的明宁献王后裔朱耷（号八大山人）隐居此地，创作了大量具有独特风格、讽刺朝政的画。当时，陈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委员，但毕竟是有名无权，已被排挤出京城，“发配”江西，他“蹲点”的住地，恰好与朱耷隐居地紧相邻，遥遥相望。这虽是偶然的巧合，颇使人觉得别有一番滋味。

称呼

当时出于保密，地方领导为如何称呼陈云，还颇费了一番心思。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省革委派人到厂布置接待安排陈云“蹲点”的任务，要求指定专人负责接待，做好保密工作，保证陈云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是省劳改部门所属企业。厂里除国家职工外，还有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刑满就业人员，分散在各个车间。这些就业人员政

治情况复杂、大部分是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过去，这个厂属于保密性单位，从不对外，更没有接待过我党政军要员。厂里几个领导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一时不知所措，经反复研究决定，按照上级要求，出于安全考虑，对陈云来厂“蹲点”，实行严格保密，要求全厂职工严格遵守，不得向厂外泄露，违者惩处。但对陈云如何称呼，深感发愁，不知如何为好。称喊“陈云”，暴露了真实姓名，不允许；称呼“首长”，人们也会猜测，肯定是中央高级干部，不利安全。再三斟酌，确定称呼“客人”。然而陈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度高，谁不认识呢？保密谈何容易。陈云第一次进厂后，人们一眼就认出了“客人”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实际上是保而不密。全厂职工似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只是碍于上级规定、才没公开称呼陈云的职衔和姓名，在厂内谁也没有照规定称呼“客人”，而是以尊敬的口吻称呼首长或老首长。但是在社会上谁也没有泄露陈云在厂“蹲点”的消息。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69年11月12日。

初冬的南昌，北风阵阵、显得有些冷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办公楼周围干枯的树枝在冷风中微微抖瑟着。

在二楼会客室里，各科室负责人怀着惊喜交加的心情等候“客人”的到来。人们的心情似乎有些紧张，都在猜想今天来的“客人”是何许人！

8点钟，一辆华沙牌米黄色轿车从厂东大门驶入，在办公楼门前缓缓停稳后，警卫员李奇迅速下车拉开车后门，“客人”从车里走了出来，面带笑容，向大家挥手致意。团长黑志高、政委刘素文迎上前去向“客人”敬军礼、握手，表示欢迎。这时，尽管他俩已认出“客人”是陈云，但出于保密，他们不能直呼其名；按规定称“客人”，又实在叫不出口。最后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黑志高，不顾原先规定，首先打破沉默，高声向陈云说道：“欢迎首长来我们厂蹲点。”陈云听后，笑了笑，用慈祥眼光望望面前这位穿军装的现役军人，带着浓重上海话音爽朗地说：“我到你们厂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一阵喧闹声传入二楼会客室，人们急忙起身走向窗前，透过玻璃往下看。这时，陈云正走近办楼大门边、有的同志一眼就认出来了。惊喜地叫了一声，啊，来的“客人”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顿时，会客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眼光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会客室的大门，期望“客人”的到来。

正在二楼办公室接电话的副团长张守信（地方干部）得知陈云到了，急忙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下楼迎接，正好在楼梯半中间与陈云迎面相遇。张守信欲驻足张口表示欢迎，陈云倒先发话说：“我到你们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张守信回答说：“欢迎、欢迎！”

那天，陈云穿了一套半新半旧的深灰色卡机布中山装和一双黑布鞋，戴一顶深灰色帽子，外面披一件咖啡色海虎绒领的草绿色军大衣，衣着整洁朴素，全然像一位普普通通的百姓，毫无一点中央首长的架子，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昔日的劳改企业，普普通通的工人，从未接待过党、政、军要员，如今

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来厂无限期的“蹲点”，职工们感到震惊和自豪。陈云来厂“蹲点”的消息，像空中电波似的，迅速在全厂传开了，当日中午全厂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人们盼望早日目睹这位伟人的风采。

当年，陈云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头发斑白、人很清瘦，但神采照人。那天，他健步登上二楼会客室落座后，发觉在座的大部分是穿军装的现役军人，都显得有些拘束和紧张，个个沉默无言。陈云首先打破了沉默，逐一地询问每人的年龄、籍

当问到黑志高时，陈云十分肯定地说道：“听你的口音，你是山西人！”

“是！山西×县人。”黑志高笑着回答。

陈云听后，风趣地说：“山西人喜欢吃醋啊！”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沉闷气氛，随之驱散。

在活跃的气氛中，黑志高向陈云汇报厂里的情况。他说：这个厂是1958年兴建的。50年代初，只是几十个人的汽车修理厂，1958年从市内迁到这里，改名力“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1968年初实行军管，1969年5月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划归兵团，按部队编制，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车间实行营、连、排、班建制。全厂1600余名职工，其中有“文革”前的老工人，有1968年7月进厂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有复员退伍军人。另外，还有劳改、劳教刑满就业人员100余名。厂里有比较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几百台比较先进的机床设备。主要生产化工、炼油设备等产品，可为化工、冶金、橡胶、制药、水泥、化肥等行业提供设备，年产3000吨左右，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1968年试制成功了技术要求高的化肥厂关键设备——离心机。可以生产年产5000吨化肥的成套设备……

陈云是管工业经济的专家，熟悉化工、炼油工业，尤其是化肥工业。当他听到黑志高介绍说厂里可生产出小化肥厂的成套设备时，高兴他说：“你们厂不错啊！是个大有可为的厂子。”尔后，又深有感触他说：“我们国家的化肥工业还很薄弱，发展比较慢，化肥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像你们这样能生产化肥厂成套设备的厂子，从全国来说，不是很多，国家很需要你们这样的厂子。”陈云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在座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黑志高汇报完后，请陈云讲话。陈云谦让地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搞点调查研究。现在还没有发言权，还是请在座的各位多给我讲点厂里的情况。”在陈云的要求下，政委刘素文、副团长张守信分别补充介绍了厂里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情况。陈云边听边记，偶尔插话询问企业管理、流动资金的使用、勤俭办厂、职工生活等问题。

当年，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处在高潮时期。当汇报中提及厂内“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大批判”等情况时，陈云只是听听而已，不记录、不作声、不表态。那天座谈会结束时，陈云再三谦虚地说：“我过去下基层不多，这次到你们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搞点调查研究，希望你们多帮助。”边说边起身告辞。团长黑志高对他说：“首长，您到厂里来有什么要办的事情，由马骏负责办理。”陈云应声答道：“好啊！”转向我笑笑，风趣地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骏马跑得快！”边走边说，快要走出会客室门时，回转身说：“老马，我明天上午来，请你找几个技术员和老工人来开个座谈“好！请首长放心，一定安排好。”我回答道。

从此，陈云开始了他三年的“蹲点”生活。

伟人的足迹

“蹲点”开始后，陈云不顾身体虚弱，不避冬天的严寒和暑天的炎热，深入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双脚踏遍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厂里有铸工、铸锻、木模、金工、容器和机修等车间；有中心仓库、钢村与铜材库、试验室；有汽车运输队、职工食堂、医院、子弟学校、“五七”生产队以及家属粉丝加工场等。陈云轮流到这些地方去，他走到哪里，就同那里的职工亲切交谈，聊家常、谈生产、讲勤俭，有说有笑、谈笑风生、气氛热烈而亲切。

那时，社会上对知识分子有不公正的称呼，说成是“臭老九”。陈云在车间和厂职工子弟学校里同技术员、教师握手后，幽默地把手放在鼻子前闻闻、然后风趣地说：“啊！‘臭老九’的手不臭呀！”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有一次，陈云走进食堂厨房里看炒菜，一位不久前才从车间调来当炊事员的年轻工人，正在炒菜。看到陈云站在旁边观看，有些紧张，一时手忙脚乱。

陈云问道：“当了几年炊事员？”

“不久前从车间调来的，以前在部队也当过炊事员。”年轻工人回答道。

陈云上前拍拍这位年轻工人的肩膀，并亲切地鼓励说：“炊事员也是一门技术，和车间一样的，好好干，都是有出息的。”

年轻工人回答说，“感谢首长的鼓励，我一定好好地干。”

1970年一批退伍兵分到厂里当工人，住在用旧厂房改建的单身职工宿舍，厂里规定4人住一间，睡上下铺。一天上午，陈云走进一间宿舍，一位上中班的退伍兵工人正在休息。陈云进去后，这位工人急忙请他坐下。在下铺落座后，陈云和这位工人聊起天来，询问他在什么地方当兵，当了几年，多少岁数，什么地方人。这位工人一一作了回答。

陈云看到这间房有十几个平方米，一个上下铺床只住了两个人，很宽敞的。陈云认为这生活条件是很不错的，他说，“你们住房条件很好啊！”

“睡下上铺，要住几个人，这有什么好的罗！”这位工人爽直地回答说。

陈云听后，语重心长地回忆说：“20年代，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工时，住的是鸽子笼似的亭子间，睡觉时不能伸直脚，所谓的房子，一点点大，比你们现在的住房条件差得远哩！”陈云的一席话，说得这位退伍兵很不好意思。

厂中心仓库，是全厂的半成品、原材料和配件的集散地。门前挂了一块写有“仓库重地，闲人莫入”8个大字的牌子。一天，陈云去该仓库参观。走到库房门前，负责人汪坤急忙出来迎接他进去。陈云用手指指门前墙壁上挂的牌子，幽默地说：“上面写了‘仓库重地，闲人莫入’，我能进去吗？”

汪坤不大好意思地说：“首长例外，首长例外，请进，请进！”

“好！你批准了，我就进去罗！”陈云笑嘻嘻地说。

陈云在汪坤带领下进入库房内，在一间一间的库房里仔细察看库存物资。然后，他略带肯定的口吻对汪坤说：“库房内物资价值有二三百万元吗！”

汪坤惊讶而钦佩他说：“首长、您真是个有眼力的行家。”并告诉陈云：“总共有二百余万元。”

陈云沉思片刻后，说：“仓库物资积压多，生产流动资金周转就困难，要靠银行贷款吧！”

当年厂里的确如此。购买原材料扩大生产的资金，大部分靠银行贷款解决。

从此以后，陈云很关注仓库的问题，经常去看看，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仓库里有位上海籍的女保管员，陈云听她带上海口音，便对她开玩笑说：“侬是上海人，阿拉也是上海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云在金工车间参加政治学习会，散会后，向老工人龚火生问道：“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厂内生活区。”龚火生回答道。

陈云说：“上你家看看，可以吗？”

龚火生急忙高兴地回答说：“欢迎！欢迎！”便陪同陈云到了家里。

陈云看到火生家里很简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便问火生夫妻俩一个月工资收入多少。

“不到一百元，还要供养老人。”火生回答道。

这时，火生的大孩子进屋来了。陈云便问：“你几个孩子啊！”

火生回答说：“两个。”

陈云亲切地说：“有两个就可以了，不要再生了。”

火生有点难为情似的，回答说：“再生了。”

陈云又走进厨房去看，先打开油、盐罐子又掀开装米的缸子看看，装的米不多。陈云关心地问道：“4口人吃饭，粮食够吗？”随后又说“我一个月定量26斤，有节余，你家米不够吃，我送些粮票给你。”

火生感激地说，“不用了，我家粮食够吃了，谢谢首长的关心。”

1972年4月，陈云回到北京后，给我写信时还问及龚火生的情况。

陈云除到工厂各车间视察外，还经常召开各种座谈会，参加生产调度会和车间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评比会等。总计200次，开会时，陈云习惯侧着头静静地听人发言，几乎不说什么，偶尔提出一些问题。在参加各种会议的同时，他还分别找原厂级、中层、一般干部、新老工人、退伍兵、现代军人、技术员、教师、医务人员、炊事员等个别交谈，约100余人次。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找人个别交谈，他都是亲自记录。

陈云深入调查研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了解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摸清了厂里的情况。据我所知，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办好这个厂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可惜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里，他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没有全部被采纳和实施。

关注职工食堂

陈云认为，一个工厂，办好职工食堂极为重要。不办好，很难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就难上去。当年，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1600余名职工，只有一个食堂，房子简陋，办得不算太好，职工意见较多。尤其是单身职工，意见更多。陈云到厂不久就听到反映，引起了他的关注。除常到食堂看看外，1970年4月间，特意在食堂蹲了半个多月，召开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座谈会，

参加食堂班组政治学习会，找人个别交谈，发现突出的问题是部分炊事员不安心工作。在座谈会上，炊事员们说：车间发工作服，食堂只发一条白布围裙，不合理；炊事员起早摸黑，吃力不讨好，还常挨人骂，谁愿在食堂工作。陈云听后，幽默地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关键是这个。”他认为，办好食堂，人的因素很重要。不安心食堂工作，是思想认识问题。他语重心长他说：“革命工作总是有分工，炊事工作，什么时候都要有人干。”座谈会后，他把炊事员反映的待遇问题，及时转告厂领导，并建议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厂里采纳了陈云的建议，立即给炊事员发了工作服。炊事员们深受感动，不安心的安心了，食堂很快就有了起色。

1970年春的一天，陈云从车间出来又转到食堂，正好是开饭时间。工人们看见陈云来了，就围在他身旁，异口同声地说：“首长吃饭。”有的说：“尝尝我们食堂里的饭菜的味道。”陈云笑笑的，连声说：“谢谢！谢谢，回去吃饭。”一位北方籍的工人说：“我们食堂，天天都是大米饭，想吃面条和水饺，没有。”陈云沉思片刻，“噢！”随后，又与几位工人聊了聊，询问一些情况，就离开了食堂回住处了。

过了几天，陈云见到了厂负责同志时，就说了工人想吃面条和水饺的问题。他说，“这么大个机械厂，做一台加工面条机和包饺子不会有困难的。”政委刘素文很重视这个问题，组织几名技术员和老工人，很快就设计、制造好一台包饺子，一个小时可包1000只左右的饺子，增加了饭食品种，满足了爱吃水饺的职工的需要，职工们高兴他说：“多亏首长的关心，我们才吃上水饺。”

陈云认为，食堂里的饭菜、品种、质量满足职工的要求固然重要，但价格要合理，应尽可能便宜，让职工少花钱，又吃得好。他说：“要认真搞好成本核算，既不亏本，也不要赚钱。”当时，二级工月工资36.5元。在食堂吃饭，一个月要20元左右，除吃饭钱外，所剩无几，结婚成家，养老婆孩子就困难。

陈云每次到食堂时，都要告诫炊事员们搞好卫生，尤其是蔬菜，要洗干净。他走进厨房里仔细查看锅。盆、碗筷、切菜板等炊事用具干净不干净，并询问几天打扫一次卫生。

摆正政治与生产的位置

陈云轮流到各车间参加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每次都是准时到。工人发言，他静静听着，偶尔插话提些问题。当时，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专家治厂”等等的年代。学习会，实际上是念念报纸，千篇一律的议论“政治挂帅”，谁也怕理论联系实际，讲生产问题。陈云参加各车间工人政治学习会后，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工厂只讲突出政治，不研究生产，这样行吗？”他认为，应摆正政治与生产的位置。容器车间下料班，在陈云的启发下，班长主持学习会，大胆地联系车间生产情况，讲成绩，摆问题，找措施，工人们觉得这样的学习很有收获。陈云听了工人发言，高兴他说：“这样的学习会，我百分之百的赞成。”他同工人一起研究探讨下料不浪费材料问题，告诫工人们树立节约观念，并语重心长他说：“工厂就是要多研究生产问题，只讲革命，不讲生产，那我们吃什么呢？”

提倡勤俭办厂

1969年11月中旬，陈云进厂后连续召开了几个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介绍。

一天，陈云对我说，“听了几天，已听到不少情况，座谈会暂不开了，先到车间去看看。”

“几个车间，一个一个看，先到金工车间看，可以吗？”我征求陈云的意见。

陈云满意地说：“听你的安排罗！”

陈云连续看了几天车间，看到工人们忙于生产，干劲很大。他称赞说：“不错啊！”

陈云每到一个车间，工人们都以尊敬的眼光望着这位伟人，而陈云则笑着挥手致意，用慈祥眼光注视大家。初次见面，说话不多，只是互相表示敬意。

容器车间，电焊是主要工种，几乎所有产品靠焊接而成，需要消耗大量的电焊条。在生产过程中，有的工人注意不够，电焊条有些浪费现象。陈云参观这个车间时发现地上随处可拾到长短不一的电焊条。走出车间门外，又发现一堆垃圾中也有好多长短不一的电焊条。他驻足仔细地观察，沉思片刻后问我：“这些焊条当垃圾处理，没有人负责收集起来呀！”

“是”，我答道。

“太可惜了。”陈云惋惜地说。

陈云又说，“这些东西不能充分利用起来吗？”

陈云沉思了一下，又说：“我看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加工成铁链条，农村需要。”

容器车间有浪费现象，其他车间也有。陈云很关注这个问题。反对浪费，提倡勤俭办一切事业，是陈云的一贯思想。

从那以后，陈云在与厂负责人交换意见时，告诫厂里应重视勤俭办厂的问题。建议经常对职工进行勤俭办厂的思想教育，树立勤俭办厂的观念。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大，底子薄，时时、事事都要注意节约。”陈云无论是与职工个别交谈，还是参加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或是生产调度会，总是告诫职工要勤俭办厂。1971年4月20日上午，他到厂告别时，跟几位正副厂长交谈中，作为主要话题，谈了很长时间有关勤俭办厂的问题，充分体现了陈云的勤俭办厂的一贯思想作风。

关注教学改革

南昌，地处长江中下游，素有“火炉”之称。6月的南昌，雨季基本过去，暑天来临，气温高达摄氏30多度，炎热难受。

1971年6月的一天，陈云从《江西日报》上，看到南昌市第十九中学的“复课闹革命”、教学改革搞得好的消息。他不顾暑天炎热，在警卫员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前往该校参观考察。

十九中校革委召集教职员和驻校工宣队座谈会，向陈云汇报“复课闹革命”、教学改革情况。陈云静静听，并作记录，不多说话，偶尔插几句话

询问有关问题。他总是谦虚地以探讨问题的口气同到会者座谈。当他得知该校师生没有人参与社会上的打、砸、抢活动时，高兴地连声称赞道：“很好！很好！”

陈云认为，教学改革，要朝着有利于学生向德、智、体三个方面发展的方向去改革。

“文革”中，十九中的教师没有被下放农村，在学校搞教学改革。陈云高兴地说：“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教育事业还是会兴旺发达的。”

在座谈中，陈云与物理、化学老师探讨改进教学方法问题。他认为，有了好老师，还要有好的教材。他告诫教师们：“你们不要小看教材问题。”

这时，校革委负责人拿给陈云一套新编的教材（课本）。他高兴接过后，顺手翻开了看内容，赞扬说：“编得还不错。”接着，又补充说：“我觉得内容还浅了一点，要加深些。你们讲课时，还要补充一些知识去讲。”

陈云说，要办好一所学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除要有好的教师、教材之外，关键是党的领导。

最后，陈云谦虚地对大家说：“我的意见下一定对，供你们参考。”

临别时，陈云拿着课本对学校负责人说：“我把这套课本带回去看看，请你算算要多少钱。”校负责人再三解释说，是赠送，不收钱。陈云改口说：那就算送给我做个纪念。还再三表示谢意。

陈云参观考察南昌十九中之后，又回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职工子弟学校考察。召开教师座谈会，向他们介绍南昌十九中“复课闹革命”、教学改革的情况与经验。

在座谈中，一位教师反映说：“现在老师讲课，学生不愿听，教学效果不够好。”陈云认为，这是教学方法问题。他用生动而通俗形象的语言打比喻说：“教书，应该像跳秧歌舞。秧歌舞是向前走两步，后退一步，跳起来好看。后退一步，就是要学生听课后，认真复习，巩固老师讲授的知识。”

接着，他告诫说：“千万不要像开汽车那样，一溜烟似的只管往前跑。”

在座谈中，几位教师流露出一不安心工作的思想。他们说：“老师是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挨批判，当老师没有意思。”陈云听后，笑笑，幽默地说：“我看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没有发现那篇文章中说了老师是‘臭老九’啊！”逗得老师们笑了起来。

陈云说：“小学很重要，是打基础的，小学基础打得好坏，关系到升初中、高中，直至升大学。”他没有责怪与会者的说法，而是从正面鼓励他们安心教师工作。

陈云问一位年龄较大的教师，什么时候开始当老师的。这位女教师回答说：“1951年。”陈云风趣地说：“你是解放牌罗！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知识分子。”

陈云的话语中，充满着赞扬与鼓励，教师们深受鼓舞！

请假条

陈云在厂“蹲点”期间，每次参加会议都是准时到。惟独1970年4月间有一次原定参加食堂炊事班政治学习会，因临时有事不能按时参加，他用一小块《红旗》杂志封面纸写了一张请假条，由警卫员送到厂里来请假。陈云是这样写的：“马骏同志：今天下午3时食堂班组会，我因事不能参加，请

假。明日食堂班组会，我准时参加，请告食堂同志。陈云 23 日上午。”

1970 年 7 月初，陈云回北京休假，同月下旬回到南昌。因大大热，身体欠佳，忍受不了，他决定去福州避暑。除向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之外，还给省革委写了请假条，说明去福州的原因，得到他们认可后，才动身离开南昌前往福州。这两件事充分体现了陈云严于律己的作风和高度的组织观念。

毛竹能代替钢材吗

1970 年春的一天上午，陈云正在住处看报纸。我进去后，叫了一声“首长”。陈云笑着应了一声，说：“你来了！”然后，摆摆手，示意要我在他左侧沙发上坐下。等我落座后，他亲切地问道：“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还没有看到。”我应声答道。

陈云用慈祥眼光望望我，并微笑地说，“报纸上登了江西用毛竹代替钢材生产汽车部件的消息。”他边说边将报纸递给我，说：“你看看。”

陈云用红铅笔在报纸上画了红线条，作了明显标记。

陈云表示疑问，他说：“毛竹能代替钢材吗？”

同年 5 月下旬的一天，陈云由秘书、警卫员陪同前往江西汽车制造厂参观考察。据说陈云到江西汽车制造厂参观考察，就是想看看该厂有没有用毛竹代替钢材生产汽车部件。

心系农村

1971 年，陈云在关注工业生产和教学改革的同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三次深入南昌县罗家、八一公社参观考察，调查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给南昌县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5 月 17 日，陈云兴致勃勃地参观罗家公社农科所两稻一麦“三熟”试验田和胡家大队“新农村”。看到一排排新建房子，问道：“这就是‘新农村’呀！”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殷丑子回答说：“是！”陈云若有所思，对殷说，“房子的窗子要开大些，小了空气下流通，人的寿命受影响。”

同年 9 月的一天，秋高气爽，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南昌县农村，晚稻长势喜人，呈现丰收在望的景象。这时，陈云风尘仆仆地又到该县八一公社参观考察。淡溪大队党总支书记谢正棋向陈云汇报情况时提及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由生产队办食堂的经验教训，陈云插话说：“这个不必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不是靠吃出来的，而是靠干出来的。”

1971 年国庆节的第二天，陈云轻装简从到达南昌县八一公社大昌大队参观考察。在临时借用养路队一间非常简陋的办公室里，听取大队党总支书记魏际福汇报情况。陈云看到这位书记很年轻，便问道：“你年龄多少，什么文化程度？”

“31 岁，高中毕业。”魏际福坦率地回答。

陈云听后，高兴得站起来，兴奋地说，“你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大有希望啊！”接着他又语重心长说，“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你们青年一代身上，要勇挑重担，加倍努力工作。”陈云对这位年轻书记寄予殷切期望。

魏际福汇报说：“解放初，大昌 40% 的田种单季稻，亩产 500 斤左右。”

产量低的原因是农田用水问题未解决。1958年兴建了赣抚平原灌溉工程，解决了用水问题，一季稻变为双季稻，亩产1000斤左右，跨过厂纲要（800斤）。“陈云聚精会神地听，并作记录。偶尔插话提出问题，魏际福一一作答。陈云说：“要力争晚稻超早稻。”

魏际福汇报社员群众生活情况，他说：20%的家庭有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陈云听了后，高兴地说，“老百姓有现在的生活，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好啊！”

陈云关切地问道，农村孤寡老人的生活怎么样？

魏际福实率求是地汇报说：大昌大队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即保住、保吃、保医、保穿、保葬。逢年过节时，进行慰问。

陈云得知大昌大队的孤寡老人能得到这么好的照顾，非常高兴，连声赞扬：“好！好！”并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到你们这里来当五保户，欢不欢迎呀！”陈云这句话，可把在座的人逗乐了，哄堂大笑起来。

陈云除到南昌县农村参观考察外，于1971年5月、9月中旬，还到南昌钢铁厂，江西氨厂、新余钢铁厂、江西钢厂和萍乡钢铁厂参观考察。

告别江西回北京

1972年4月19日上午11点半钟左右，陈云的秘书肖华光来厂告诉我，“首长要离开江西回北京，明天上午8点钟到厂里来告别，请转告厂领导。”

第二天，3位正副厂长李健、张守信、李彪和军代表刘喜顺提早上班在办公楼门前等候陈云到来。8时许，陈云在秘书陪同下，准时到达。他一下车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来告别，过几天就要回北京去了。”

陈云在几位厂长陪同下步入李健厂长办公室话别。

陈云在厂里蹲了几年，深入调查研究，对厂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他认为，厂里的职工素质、技术力量、厂房设备等都是很不错的，是个大有可为的厂子。他对这个厂寄以殷切的期望。在与几位厂长交谈中，就如何办好这个厂，他很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设。令人难忘的是，陈云着重谈了政治与生产的关系、勤俭办厂、调动职工尤其是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等问题。这是他给厂里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岁月流逝，光阴似箭，陈云在厂里“蹲点”历时3个冬春，他的光辉形象，给全厂职工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陈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接触各方面的人甚多，而更多的时间，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从厂长办公室话别出来，迈着健步前往各个车间向工人们告别。工人们看到他来告别要回北京去，放下手中的活，怀着深深的敬意和依依不舍的心情，簇拥在陈云身旁，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而陈三却亲切地一个个呼喊工人们姓名。在木模车间，他仍以往日的风趣，称呼一位老工人熊桂芳：“熊师傅，八月桂花香”。工人们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一路顺风。

陈云带着全厂1600余名职工的深情、爱戴、祝福，依依不舍地向职工们挥手致意，告别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

22日上午8时，李健、张守信、李彪、刘喜顺和我等十余人代表全厂职工到南昌火车站送行。

（马骏）

深入基层求实创新——忆陈云江西“蹲点”片断

1969年10月20日至1972年4月22日期间，陈云在江西蹲点搞调查。在这2年7个月的时间里，他老人家除了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研究外，还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召开座谈会，广泛找基层干部、工农群众谈心，听取他们的心声。当时我在江两省革委办公室工作，曾多次陪同陈云去工厂下农村，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他老人家当年那种不顾年老体弱，不辞辛苦，成年累月、风尘仆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江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领导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深受教育和鼓舞！

“我是来向江西人民学习的”

1969年10月3日上午，我在办公室值班，专线电话铃响了，这是北京来电。出于职业本能，我预感这一定是重要的电话，果然电波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他问我“省里哪位领导在家？”、“哪位领导离电话机最近？”我说：“省里领导都下乡去了，离省城最近的陈昌奉也在50公里外的安义县，无法转接电话”。（过去我在庐山曾陪同周总理游泳，他认识我）便令我认真记录，总理亲自传达中央指示，“陈云带秘书、卫士来江西蹲点搞调查研究；要在市郊区选一座单独的房屋，要有暖气设备，房租要适当收一点；要派一部专车，选一个好司机；调研要妥当安全”等，指示扼要明确。当时我心想：总理对陈云是多么关心啊！接电话后，我立即向程惠远主任作了汇报，他于当天下午驱车向远在婺源县的省革委主要领导作了汇报。经研究确定，由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同志负责落实。遵照总理指示，选择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8号房（原解放军四十五速成中学校长韩梅材的宿舍）为住房，又选择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当时是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为蹲点调查研究的地方。

金秋十月，井冈竹翠。10月20日，陈云及三位工作人员（肖华光秘书、李奇卫士和厨师）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南昌。陈云头戴轻便帽，身穿草绿色军装，脚穿黑色皮鞋，第一个走出软卧车箱。我们迎了上去，向他敬礼、握手！安排他们4人住省革委滨江招待所一号楼下榻。第二天上午，省革委、省军区几位主要负责人到滨江招待所看望陈云，由陈昌奉向他老人家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郭光洲时，陈云拍拍额头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还记得我么？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认识了。”他又说，“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在瑞金吧！？”郭光洲惊讶地说：“您的记性真好！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开会，还多次听过您的报告呢！”这么一来，整个接待室气氛活跃起来了，笑声朗朗，接着，省革委、省军区主要领导汇报了江西的情况。陈云谦虚地说：“江西是革命老区呀！我多次到过这里，这次是奉令来蹲点搞调查研究的，是来向江西人民学习的。”

陈三在滨江招待所住了10多天，我随同陈昌奉多次去看望他老人家。陈昌奉是毛主席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与陈云是老相识，他俩既谈工作又叙友情。陈云很关心江西的工农业生产和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问得很细。

11月初，青云谱干休所8号房尚未修好，锅炉还在安装，陈云就住进去了，并于当月12日赶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当时，陈云住的8号房，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单门独院的平房，是解放初期修建的，设施简陋，

普普通通的老式家具，冬天无取暖设备。好在这栋房子周围树木环抱，种了花草，环境比较清静。这样简陋的房子，陈云住了三个冬春。如今人们去瞻仰这座平房，要不是房门上挂着《陈云同志旧居》的牌子，准能想象得出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啊！

“要狠抓技术改造”

1970年4月27日，陈云的秘书肖华光给我打电话说：“首长想去江西氨厂、南昌钢铁厂看看”，并说：他要写材料，没有时间陪首长去，要我与卫士李奇陪同前往。我当即表示同意。心想：这是一次直接向陈云学习调查研究领导艺术的好机会。并立即电话通知这两个厂的领导，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4月28日上午9时，我与卫士李奇陪同陈云乘坐一辆浅兰色的伏尔加牌老式轿车，直驶南昌市东郊——江西氨厂。

这一天，春光明媚，公路两旁稻田里的黄油菜花、红花草，吐芳斗艳，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陈云不时眺望车外，显得轻松愉快！12公里的路程，半个小时就到了。江西氨厂领导凌林、副主任门忠臣等10多位同志。站在厂门口迎接，陈云主动与他们一一握手，热情问好。在厂会议室里，凌林向陈云汇报了氨厂的历史和现状；生产组长王兆惠汇报了生产经营情况。陈云听得很认真，不时作了记录。当问到该厂主要设备——煤气发生炉时，陈云告诉在座的人说：“这种VGI型的炉子，是仿苏联30年代的产品设计的，这种炉子直径是2.745米、3米高，容积小，应进行技术改造，扩容增产，多出氨，出好氨！”并问身边的一位姓王的工程师：“你知道这座炉子的结构吗？有几块耐火砖呀？”这位工程师面带难色，无言以对。陈云见状，便马上告诉他：是××块砖构成的。在座的人听后都很惊讶，都向他老人家投以敬佩的目光。我心想：他是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还这么熟悉设备，连高炉多少砖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天，陈云兴趣挺高，徒步参观了造气、合成，炭化等5个车间。他老人家边走边询问，走到合成车间时，见女工马桂英在液位计岗位上认真操作，便主动上前向她问好，同她亲切握手。见女工侍作仪坐在精炼岗位旁、挺着怀孕的身躯，抓紧时间吃盒饭时，便问她：“你吃什么菜呀？能吃饱吗？”侍笑咪咪地说，“我在吃鳊鱼，能吃得饱，谢谢领导的关怀！”陈云对厂里陪同的同志说：“一定要把生产一线的工人生活安排好，要保证能吃上可口的热饭菜，他们上班是很辛苦的呀！”在场的工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以表谢意。几十年过去了，侍作仪早已退休了，我去采访她，问及当年见到陈云的情景时，还是乐滋滋的，喜形于色！她说：“开始时，我不认识这位首长，只觉得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当他问话时，一口的江苏口音，我恍然大悟，我记起来了，前些年厂部会议室里，7位中央领导人的挂像中有他，这就是敬爱的陈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同中央首长面对面谈话啊，怪自己嘴笨，连问好的话都忘记说了。下班后同爱人童昌行讲，他也很高兴。”“当年我怀的第二儿子，感谢党的政策好，早已大学毕业，赴上海工作了。如今的江西氨厂，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引进资金，按照陈云当年的指示，狠抓三座炉子的技术改造，将每座煤气发生炉的直径扩充为3米。仅这一项改造，

生产能力便翻了一番！当年这三座煤气发生炉、三台高压机，年产合成氨只有4.5万吨，1994年已能生产合成氨10万吨了。陈云若是知道这些，一定会高兴的。

“要多学点工农业知识才好”

1970年4月29日上午，工人忙着准备迎接“五一”劳动节，农民正忙着插秧，我和卫士李奇陪同陈云驱车到南昌县罗家隼——南昌钢铁厂参观。他老人家凝视着公路两旁的水稻田和正在插秧的农民，略有所思，便问我：“你会种田吗，知道红花草的作用吧？”我是农村长大的，稍懂一些，便一一作了回答，他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他告诫我们说：“你俩都是军人，也要多学点工农业知识才好！”我俩异口同声表示：一定听首长的话，好好学习。

小车跑了约一半的路程时，遇上农民在公路上挖了一条过水沟，车辆难以通过，司机徐广勤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只好停车。我迅速下车找石头准备填沟通过，陈云示意不要着急，并对我们说：“放水插秧要紧，不能误了季节啊！”农民见陈云下了车，便上前问话说：“您是一位首长吧！？真吃价”。（南昌土语是好的意思）车子等了20多分钟，秧田的水放满了，我们同农民一道铲上填沟，继续赶路到了南钢。厂革委会主任张万海、副主任唐占荫等20多位同志，在厂门口等候迎接。在会议室坐下后，陈云首先讲话：“我到江西调查研究，早就想到南钢看看”，他问，“张万海、唐占荫是哪里人？”张说：“我是蒙古人，老唐是安徽人。”接着还问张：“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你参加了没有？”张答：“参加了。”陈云说：“那很好。”尔后，唐占荫汇报了南钢的生产经营情况。当时南钢有职工5268人，年总产值3500万元，年产钢铁11万吨，钢材3.5吨，销售收入2800万元，固定资产原值5900万元，在钢铁行业中属小企业。陈云边听边记，还不时插话问：“南钢有矿山吗？有没有焦炭？有自己的专用铁路线吗？”张万海回答说：“我厂有专用铁路线，是1958年由解放军义务劳动修的，取名八一路呢！”“矿山就没有，连焦炭都是从新余运来。”陈云说：“这样成本就会高些，应该想办法自己炼焦炭！”听完汇报后，陈云到炼铁分厂参观，他问张万海：“你们高炉的焦比是多少？”张答：“1比1。”又问，“目前国内高炉生产最先进的是哪个钢铁厂？”张答：“是首钢，焦比是600kg/T！”陈云同志接着说，“我到首钢、上钢看过，你们当领导的也应该去学习。”这一天，他老人家兴趣很浓，紧接着又到了炼钢、轧钢分厂参观。唐占荫向他介绍了一台小轧机，陈云风趣地说：“这台小轧机不小，大轧机也不大的。”这时，墙上挂钟已指向11时半了，张万海请首长用膳，陈云婉言谢绝，催我们驱车离厂返回住所。陈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市区或近市郊调查，他绝不在基层用餐，给他们增加负担。他在住处用膳也很简单，以素食为主，清清淡淡，生活简朴。

陈云很关心南钢。1971年8月底，南昌仍处高温季节，一天上午，他冒着酷暑，再次去南钢参观。这次他没有让我们事先打招呼，搞了一次‘微服私访’。车子进到厂部办公大楼，厂领导才被告知，没有一点准备。这次，陈云询问生产和防暑降温的情况后，便提出要到车间看看。张万海考虑到天气太热，炼钢车间温度又高，怕他老人家身体吃不消，便劝他到生活区走走。在张万海陪同下，陈云看了菜市场、南钢百货大楼，详细询问了商品价格、销售量、用户反映等。当走到二楼营业厅时，一位20多岁的女售货员，主动

热情地搬来椅子请他老人家歇歇脚，陈云连声说：“谢谢！谢谢！”当时，这位姑娘可能已经认出这位平易近人的长者是谁了，她悄悄地站在旁边，以敬重的眼光，凝视着……直到有顾客叫买货时，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人民群众是多么敬重和爱戴这位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啊！

24年过去了。当年陈云视察、关心过的南钢，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已发展成为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成了全国企业“五百强”之一，有职工1.1万余人，年产钢铁51万吨，钢坯26万吨，创造利税1.15亿元。近4年来，光用在技术改造上的投资就达2亿元。南钢如今不仅自己能大量生产焦炭，还能为南昌市部分居民提供煤气，改善生活。

陈云参观南钢之后，到南昌县的胡家村、坝溪村和红旗农场参观，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当时，他老人家对“糖化饲料”很感兴趣，每到一处，都要看看养猪场和“糖化饲料”的发酵情况，进行研究、比较。他对江西省的领导讲：“这是解决猪饲料的好途径，要认真总结推广！”

每当我回忆24年前，跟随陈云下工矿、去农村调查研究的情景时，心情格外兴奋！他老人家那种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关心人民，求实创新的领导作风，给了我深刻教育。

我体会，陈三调查研究的方法，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蹲点搞调查，都是以普通一员的身分出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并且都是找直接当事人、参与者交谈。每次，他亲自看，亲自问，亲自记，从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代劳，群众乐于同他讲实情、说心里话。

第二个特点是，调查问得细，谈得深，力求准确、无误，以防“水分”。他不喜欢“大概”、“差不多”的说法，他喜欢说老实话、实事求是的人，讨厌那些不懂装懂、似是而非的人。

第三个特点是，他把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以指导工作。他通过调查而看准了的问题就果断提出建议。如他建议江西氨厂抓技术改造和改善生产一线工人生活等问题，就是鲜明的例证。

当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事物，将会层出不穷的。怍入学习陈云这种面向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关心人民、正确决策的可贵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赵子昌）

我认识了陈云

陈云，是我党杰出的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他。那时，在许多场合可以名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形象。但是，却没有机会亲眼一睹他的风采，更不可能认识他，熟悉他。

特殊的年代，给了我与他老人家相逢相识的机会。那是1970年8月间，我们这些“文革”前最后一批考入大学的“幸运儿”，在结束了近2年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的生活以后，陆续被分配到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我大概算其中的“佼佼者”，被留在兵团系统，直接分配到地处南昌市青云谱的江西生产建设兵团28团（即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而当时处于逆境的陈云，正在这个厂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于是，我有幸从认识到熟悉陈云这位我党著名的革命家。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28团，又叫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原先隶属劳改部门，后来划归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按军事编制定番号为28团。无论作为机械行业，还是作为劳改企业，这个厂在当时全省都是可以排得上名次的。厂区规划得很好，布局也很合理，高高的围墙，圈着几百亩的地盘，一条东西贯通的平坦柏油马路和一堵围墙，把这块地盘分成南北两半，南面的一半是生活区，北面的一半是生产区。整个厂区房屋排列整齐，井井有条，树木葱茏，花团锦簇，厂容厂貌令人赏心悦目。

离厂区只有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古树蔽天、修竹摇曳、溪水潺潺的园林，这就是著名的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著名画家、明宁献王后裔朱耷，号八大山人，隐居于此。当年这位画家不满朝政，远离宦海，闲赋乡野，创作了大量独特风格、颇富嘲讽意义的画。

与八大山人纪念馆毗邻的地方，有一片荒山野岭，这里绿树婆娑，风景秀美，林荫深处露出一栋栋低矮的房屋，那便是当时的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

不知是出于就近搞“调查研究”方便一些、28团各方面条件又好的考虑，还是出于在生产建设兵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单位更安全更易于保密的需要，还是出于其他的意图，陈云住下来之后，就被安排在离住所下远的江西生产建设兵团28团蹲点，以此作为他进行社会调查的基地。

我到28团不久，大约8月中旬，因为工作关系，很快接触到了陈云。那时，我还没有成家，就住在办公楼里。这是一栋只有二层的办公楼，一楼为团司令部、后勤处，二楼为团政治处。几位家住市内的政治处的干部，包括团政委等，平常就住在二楼。我当时与从省里下放在该团的干部马骏同住在一楼的一间房里。

马骏是组织上指定负责接待陈云的，每天陈云到厂里来，都是由他迎送，并由他具体安排在厂内的活动。厂里有什么事要与陈云联络，也是由马骏具体负责，有时还要到陈云的住所去商谈、汇报。

出于安全的考虑，厂里对陈云的活动一直是保密的，大家提到陈云时，都是习惯地称之为“客人”，说到“客人”也都知道是指陈云。“客人”几乎成为陈云的代号。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难保住秘密的，加上陈云几乎天天来厂里，又总是和工人群众在一起，因此，在这个几千干部工人的工厂里，几乎无人不知晓陈云的到来，而且都很敬重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

“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马骏抬手看了一下手表，轻轻淡淡地对我说。他这么一说，使我很是激动，巴不得马上就能见到这位令人景仰的“大人物”、“大首长”。我兴奋地跟马骏下了楼，恭候在办公楼前。

不一会，一部车头上装有银亮银亮金属鹿车牌标记的伏尔加轿车缓缓停在眼前。被称之为“客人”的首长旋即下了车，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我的眼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云！

陈云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戴一顶草绿色的军帽，脚上穿着一双黑灰色布鞋。他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壮实，两鬓银白色，脸庞红润，容光焕发，一副可亲可敬的慈祥长者仪表。一见面，就把我与他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我们与陈云打过招呼之后，即习惯地把他迎上了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参加这一天下午厂里的生产调度会。

据我所知，陈云在28团期间，参加的各种会议有百余次，其中有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有工人、干部、生产组长和工段长（班、排长）、医务人员、食堂炊事员、学校老师……等等类型人员的座谈会。总之，什么类型人员的座谈会他都要开，而且总是深入到各个车间、工段，班组、化验室、仓库，深入到厂食堂、医院、子弟学校等地去开。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无拘无束，一坐下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畅所欲言。座谈会往往一开就是半天，陈云总是耐心而认真地听大家发言。

陈云最感兴趣的是厂里的生产计划和生产调度会，这种会他是逢会必到。他多次提醒马骏和司令部负责生产调度的参谋曾文威：“你们开生产调度会，可不要忘了通知我参加啊！”这位我党经济战线的老前辈、经济工作的专家，真是痴心不改，即使在那个把“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的年代，他对经济工作、对生产建设仍是那样执著、那样关注。

陈云也很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一天下午，他还参加过我们政治处的一次政治学习。在那次政治学习中，他作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的讲话，批判了经验主义，强调了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遗憾的是那次学习会，我因工作外出，而未能面聆他老人家的生动讲话和谆谆教诲。

1970年秋，陈云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一结束，他下山后就首先驱车到了28团，人们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比以往要好。但是，人们哪里知道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一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这样一件令全党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的好事，陈云当然是很高兴的。

以后，接触多了，陈云认识了我。

一天下午，厂部机关于部已下了班，办公楼静悄悄。我拿着碗到食堂去吃饭，从楼上往下走。突然，一个穿一身绿军装的人急匆匆地上楼，脚步咚咚，轻快矫健，在楼道上我们正面相遇。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看清了我：

“小胡，你们团长、政委在吗？”

这时我才发现他就是陈云！身边既没有带秘书，也没有警卫员跟着。我一边慌忙上前搀扶他，一边回答说：

“好像还在……”

我陪陈云上了楼，朝团长、政委办公室走去。正好，团长、政委都还在

办公室。我等陈云落座后，准备打个招呼便走，陈云却先开口了：

“小胡，你去忙吧！”

于是，我告退了。等我从食堂吃完饭回到办公楼，陈云已走了。我当时想，陈云在这下班的时候，独自一人急急忙忙地赶来找团长、政委，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次楼道上的相遇，使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而平凡的品貌有了最具体的切身体会。同时，也使我对陈云惊人的记忆力，十分佩服，因为当时我单独与他接触并不多，可他却能叫我“小胡”。怪不得他在厂里有时间到某车间某同志，陪他的同志回答不上时，他嗅怪地说：“你真健忘，我年轻时能一口气背出几百人的名字！”听说，陈云见过一次的人，往往就能叫上名字。

以后，与陈云接触次数多了，我连他的秘书、警卫、司机也都搞熟了。秘书姓肖，是一位跟随首长多年的同志。他随陈云到南昌后，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分，长时间深入 28 团参加劳动，在车间生产线上与工人一样上班，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搞得挺熟。警卫李奇，东北人，既有一副仪表堂堂的军人气派，又有一介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司机老徐是省里派的，开车技术十分娴熟。首长来厂，参加会议去了，我们有时候便可以坐在一块聊天，从他们的口里还经常可以听到有关陈云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陈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 28 团是很有感情的，厂里有宣传队演出，有球赛等等，他们总喜欢来观看。因为，当时 28 团是一个文艺、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出色的单位，兵团总部委托该团组建了文艺宣传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等等。无论是宣传队的演艺，还是篮球队、乒乓球队的竞技，都是名震省城的，代表着全兵团的水平。这个团的通讯报道组、美术组也是颇有名气的。

有一天，文艺宣传队演出，马骏已陪肖秘书到了礼堂，他向我交待：“你到厂门口去等一下，李奇要陪汪师傅来厂看演出。他们走路来，你见到之后，就把他们领到礼堂来！”我不知怎么把首长家的“汪师傅”听成“王震”了，心里很是高兴，因为我当时听说，“下放”在东乡的王震有时会专程来看望陈云。

我赶紧来到厂门口。等候了一会儿，李奇陪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志来到了大门口，我以为这位身材高大的同志就是赫赫有名的王震将军。直到把他们送到礼堂落座以后，我问马骏：

“他就是王震？”

马骏听了笑着说：

“哪里，他是客人家的大师傅，北京带来的……”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因为自己差点儿闹了一场笑话。

1971 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也引起了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陈云等许多老同志得到了解脱。因此，“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云也许是因为忙，因为开会多等缘故，渐渐来厂少了。到了 1972 年 4 月，他便离开了南昌，离开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这个厂了，我也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怀念这位老一辈革命家，总希望有那么一天还能见上他老人家一面。

（胡少春）

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忆陈云与我的谈话

得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逝世的消息，我很悲痛。作为一名 40 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深深地感到，陈云的逝世，是我党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我虽然不曾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在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时期，我就多次见过陈云，也略知他为革命建树的显赫功勋。这里，我要记述的是，70 年代陈云在江西时与我的两次谈话。

陈云是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放江西的。省领导把他安排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该厂是一个劳改企业，当时改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 28 团。陈云未到该厂之前，厂领导就宣布称陈云同志为“北京来的客人”。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云当时的处境是很不好的，但他仍然处之泰然，保持着革命家的乐观态度。

我听说陈云下放到厂“蹲点”，多么想找机会拜见他老人家，当面聆听他的教诲，但是我的处境也不很好。我原是管生产的副厂长，“文革”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派”下放车间劳动，后在一个连里当副连长。因此，我的愿望也就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默默地为他老人家祝福。

1971 年 7 月的一天，团部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赶到团部，并告知陈云要找我谈话。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惊又喜，心都快跳到嗓门口了。

来到团部，团部办公室主任马骏正在会议室门口等我。走进会议室，我一眼就瞅见面带笑容的陈云，荣幸之情，油然而生。

简单的介绍结束之后，陈云高兴地握着我的手，示意我在他身边坐下。

我向陈云问候后说：“首长找我来有什么事？”

陈云笑着说：“不急”，接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纸扇给我用。接过纸扇，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他老人家的关心，使我心里甜滋滋的，紧张的心情迅速缓解了。

稍顷，陈云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在工厂干了多少年，等等。我——作了回答后又补充说：“我在东北就认识您。”“哦，你也到了东北。”“我原在新四军三师，在黄克诚同志身边任警卫员，抗战胜利后，我们部队开赴东北，成立西满分局，我又调李富春同志身边当警卫员。我随富春同志到哈尔滨东北局开会，见过你多次……”

陈云听后乐呵呵地笑了：“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接着，陈三话锋一转，问我：“你认为工厂实行军事建制行不行？好不好？”

我听后心里一怔，这是一个触及政治的大问题，生产建设兵团是林彪定的，讨论这样的问题需要胆识，还要有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的勇气。既然陈云提出来了，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应该说真话。于是，就直言不讳地说：“工厂搞军事建制不行，更谈不上好。”

陈云又说：“为什么不行，你详细说说你的理由。”

根据我在工厂工作十几年的体会，最大的坏处是在实行军事建制后，把完整的生产车间，改为营、连、排、班组织形式。把企业管理、规章制度、生产秩序都打乱了，生产指挥系统失灵，给生产上造成严重的混乱状况。一个工厂企业的好坏，主要是靠科学管理，严格的规章制度，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靠命令、压力和喊政治口号所能代替的。陈云突然“哦”了一声，“你讲得好。那你讲讲企业管理怎么搞。”我说了一通后，

陈云深情地说：“你讲得不错，尤其是敢讲真话，你真是个搞生产的行家。”陈云接着讲，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内容包括很多，简单的把军队那一套搬到工厂是行不通的，工厂的生产组织，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工种要互相配合。工厂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才能改善职工的生活，既要强国，也要富民。陈云这种精辟的见解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遗憾的是，他老人家的正确意见，在那种环境下得不到采纳。以致生产秩序混乱无章，事故频繁不断，产品质量上下去，生产任务完不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一次谈话结束了，走出会议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陈云身处逆境，仍然忧国忧民。他坚持真理，探求真理，足见他胸怀何等博大，气度何等恢宏！他在谈话中体现的思想，我未完全理解，但今天想来，仍然闪烁真理的光芒。即使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管理生产，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半个多月过去了。马骏又一次来电话通知：陈云还要找你谈话。我放下听筒，一路小跑到会议室。走到会议室门口，陈云正等候在那里。他亲切地和我握过手后，又将纸扇递给我，示意我坐下。我刚坐定，陈云就神情严肃地说：“那么大的电动机烧坏了，说报废就报废，这多可惜！”

原来，陈云得知厂里烧坏了一台电动机，正在思考弥补的措施。我听后未加思索地说：“电动机烧坏了，确实不能使用。”

陈云说：“烧坏了把线接起来不就行了吗？”

我说：“线圈烧焦了，绝缘漆脱落，造成电动机短路，就不能用了。”

陈云问：“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回答：“要用漆包线重新绕过线圈，把它修好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陈云又问：“漆包线哪里生产的？”

我说：“上海。我们厂的漆包线都是上海来的。”

陈云又问：“中国没有这个上海怎么办？上海若被国民党占领了又怎么办？”

这下真把我给问住了。我想了一下，回答说：“首长，抗战时期缺医少药，没有子弹，我们从敌战区不都搞到了吗？”

陈云侧过脸笑了笑，未表示什么意思（事后我想，陈云对我的话不大满意，他的意思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次谈话很快就结束了。陈云身力中央领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深入调查研究，不耻下问，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他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时隔不久，陈云的秘书肖华光到我家，专程送来了陈云的亲笔信。令人遗憾的是，这封珍贵的信却不慎遗失了，但信的内容至今仍记忆犹新——

李赤同志：

关于电动机烧坏修复的问题，经调查核实，你的意见是对的。

致

陈云
1971.9

原来，陈云与我交谈后，进一步找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还专程到江西电机厂作了调查。从这平凡的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陈云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对工作，对事业仍然一往情深，身体力

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何等高尚、坚贞的品格！

陈云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每当我回忆起与他老人家的两次谈话，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谈话所体现的思想和作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必将作为党的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珍藏在人民的心中。

（李赤）

陈云到我家

今年4月11日晚上7时，从电视新闻联播中惊悉陈云逝世，十分悲痛！往事犹新。26年前，陈云在我们厂“蹲点”时到我家里的情景呈现在眼前……

那是1969年12月的一天上午，陈云参加我们金工车间车工班学习会，散会后，他亲切地问我：“火生，你家庄在哪里呀！”我急忙回答说：“住在厂里生活区第6栋。”

“离这里不远吗？”陈云又问。

我回答：“不远，很近。”

陈云听我说不远，以慈祥目光望望我，笑笑地说：“那我到你家里去看看，好吗？”

他老人家要去我家里，自己既感荣幸，又有些紧张，急忙回答说：“欢迎！欢迎！”

陈云听了哈哈大笑，高兴地说：“现在就去，可以吗？”我应声回答说：“可以，可以！”

那天，因路不远，就没有坐车，我陪同他老人家慢慢地步行到我家里。陈云进房后，我端了条木板凳子请他坐，然后忙去给他倒茶喝。他看见我去倒茶，便摆摆手，示意不要倒茶，“不用了，我不喝茶。你们厂的水，我喝不得，肠胃受不了，一喝就要泻肚子。”

我听到他老人家这么说，就没有去倒茶了，他老人家叫我坐下来，跟我聊家常，询问我的家庭情况。

陈云问我：“你爱人在哪里工作？”

我回答说：“她同我在一个车间当工人。”

陈云听说我爱人也是工人，而且同在一个车间里，他笑咪咪的，幽默地说：“好呀！你们是工人阶级家庭。”

陈云一面跟我聊家常，一面看看我家里的陈旧、简陋的摆设。那时，我家除了一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的架子床外，就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床上盖的被子和身上穿的衣服等，都是大众化的、显示出贫穷家庭的样子。陈云看到我家这个贫困状况，神情有些严肃，似乎在沉思。

过了片刻，陈云微微地笑了笑，以关心的口吻问我：“你和你爱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多少？”

我回答说：“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加起来还不到100元，还要供养老人。”

“噢！”陈云同志又关心地问我，“你家有些什么困难呀，粮食定量够吃吗？”

陈云边说边从坐凳子上站起来，没有吱声，若有所思，迈步走到米缸前，用手掀开米缸的盖子，弯下腰去用手掏了把米看看，问我：“你家的粮食，如果不够吃，我送给你一些粮票。”他说他一个月定量26斤，吃不完，有粮票多余。

我听到他老人家这么说，深受感动，急忙回答：“不用了，我家粮食够吃，谢谢首长的关心。”

陈云又走进我家厨房，打开油瓶和盐罐子看看，然后又用手拿起装猪油的杯子，用鼻子闻闻，对我说：“这东西大油了，我很少吃。”

陈云看完油盐后，又问我一个月的食油、猪肉定量多少？到什么地方买

米、买菜，价格贵不贵？多少钱一斤的菜，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陈云边听边点头。

在我家厨房，陈云没有看到自来水龙头和水池子，似乎觉得有点奇怪，便关心地问我：“厨房里没有自来水，烧饭、洗菜等用水，到什么地方去打呀？”

我回答说：“楼下”，并用手指给他看。

当时，我们住的两栋宿舍，共 50 余户职工，只有两个自来水龙头。用水高峰时，要排队轮流装水，很不方便，费时间。这时，正是烧午饭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到这两个水龙头打水，排队长长的。陈云从透过玻璃窗往下看职工家属排队打水的情景，默不作声，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你们上班很辛苦，下班回到家里后又要忙着下楼去提水烧饭，够辛苦的啊！”

陈云的话虽不多，但说得很实在，句句都是关心体贴人的话，很是感人的，他是我们工人的贴心人。

我们正在聊家常，我爱人带着孩子从外面进房来了。我给他老人家介绍：“这是我爱人和孩子。”陈云的慈祥目光望着他们母子，风趣地说：“你也是工人，你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啊！”

陈云看到两个孩子，便问道：“几个孩子呀！”

“就这两个。”我爱人回答说。

陈云略作思索，真诚地对我们说，“有两个孩子就可以了，不要再生了。”我和我爱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不再生了。”

陈云看到我们要烧午饭了，就说：你们烧饭去，我走了。我们留他吃饭，他婉言谢绝，说：“我回去吃。”

临别时，陈云握着我们夫妻俩的手，深情地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就到我家来玩。”

送别陈云后，我们夫妻俩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尽管当时处于特殊年代，身处逆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仍然关心普通工人，走访我的家庭，关心我们的生活，使我全家深受感动和鼓舞。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龚火生口述，吴初生整理）

两只折叠凳子

1970年春，在我厂“蹲点”的陈云从报纸上看到南昌市郊区农村在推广糖化饲料养猪的报道，很感兴趣。一天，陈云在我们班（铸工车间木模二班）参加“天天读”后，对班长邹承标说，过几天准备到农村搞点调查研究。

消息传出，我们大家都不由得为他老人家的身体担心。这一年，陈云已是65岁高龄了，望着他额头上稀疏的银发，清瘦慈祥的面容和瘦弱单薄的身体，班里的同志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当时，我刚19岁，是班里的青工。记得他老人家第一次到班里来参加学习时，曾逐一地询问每一位同志的姓名。当他听说我叫陈天赋后，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喔，是赋，不是斌，是天赋。”那情景，一想起来我的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的。我决意为他老人家下乡做点事，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那么，自己能为他老人家做点什么呢？他老人家身体不太好，乡村的条件又比较差，若能随身携带一只小凳子，这样他老人家在田间地头，走累了，也可以坐下来歇歇脚。

拿定主意，我开始着手设计小凳子。我想，凳子应该小巧轻便，可以折叠，让陈云同志携带方便。凳子面最好是帆布的，这样他老人家坐着舒适。不过，凳子的木架子一定要结实，帆布面子一定要双层布料，让他老人家坐着放心。一只帆布面子、能折叠的小凳子制作蓝图，渐渐在我的心中定了稿，说实话，我真为自己的设计暗暗高兴呢！

凳子的木架子很快就做好了，可双层帆布料却怎么也找不着，问问周围的同事们，大伙儿也都十分遗憾地摇头。眼看陈云下乡的日子将到，时间下等人，我便向班长请了假，骑上自行车专程到南昌市内去买。“文革”期间，商店里物资很匮乏，我一家商店一家商店的询问，一家商店一家商店的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买到了称心的双层帆布。

第二天上午，我把亲手制做的折叠帆布凳带进了车间，送给了陈云。听说这是我专门为他下乡制作的小凳子，陈云很高兴，他老人家打开凳子放在地上，然后试着坐了坐说：“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听到陈云的夸奖，我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凳子做得粗糙，我只不过为他老人家尽了一点心，可这么大的干部却爱不释手，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

陈云带着小小的折叠凳子下乡调查研究去了，他仿佛不仅仅是带走了一只小凳子，还带走了我的惦记。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坐立不安，总挂记着小凳子在乡间是不是适用。怀着这样的心情，记下清是过了多少天，总盼着他老人家早日回来，我好问问他。

几天后，陈云回来了，大伙儿围着他询问下乡的情况。说起小凳子的事，他老人家爽直地告诉我，去农村后，他把凳子留在老表家了，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班里的同志都被陈云关心农民群众的精神所感动。时间一晃，到了夏季，我的师兄罗时伟自告奋勇，承担了为他老人家再做一只凳子的任务，为陈云做了一只竹子面的小折叠凳子，为的是让他老人家坐着凉爽些。这回他老人家更感动了，说：“我要把这只凳子带到北京去，给毛主席看看，告诉他这是工人师傅为我做的……”

两年后，陈云带着那只小凳子回北京去了，但他老人家却把他与我们职

工的深情留了下来。

(陈天赋口述于向明整理)

陈云和我们一起学习

1970年5月24日上午，接到团部通知：陈云下午到我们下料一班参加学习。全班同志非常高兴，都想看看他，希望他老人家辅导学习，讲革命故事，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那天，还不到学习时间，陈云就到了我们班里。他笑笑地向我们问好，和我们一一握手。落座后，亲切地问长问短，还让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接过名单后，一个一个地核对名字。开始，大家有些拘谨。但看到陈云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大家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当他得知张德新是大学毕业生时，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要在生产和工作中好好发挥作用”。一位青年工人开玩笑说：“大学生是臭知识分子。”陈云用亲切的眼光望望张德新，并走上前去握握张德新的手，然后把右手放在鼻子门口闻了闻，风趣地说：“不臭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在学习会上，大家既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又结合班里的实际，谈生产情况。陈云听了很高兴，说：“你们既谈学习心得，又谈生产，这很好。工厂就是要讲生产，不讲生产，还叫工厂吗？我在你们厂参加了七八十次学习会，很少听到讲生产，我认为理论不联系实际不好。你们这次学习会，我认为很好，我不是百分之九十五，也不是百分之九十八赞成。而是百分之百的赞成。”学习会结束时，主持学习的同志提议请陈云讲党史。他老人家欣然接受大家的要求，高兴地对大家说明天下午的学习会我一定讲。

第二天下午，下料班的几十名新老工人兴高采烈地提前到会，聚集在一起等候陈云的到来。陈云也提前到了，他老人家看到这么多人等候他，高兴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落座后，他一一叫喊着到会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非常钦佩他老人家惊人的记忆力。随后，陈云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党史课，讲得很生动，通俗易懂，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深深受到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他老人家在讲课时，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一点也没有谈及自己。他老人家这种高尚的谦虚精神，令人钦佩，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在这次学习会上，陈云除给我们讲党史外，还给我们深入浅出地讲了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主席“五二声明”。

陈云两次参加我们下料班的学习会，熟悉了我们全班十几个人，和我们工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他老人家经常来我们容器车间，一碰到下料班的人就亲切地叫名字，亲切随和地聊天，拉拉家常，亲如一家人。大家非常尊敬他老人家，见面开口就称呼“老首长”。

岁月流逝，20多年过去了。但陈云参加我们下料班学习会的情景，记忆犹新，倍感亲切。

（杨全明）

“ 听你的指挥 ”

1969年初冬的一天，天气寒冷。宽敞明亮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木模车间内机声隆隆，刨花飞溅，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劳动着。

这时，陈云在厂干部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进车间，工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用惊喜的目光迎接陈云的到来。

“ 同志们好！ ” 陈云微笑着向工人们点头致意，然后走到每位工人的工作台前，与工人们一一握手。工人们紧紧握住陈云的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随后，陪同来的厂部干部对木模二班的班长交待说：“ 老首长以后就安排在你们班参加政治学习了，这是领导对你们的信任，你要把学习组织好 ”。

陈云笑着对班长说：“ 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就听你的指挥了。 ” 接着，陈云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分，要求班长给他安排活干。年轻憨厚的班长望着满头银发的陈云，不知所措地搓着双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顾呵呵傻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 欢迎，欢迎老首长到我们班来参加学习。 ”

从此以后，木模二班就多了一位“ 北京来的客人 ”。每天下午 4 点政治学习时，陈云总是准时来到班里，与工人们围坐在木工桌旁，一起学习，一起交谈。每当工人发言时，陈云总是习惯地稍稍向左倾斜着头，透过镜片的目光直视着你，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不时在从不离身的小本子上记着。

一次，一位青年女工在发言时讲南昌话，声音又小，这下可难住了陈云，他特地起身，坐到这位女同志的身旁，笑着用手拉着自己的耳朵风趣地说：“ 南昌话比上海话难听懂，请你讲慢点啊。 ” 大家都被陈云的风趣逗得哈哈大笑起来，那位青年女工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陈云参加班组学习，十分遵守班里的学习制度。有时他身体不好，不能来参加学习，还特地写请假条，嘱托警卫员专程送来。有时陈云要到外地去调查工作，临行前，都要来向班长请假。

有一天下午，车间安排大扫除，班里就没有安排学习，可陈云不知道，下午还是赶来了。当班长歉意地请他第二天下午再来参加学习时，陈云叫班长伸出右手，他也伸出右手按在班长的手心上，两人翻手对拍了 3 下，然后陈云笑着对班长说：“ 一言为定，明天学习时间不变 ”。

不过，陈云在遵守学习制度方面也有点例外。当时每天学习前必不可少的两个敬祝，他对那个副统帅从不举手。每当开大会呼喊：“ 打倒 × × ×！ ” 的口号时，陈云总是紧抿着嘴唇，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1971 年 9 月，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国大地出现了新的生机。陈云知道这件事后，气愤地说：“ 林彪干出这样的事来，太没有良心了！ ”

1972 年 4 月，陈云要离开江西回北京了。临行前，他来到木模车间向工人们告别。

陈云迈进木模车间的大门，首先遇到的是老工人熊桂芳。陈云这时还不忘拿熊师傅的名字来打趣，他笑着大声说：“ 熊桂芳——八月桂花香 ”。接着，陈云又高兴地说：“ 熊师傅，我要回北京了，今天特地来向你们告别。 ”

工人们一听陈云要回北京了，呼啦一下都围了过来，一双双大手紧紧地

握住了陈云的手，工人们陈云的无尽的眷恋之情都默默地流露在那紧握的双手上。陈云眼眶潮湿，他凝视着那一张张熟悉而又朴实的面孔，使劲摇动着每一位工人的双手，动情地说：“再见了，工人师傅们，再见了，有机会北京再见！”

（吴初生、刘正光）

车间里的笑声

1969年初冬的一天上午，天阴沉沉的。一辆小轿车在寒风中悄悄地驶进了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大门，停在厂部办公大楼门口，从车上走下来一位60多岁的老者，这位老者就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

陈云身披军大衣，满头银发在寒风中一丝不乱，刚毅的脸上显得那么平静、自若。他用安详的目光环视着这个昨天还是陌生，今后却要令他长久地梦回魂绕的厂区，开始了他在这块热土上学习、调查的第一天。

陈云在厂部为他安排的办公室内呆不住，听完厂领导的汇报后，就急着要去他蹲点的铸工车间。

走在那宽敞整洁、绿树成荫的厂区大道上，陈云对陪同人员说：“自从1955年我到大连为一家工厂制造的5吨行车剪过彩，以后一直在中央工作，很少有机会下工厂。这次到你们厂来，我要好好向工人师傅们学习。”

走进铸工车间内，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呈现在眼前。行车吊着笨重的砂箱在头顶上隆隆地横空驶过；碾砂机、筛砂机有节奏地轰鸣着；造型师傅们操着“哒哒”作响的冷泵枪，像急促的鼓点，震撼人心；高亢的锯木声、铿锵的砸铁声、嗡嗡的车床转动声，汇成了一首雄壮的迎宾曲，好象在欢迎陈云的到来。在车间办公室，陈云向车间领导详细询问了车间生产的全过程，以及产量质量等情况。然后，在车间领导的陪同下，到每个班组去看望工人们。

陈云首先来到木模班组，与在场的工人们一一握手，并愉快地和工人们亲切交谈。陈云对工人们说：“我有一个亲戚在东北做木工，我也曾在东北的一家木工厂蹲过点，我对木工这个工作是有感情的。”

在熔化炉前，工人们正在抡着榔头砸生铁。小伙子们干得生龙活虎，一大块一大块的生铁在榔头的重击下碎成了小块。陈云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也为工人饱满的生产热情感染着。过了一会，陈云转身问站在旁边的一位青年工人：“你知道铸铁有哪儿种牌号吗？”不等回答，陈云随口说出了铸铁的各种牌号、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周围的工人们见陈云对生产方面的情况这么熟悉，眼睛里都流露出了敬佩的目光。这时，一位50多岁的老师傅快步走到陈云的面前。双手作揖，十分恭敬地深深弯下腰，向陈云行了个奇特的礼。陈云见了，满面笑容地照那位老工人的样子还了一个礼。当两位老人头碰头后，陈云忙用双手将这位老工人扶起，然后笑着对周围的人说：“现在年轻人虽然文化程度高，但他们不懂得这种旧时的‘拱手’礼节啊！”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熔化炉对面的造型班那天正在配箱，20多只刚从烘炉内拖出来的大型铸件砂箱，烟灰滚滚，热气腾腾，造型工人们钻进里面配箱，热得像在蒸笼里一样，个个挥汗如雨，人人脸上被烟灰涂料染得像黑面包公一样。

陈云时而弯着腰，时而蹲在地上仔细观看工人们操作。他见工人们劳动环境这样艰苦，禁不住上前紧握着工人们的双手，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当陈云得知当天晚上车间还要开炉浇注铸件时，就对车间的领导说：“工人同志工作很辛苦，我晚上一定来看他们。”

在车间机修班，一位青年女工正在全神贯注地开车床。她戴着工作帽，从帽子里露出二根乌黑的齐肩短辫。陈云悄悄地走到她的身后，伸出右手，在她的脑后做了个剪辫子的动作。青年女工察觉后，转过身，不好意思地冲

陈云笑了笑，赶紧把两根小辫塞进了帽子里。

陈云又来到车间保管室门口。一位保管员见是陈三来了，忙迎到门口，请他到里面去坐坐。陈云赶紧摆摆手，笑着说：“这里我可不能进去，你看门上不是挂了块牌子吗？”说着，陈云伸出手，指着那块小木牌，一字一顿地念着：“仓库重地，闲人莫入”。大家都被陈云这种严于律己的态度所感动。

时间过得真快。下班铃响了，车间职工都来到车间门口，送陈云上车。陈云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并大声说：“同志们，晚上再见！”

从此以后，陈云就与铸工车间结下了不解之缘。陈云不顾年高体弱，每天除了参加班组的政治学习外，其他时间总是到各生产班组了解生产情况和质量情况，一有空就和工人们促膝谈心。车间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陈云的脚印，每个班组都闪动着陈云的身影。

一天下午，铸工车间正在开炉。熔化炉上的鼓风机雷鸣般地轰响着，通红的铁水不断注入铸件型腔中。车间到处铁花飞溅，烟雾弥漫。

陈云又来到车间，警卫员赶紧支好折叠椅，请陈云坐下。陈云兴致勃勃地观看浇注的全过程。

工人们见陈云来了，都围了过来，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的坐在地上，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着。陈云兴致很高，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陈云见围在四周的工人中有一位女青年个子特别高，他笑着用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说你的个子比我高得多。当陈云知道这位女青年来自上海，是厂女篮主力时，他高兴地伸出右手，作了一个投篮的动作。工人中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阵笑声，当时的气氛显得那么融洽，那么和谐。

陈云又看见通红的浇冒口上放着几只搪瓷茶怀。觉得很奇怪。工人们告诉他，因工人劳动强度大，汗出得多，口渴，用浇冒口的余热来烧开水喝。陈云听了，把右手握成杯状，送到嘴边，头一仰，眼一闭，做了个喝水的动作。

陈云幽默的动作在工人中引起了一阵欢笑声，有的人笑得前俯后仰。陈云也和工人们一起开怀地笑着，笑声在车间上空久久回荡。

20多年过去了。每当工人们回忆起和陈云在一起时的情景，眼前总是浮现出陈云那慈祥的面容，耳畔似乎又响起了陈云同志那爽朗的笑声。

（吴初生、刘正光）

陈云和炊事员

1969年11月12日，这是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1600余名职工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到厂里“蹲点”。上级虽有规定、要保密，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当日中午就传遍了全厂，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们急切地盼望早日看到这位伟人的风采。

陈云在厂部参加了几个座谈会后，就深入车间，还来不及去职工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们议论说，陈云什么时候才会来食堂呢？12月的一天上午，炊事员们又在议论这件事时，陈云突然出现在食堂门口。他老人家亲切和高，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

“你们工作忙吧，中午食堂几点钟开饭？”说着，老首长走进了厨房。

陈云走到菜盆边，俯身望着问：

“中午吃哪些菜？多少钱一份？”

炊事员说：“这是青菜，3分钱。”

陈云走到另一盆菜旁边问：“这个呢？”

“海带烧肉，1角2分。”

陈云伸手拿起一把长柄菜勺，打了一勺菜倒在盘子里，随后弯下腰仔细看了看，满意地笑着说：

“嗯，很好。海带烧肉，肉蛮多嘛。”

141 开饭时间到了。下班的工人陆陆续续走进食堂，食堂顿时热闹起来。陈云站在厨房里，看着炊事员卖饭打菜，听着那盆、瓢、勺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品闻着厨房里飘出的阵阵饭菜香味，高兴得连连点头。他对炊事班长说：

“你们要把食堂办好，让工人吃饱、吃好，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

陈云时刻惦记着职工食堂的问题，一个月后他在厂会议室参加了炊事班班会。会上，老首长亲切地和每位炊事员握手，一一问候。他说：

“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红军长征年代的炊事员。那时，天上有敌人飞机跟踪轰炸，后面有敌兵追击。我们的炊事员行军背米、扛锅，一到宿营地，就动手挖灶，烧水给战士洗脚，然后开始做饭。因为战争年代，战士们一到宿营地洗脚第一、睡觉第二、吃饭第三。”

炊事班长瞪大眼睛听老首长讲话，他觉得奇怪，便问：

“老首长，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应该是吃饭第一重要，你怎么说洗脚第一重要呢？”

陈云听后，笑着解释说：

“战争时代，战士们最重要的是每天要洗好脚，睡好觉，这样才能消除一天疲劳，才有精力打仗。至于吃饭，有时战情紧急，大家端着碗边走边吃……”

发言中有个炊事员流露出不想干炊事工作的想法，说：

“炊事员起早摸黑，众口难调，有时还要遭骂。这种又累又受气的工作还是请农村临时工干好。”

陈云听后，沉思片刻后站起来，看着那位同志，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

“关键是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叫谁来也干不好炊事工作。不要嫌炊

事员工作是侍候人的工作，这种炊事手工劳动，1000年以后还是要的嘛。”说到这里，老首长那慈祥的目光环视着在座同志，然后，用手指着老炊事员涂师傅说：

“老师傅，你干了好多年炊事工作吧，今后你老了，躺在床上还是要儿媳来喂水、喂饭嘛。我的炊事员，他就跟了我12年，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炊事工作很重要啊！”

陈云一番话给食堂炊事员以深深的教育。今天，他们怀念陈云，反复地回味老首长那句话：“炊事工作很重要啊！”

（刘正光、吴初生）

秧歌与教学

1971年7月下旬，素有“火炉”之称的南昌格外炎热，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九度，使人难熬。

一天下午，陈云来到厂部会议室同厂职工子弟学校黄云玖、曹玲玲、黄秋英和张美琪等几位老师座谈教学工作问题。

这时，窗外蝉鸣阵阵，没有一丝风儿，绿荫如盖的法国梧桐树的宽大叶片纹丝不动。室内，电风扇在嗡嗡地旋转着，陈云坐在远离风扇的沙发上，面带微笑，打着手势请参加座谈会的老师在风扇边就座。

“老首长，天气大热，您也坐过来吧。”老师们谦让着，空出一个位置请陈云坐。

陈云摆摆手，感谢大家的好意，向大家解释道：“人老了，坐在电风扇旁会着凉的。”经他提醒，大家这才注意到：大热天里，陈云不仅穿着长袖衬衫，衬衫外还套了一件薄薄的丝棉背心呢！

话题主要是围绕着十年制教科书和教学工作展开的。陈云告诉大家，前些日子，他收集了一套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用了几天几晚的时间看完了这些本本（教科书），大致熟悉了里面的一些内容。随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教材是个大问题，你们不要小看啊！”

老师们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谈了起来，有的反映：教材内容太浅，影响了学生学习。还有的老师认为：现在上课、老师讲、学生不愿意听，教学效果不好，长此下去怎么得了？黄云玖老师还谈了自己不安心教师工作的思想，十分动情地叙述着自己内心的痛苦：“作为一名教师，我总想把书教好，为国家培养出有用的人才，从良心上对得住学生，对得起家长，可现在却天天在批判臭老九……”

听到这里，陈云放下了手中的记录本，关怀地问道：“黄老师是哪年参加教育工作的？”

“1951年4月参加教师工作的。”黄老师回答。

陈云笑了，“我看了毛泽东选集，在所有4卷中没有哪篇文章说老师是臭老九呀。”他抬起手来指着黄老师风趣地说：“你是解放牌，是在党的教育下健康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新中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话语中充满了赞许和鼓励，说得老师们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教书应该像扭秧歌”。陈云情不自禁地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摆起架势，哼着秧歌调，扭起了秧歌舞。老师们惊喜地鼓掌合拍，打心眼里崇敬这位关心教育事业、平易近人的老首长。陈云兴致勃勃地说：“秧歌舞向前走两步，然后退一步，扭起来很好看。教书要形象生动，你花了大量时间向学生讲课，也要给时间让学生消化所学的知识，还退一步，就是让学生自己复习，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说完，陈云转身坐回沙发，意犹未尽地补充道：“千万不可以像开汽车，一溜烟地跑哟。”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老师们被陈云的关怀和理解深深地感动着。陈云的教诲像和风细雨，湿润了老师久旱的心田，许久，大家又热烈地鼓起掌来……

座谈会结束了，参加座谈会的老师们依依不舍地与陈云握手告别。

（黄云玖 于向明）

我们工人的贴心人

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期间，处境艰难，但他仍经常深入生产一线，十分关心工人的疾苦。

当时我厂属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我在一营一连（锻工车间）负责生产调度和施工工作。由于我大学期间学的是锻压专业，参加工作时间又不长，热切希望把新学的专业知识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特别热衷于搞小技术革新。当时我正和工人师傅一起试制弯管设备，经过几番摸索，我们终于有了点头绪。在试机那天，陈云在他秘书和我们的连指导员陪同下，来到我们的机台边，微笑着看我们操作，听我们讲解。见陈云到来，我心里有点紧张，但还是鼓足勇气作了讲解。我说：“首长，我们搞这个小革新，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成果。经过反复试验，我们找到了主要矛盾是顶轮推进速度的快慢，速度快了管子会弯扁，慢了也会弯扁。只有保持一定的速度，管子才不会弯扁……”试机完毕，陈云赞许地向我点点头，投来鼓励的目光。

第二天，连指导员找我谈话。他对我说，“‘北京来的客人’说，‘锻工的劳动强度很大，一定要努力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才好’。你看有什么办法？”就这样，在陈云的关怀下，我们成立了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决定在锻工车间内自制一台2吨地面行车。我们奋战了三四十月，终于制成了。尽管这部地面行车有不少缺点，但对于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没有剪彩、没有庆典，这部行车使用至今，一直在为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而默默奉献。

陈云离开江西后，有人告诉我：陈云离开我们厂那天，还特地到了锻工车间，特地看了那部地面行车。

我在锻工车间一直工作到1992年，为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搞了多项技术革新。后来调到安装工程处，从事化工石油机械工艺管道安装和液化石油站建站施工。工作岗位变了，陈云的教诲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一定要牢记陈云的教导，时刻不忘工人的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刘明恒）

青年人要多学技术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升空传回的悠扬乐声，给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亿万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喜悦。

陈云这些天也格外的高兴，白天、晚上都来金工车间看看。

那天上午，我正埋头在车床上加工一个零件。当我停讫转身取量具时，才发现陈云正站在我的身边。我当时不知怎么是好，望着陈云一个劲的傻笑，连招呼都忘了。

“你挺认真的。你叫什么名字？”陈云问。

“我叫虞永，首长。”我们都知道陈云的身分，再加上当时我们是兵团战士，按部队的建制，对陈云都这样称呼。回答后，我还是站在陈云的身边，看着他傻笑，心里很想跟这个“老头”多聊聊。

陈云的秘书肖华光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劳动。比较熟悉。而陈云站在我身边这还是第一次。我有点紧张，但见他满面笑容，我的胆怯也就没有了。

陈云问我：“你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

“我进厂快半年了。”

“你南昌话的口音不重，是什么地方人？”

“我是安徽合肥人，家就在南昌市内，安徽老家没有了来往。我是在江西生的，但父母亲还是叫我填写安徽人。”

“父母亲叫你填，你就填嘛。”陈云笑起来，接着说：“你父母干什么工作的？”

“他们都是工人，都在机械厂，也开这种机床。”

陈云指着我的机床：“也是开这种机床？那好嘛！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技术。”接着陈云仔细地看我车好的零件，微笑地点点头。

我看陈三挺高兴，便斗胆提了几个问题：“首长，中南海有多大？你进中南海肯定随便进吧？”

“有事情，我就去中南海。”陈云回答说。我还想问下去，此时班组里的同事见陈云跟我聊家常，便都簇拥过来了。

这时，肖华光指着我向陈云介绍说：“他就是我们这里的‘小罗汉’”。经肖华光一说，在场的都笑起来了。我却很气恼，狠狠地盯了肖华光一下，心想：你干吗不说句好的！”

“什么？怎么叫‘小罗汉’？”陈云笑着问。

在场的伙伴七嘴八舌，好不热闹。

“他是我们这里的活跃分子，每天都有许多问题来难我们的肖秘书。”

“他呀，每天又说又笑，是个小活神仙。”

陈云见我被肖秘书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给愣住了，便拍着我的肩笑着对我说：“小罗汉就小罗汉嘛。爱说、爱活动不是什么坏事。不过，小虞，趁年轻时，应该多多学技术，学好技术。”

我很感激陈云给我解围，眼睛看着陈云没敢吭声，只是“嗯”了一声，心里却涌出一股暖流。

陈云说完，带着和我们聊家常的愉快，向车间的另一角走

事过20几年，我还记得陈云给我的教诲：“应该多多学技术、学好技术。”回忆走过的路，陈云的教诲使我在生活的历程中真受益不少。

(虞永)

难忘的一课

一年一度的年终评比活动结束了。当陈云知道他所“蹲点”的木模车间的3个班组中，有两个班组被评为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1969年度先进班组后，十分高兴。他伸出两个手指头，乐呵呵地对木模二班的班长说：“三个班组评了两个先进，好啊！”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对班长说：“班长同志，我也想在班里的学习会上发个言，请帮我安排一下吧。”

一听说陈云要在学习会上发言，大家可高兴了。陈云来了这么久，大家早就想听他讲话了，为此，班里特地把学习地点从班组移到了车间会议室。

第二天下午，学习时间快到了，工人们收拾好工具，打扫完工作场地，便一齐来到了会议室，陈云照例准时到达。大家围坐在会议桌旁，与陈云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会场的气氛显得热烈而融洽。

学习开始了，由班长主持学习。陈云首先问班长：“班长同志，今天是不是轮到我发言了？”班长笑着点了点头。

于是，陈云从桌上拿起老花眼镜戴上，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药瓶子，从里面倒出两粒小药丸，放进嘴里。陈云轻轻地咳嗽了几声，便开始了他到木模车间后的第一次发言。

“我到你们班参加学习以来，对班里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知道班里有青年学生、有退伍军人、有下放干部、还有老工人。但是班里的老工人少，青年工人多。”说着，陈云看着班里的年轻人，问道：“你们这些年青人两年前在学校里都是红卫兵，你们觉得红卫兵怎么样呀？”

说到这，陈云停了下来，深邃的目光看着大家，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因为说错一句话就会被上纲上线，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对这样敏感的问题，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大家都不言语，默默地看着陈云，会议室内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突然，只见陈云紧握着右拳，用力往右上方一挥，喊道：“冲啊！”陈云顿了顿，语气激动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在社会上冲冲杀杀，他们抓我游街，还抄了我两次家。我身体不好，游街不能游完规定的路程。每次游到一半，我就停下来作个记号，第二天又从这里接着游。后来是周总理保了我。”陈云讲到这，语气渐渐转为平和，思绪也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在大家的议论纷纷声中，陈云又接着说：“你们班里的这些小同志，昨天在社会上还是造反有理，今天到工厂里来能够安心生产，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啊！”

说到这，陈云用慈祥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青年工人，并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青年工人文化程度都很高，你们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初中生，高中生要花多少钱吗？”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能回答出这个问题。陈云见无人回答，便伸出手指头，说：“要花数千元钱呢！”稍停，陈云又加重语气说，“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管经济的，我两手空空。”

说到这里，陈云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大衣口袋，又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钱都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来之不易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生你们、养你们的工人、农民啊！”

陈云的话语中，充满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年轻人。

陈云又强调说：“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我们工厂要搞好生产，多为国家创造财富，这样，人民的生活才能提高。”

陈云又进一步勉励青年工人：“你们要学好技术，要热爱本职工作。资本主义国家搞工业、办工厂，也是从木模、翻砂、加工这样一道道工序干起的。人家工业发达了，国家就富裕，我们要努力赶上和超过他们啊！”

在当时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陈云的这番话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去了长期压在人们心头上的阴云，听后让人感到鼓舞，感到精神振奋，从而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下班铃响了，陈云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望着陈云同志远去的背影，大家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很久。工人们深切地体会到：陈云今天发自肺腑的一席话，是给大家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

（吴初生、刘正光）

“要力争晚稻超早稻”——忆陈云考察大昌大队

南昌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魏际福珍藏着一本红色《纪念手册》，每当他看到这本《纪念手册》，就自然会回想起 1971 年 10 月陈云在南昌县八一公社大昌大队考察的情景。

笔者采访了当年接待陈云的主要当事人魏际福，听到了他真实动人的回忆：

1971 年 9 月下旬，我在南昌县八一公社大昌大队任党总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时，有一天接到南昌县革命委员会电话通知，陈云要到我们大昌大队来视察。当时，我们大队干部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盼望早日目睹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

10 月 2 日清早，我按照省革委电话通知精神，带领几名大队干部在一间临时办公室等候，公社党委书记和南昌县农业局负责同志也来了，我们一块儿作了精心的安排。

中秋时分的南昌县农村，田野里是一片片绿油油的晚稻，呈现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这天上午 9 时左右，一辆伏尔加轿车从莲塘驶来，在大昌大队临时办公室门口缓缓停下来，我们等候着的干部迎上前去向来客表示欢迎。陈云下车后，同我们一一握手，由秘书、警卫员陪同，走进了茅屋似的大队办公室。陈云坐走后，亲切地询问大队的情况，首先是询问在座的姓名、年龄和职务、文化程度。

当时，我是大队主要领导，第一个回答陈云的提问。我说，我今年 31 岁，高中毕业。陈云听后，风趣地说：“好啊！你是跨世纪的干部，有发展前途，大有希望！”随后，他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顿时，我们在座的人原来那种拘束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室内的气氛也活跃起来。接着，陈云询问大队的其他情况，我们作了详细的汇报。

陈三一边听一边记录，当他听到我们汇报大队“文化大革命”情况时，他老人家只听下记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他静静地听并详细记录，没有听清楚的，他就说：“请你再讲一遍！”直到听清记录下来为止。

我当时非常认真，一点一滴、如数家珍地向陈云讲开了：

“解放前，大昌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亩产只有 300 斤左右，碰到水灾或旱灾，粮食减产，老百姓就要饿肚子，被迫去讨饭。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亩产也只有 500 多斤，没有跨‘纲要’，农业生产还很落后

陈云又问道：“什么原因呢？”

我回答说：“一是没有普遍推广种双季稻，双季稻只占 60%；二是水利灌溉问题没有解决。”

“1958 年南昌县兴修了赣抚平原水利灌溉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问题，全部种了双季稻，亩产近千斤，跨了‘纲要’。粮食增产了，农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提高。”我把 1958 年前后的农业生产的变化情况向陈云作了详细汇报。

这时，陈云插话说：“产量还不算高，要力争晚稻超早稻。”

陈云关注地问起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农村刮起“浮夸风”的情况，

他问道：“大昌大队的情况怎么样？”同时告诫在座的人都要实事求是，有成绩谈成绩，有问题就谈问题，不打“埋伏”。我们几位大队干部如实地作了汇报，既讲成绩，也讲问题。陈云点点头。接着他又询问社员的实际生活情况，如住房、卫生条件等，还询问了养猪、种菜等问题，问得很仔细、很实在。

陈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座谈中，他幽默风趣，谈笑风生，每人都感到好像是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交谈，毫无拘束。

陈云生活很简朴。我们大队买了二两比较好的茶叶泡茶水招待他，可是陈云没有喝一口，也不吸烟。座谈几个小时，我们请他喝茶时，他老人家总是笑笑地说：“谢谢大家”。

陈云也很关心社会治安问题，问了不少情况，问得很仔细，还边问边记录。他老人家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身体又不太好，同我们座谈几个小时，这么认真，我们大队干部深受感动和教育。”

当我们汇报到大队只有一所完全小学，只能基本解决社员群众子女入学问题时，陈云听后严肃地说，“办好农村教育很重要”。他用鼓励我们的口气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要看得远一些，努力办好教育事业，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培养好接班人。”

我们向陈云汇报大队办有敬老院，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逢年过节，大队还送给每位老人几斤鱼、肉、鸡、鸭等，使他们愉快度过晚年。他听后，很幽默而风趣地对我们说：“以后我到你们大队来当个‘五保户’，你们欢迎不欢迎啊？”陈云这么一说，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座谈会的气氛就更加活跃。

这时，我更加兴奋了，一股劲地向陈云汇报：

“我们大队社员，无论是强劳动力，还是老弱病残，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热天穿“的确凉”衣服，冷天穿毛绒衣，有的年轻人还买了军大衣穿。全大队20%左右的社员买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陈云听到这些情况后感慨地说：“现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这是共产党领导得好，毛主席领导得好，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好，只要我们干部带领社员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今后的生活会更好。”

在座的人听了陈云的这番话，心里甜滋滋的。这时，我站了起来，面对陈云激动地说：“这是老首长对我们的关怀、鼓励和鞭策；我们决不会辜负老首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大队干部一定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时钟已过12点了，座谈了几个小时，陈云毫无倦意，依然谈笑风生，使我们在座的县、社、大队干部深受感动和教育。大家都觉得和陈云在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连吃中午饭的时间都给忘记了。这是陈云的秘书提醒，大家才晓得已过了12点了，于是我们请陈云吃午饭。但他婉言谢绝，亲切地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登上汽车回青云谱去了。

1972年8月，我们看到陈云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分出席盛大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新闻照片时，当年陈云和我们一起座谈的情景又呈现在我眼前，他那幽默风趣的爽朗笑声又在我耳边回响，我们是多么希望他老人家再来我们大队视察啊！

（李国安整理）

陈云在江西大事记

1933 年

1月中旬 奉中共中央委派与博古（秦邦宪）从上海乘船至广东省汕头，然后经福建省上杭、长汀等地抵达中央苏区瑞金，时寸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局长委员长兼党团书记。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中央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

2月25日 出席闽赣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社会保险、扩红支前、生产建设等问题。

3月13日 在瑞金县叶坪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课，讲授工人运动史。

4月25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期）上发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

5月1日 出席在瑞主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店员手艺人章程》。

5月 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号召中央苏区工人响应中央关于“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带头参军，以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

6月30日 在《苏区工人》（第3期）上发表《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一文，批评各级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把斗争引向极端危险的工团主义倾向，指出总同盟罢工有害于苏区经济的发展。

7月2日 从瑞金出发前往福建长州视察工作，指导和帮助汀州京果业工人与资方订立劳资合同，并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总结了订立合同的办法与经验，指出：订立合同时，必须首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工人的要求，合同要切实可行，而且要有“弹性”。

7月5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发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批评一农业工人工会巡视员，不顾农业工人的实际生活困难，不关心群众疾苦瞎指挥。要求各级工会负责人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提出工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8月1日 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盛大阅兵典礼和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誓师授旗仪式。

8月2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23期）上发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指出：苏区工会忽视对保护工人日常利益的工作，对扩大红军、查田运动没有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会自身存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要求各级职工会切实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

8月 中共中央组织局成立、陈云为组织局成员兼管白区党的工作。

9月1日 出席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建立一支国有船队，新造300艘木船，修理100艘，加强苏区进出口物资运输。

9月 在瑞金县岗面、寨上红军兵工厂视察工作，调查研究兵工厂生产

情况。

12月5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37、38期）上发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指出：白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弱点，即没有积极参加群众的自发斗争，争取其领导；没有发动与组织群众斗争去开展白区工作。

1934年

1月15日至18日 出席在瑞金县沙洲坝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1月19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43期）上发表《给零都县岭背区突击队长谢绍武同志的信》，批评谢向困难投降和反对党提出扩大红军突击队运动中开展思想斗争的错误。

1月22日 出席在瑞金县沙洲坝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负责领导中央苏区的军需生产。

2月2日 出席瑞金叶坪红军烈士塔、红军检阅台落成揭幕大会。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45期）上发表《为收集粮食而斗争》一文。指出：保证和充裕粮食的供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2月3日 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4月28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57期）上发表《红“五一”前夜的全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战斗》一文。

5月5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58、59期）上发表《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一文。指出：福建事变中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基本的弱点，就在于不了解与不会正确运用统一战线。

6月7日 为中共中央编印的内部学习小册子撰写前言，阐述了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

8月1日 出席中国工农红军“八一”阅兵典礼和“抗日宣誓”大会。

9月14日 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72期）上发表《游击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一文。指出：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是加强现有游击部队政治和军事教育；加强赤少队首先是模范赤少队的领导。

10月10日 中央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被派到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随红五军团长征。

10月20日 率领红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零都河（贡江）向湘西进军。

10月25日 随红五军团渡过赣县桃江（又名信丰江）离开中央苏区。

1953年

本年 在国营三二 厂（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视察工作，听取汇报后指出：现代化工厂，管理不易，要提高生产率，必须加强管理，要使工厂生产逐步走上正轨。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会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

1969 年

10 月 3 日 周恩来总理给江西省革委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知，中共中央决定，陈云带秘书、卫士和厨师到江西“蹲点”，要求江西省革委安排好住房、蹲点的地方和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10 月 20 日 在秘书肖华光、卫士李奇和厨师等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经上海到达南昌，暂住滨江招待所一号楼。

10 月 21 日 听取江西省革委、省军区负责人介绍情况。

11 月 4 日 从滨江招待所移居南昌城南郊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在此渡过了整整 2 年又 7 个月的艰难岁月。

11 月 12 日 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

11 月 13 日 在厂部听取连（车间）以上干部汇报“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

11 月 14 日至 16 日 参加新老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代表座谈会。

11 月 17 日 在金工、铸锻、容器车间观看工人操作生

11 月下旬 分别轮流到各车间参加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五好”评比会、座谈会，找基层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个别交谈，了解“抓革命，促生产”和职工生活等情况。

12 月 6 日 参加木模车间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给几名青年工人签名留念。

1970 年

4 月 24 日 参观金工车间“革新产品”。

5 月 24 日 在容器车间参加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听了工人的发言后，深有感触他说：“大家既谈革命又谈生产，既讲成绩又讲缺点，这样的学习会，我不是百分之九十五，也不是百分之九十八赞成，而是百分之百的赞成。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只谈革命，不搞生产，那我们吃什么？”

5 月 在江西汽车制造厂参观，听取厂负责人介绍情况后，分别到金工、锻工、铸工等车间观看工人操作生产。看到生产出来的井冈山牌载重 2.5 吨的卡车时，高兴地称赞：工人阶级了不起！

7 月 5 日 临时回北京休息。7 月底从北京回到南昌。

8 月 4 日 赴福州休息。

8月23日至9月6日 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9月 在铸工车间观看化铁炉化铁时，亲切地与工人交谈，并讲解各种生铁的牌号、性能和焦炭消耗等问题。

1971年

5月16日 在南昌县罗家公社考察，听取公社负责人汇报。翌日，参观公社农科所两稻一麦“三熟”试验田和胡家大队“新农村”。

6月20日 在南昌市第十九中学考察，听取校负责人汇报“教学改革”情况，与教师座谈探讨教学改革问题。座谈时指出：要提高教学质量，要提高老师的政治、业务水平，要办好一个学校，培养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关键是要加强党的领导，要有好的师资和教材。

9月9日 从南昌乘火车抵达新渝县（今新余市）考察。

9月10日 在新渝钢铁厂参观考察焦化分厂，详细询问焦炭生产情况，并到现场观看出焦炭的情景。

9月11日 在江西钢厂参观考察，先后考察了薄板、丝带、炼钢、轧钢等分厂。

9月12日 参观毛主席在新渝县革命活动陈列馆。

9月15日至20日 在萍乡市考察，听取市革委负责人汇报工业生产情况。在萍乡钢铁厂与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亲切交谈，了解生产和工人生产等情况。参观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源煤矿总平巷、中共安源地委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张家湾军事会议等革命旧址。

9月28日 在南昌县“八一”公社淡溪大队考察，与大队干部座谈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等问题。

10月2日 在南昌县“八一”公社大昌大队考察，与大队干部座谈农业生产、农村教育、办好养老院和社员生活等问题。

10月5日至10日 中共江西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联系江西实际，揭批林彪及其死党叛国的罪行。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了揭批林彪叛国出逃的罪行的发言。

1972年

1月25日 参加中共江西省委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

4月20日 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向全厂职工告别，亲切地同厂负责人交谈办好工厂的意见和建议。

4月22日 由秘书肖华光、卫士李奇和厨师陪同告别南昌乘火车回北京。

1985年

10月2日 为“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食品工业学院”题写校名。

（马骏整理）

陈云在中央苏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

陈云自 1933 年初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至 1934 年 10 月随主力红军撤出江西,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不到两年时间。在此期间,陈云主要负责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会工作和白区工作,担任过全总党团书记和白区工作部部长。当时正值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完全控制中央苏区和红军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由于脱离革命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实际,盲目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在革命根据地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给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着重介绍陈云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抵制。

一、对王明“左”倾劳动法政策

推行所发生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以大量的事实批评了“左”倾政策,坚持了正确意见。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政权,工农阶级在这一政权下应享受各种权利。苏维埃政府为了保障工农阶级的这些权利,必须分别制定各种法令。因此,他们根据苏联的经验,在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通过了过“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劳动法详细规定了工人阶级在劳动时的各种利益。譬如:(1)在工作时间方面规定:所有雇用劳动者通常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 16 至 18 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6 小时; 14 至 16 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 小时。(2)在休息时间方面规定: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 42 小时的连续休息。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凡继续工作到 6 个月以上,至少须有两个星期的例假;在危害健康的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须有 4 个星期的例假。例假工资照发。另外还规定许多纪念日,纪念日均全大休息,纪念日和星期日的前一天的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超过 6 小时。(3)在工资待遇方面规定:任何工人的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部所规定的真实的最低工资额(以社会生活情形和工人家庭必需生活费用力标准——引者注)。各种部门的最低工资额至少每 3 个月由劳动部审定一次,并且随着社会生活提高而增高。所有劳动检查机关和工会所特许的额外工作,工人须得双薪。(4)在劳动保护方面规定:无论何种企业,必须发给工人工作专门衣服。工作专门衣服的种类及穿着的时间由劳动部特别规定。工人或职员参加社会活动,无论时间的长短,都不得克扣工资。工人或职员被征到红军中去服务因此而失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须预先发给他们 3 个月的平均工资。此外还规定: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寄宿舍,无代价的分给工人及其家庭,来建筑寄宿舍的每月由工厂津贴相当的房金。

“一苏大”《劳动法》的上述政策规定,显然是脱离了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劳动法视为“全苏大会和成立中央临时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法令”,“自全苏大会颁布后即生效力,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都要执行”,“谁个违反(犯)这个法令上一切规定,那就算是犯了法,政府就要依法加以惩罚”。劳动法颁布后,当时各苏区以怠工的方法对劳动法进行抵制。对此, 1932 年 4 月,劳动部又发布了一号训令;

限令从 1932 年 5 月起,各地务必实行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条款。

劳动法强制推行的结果,必然破坏根据地的工商业。致使许多私营工商业和企业垮了台,工人失了业。据有关部门统计,仅福建长汀一地,到 1932 年 10 月,由于资本家逃跑、关厂,使造纸行业部分工人失业,纺织行业中失业人数达五分之四。同时也妨碍了合作社事业发展,干扰了国营企业,使苏区工业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和破坏。

陈云到中央苏区后,目睹王明“左”倾劳动政策在苏区推行的恶果,内心感到十分的忧虑不安。1933 年 6、7 月间,他深入福建汀州进行社会调查。为了了解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形,陈云深入基层找党员同志谈心,使他“对于企业情形与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陈云在调查中发现,在汀州工商业中,劳动法所规定的“8 小时工作完全没有实行”,“因为乡村生意与城市不同,生意忙的时间也不同(譬如接近田郊的店铺,每天上午 8 时后,下午 4 时以前较忙,因为这个时间内是农民到汀州来赶市的时间。本城内某些店铺,因城内居民的生意较多,所以在上午 8 时前下午 4 时后较忙)。所以机械地规定 8 小时或者几点到几点为工作时间是不适宜的”。这种“不适宜”主要是它脱离了苏区经济状况。因为在苏区经济体系中,由苏维埃政府兴建和直接领导的公营工业、商业以及由根据地劳动群众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手工业、商业是少量的,而大量的是私人资本开办的工厂、商店。把那种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强制在苏区推行,这显然是不适宜的。

陈云在调查中还发现,在汀州工商业中,工人“星期日完全没有休息,作工也不加双倍工资,因为工人感觉到每天做工不到 3 小时,星期日休息不休息差不多,每天在闲的时间离开店也不受到老板干涉,工人以为如果星期日要加额外工资,则老板在星期六晚上就会通知工人次日星期日不要工人做工,因为店内生意老板与经理尽可自己照顾,不愿再出双倍工资”。由此可见,王明“左”倾劳动法将劳动人民之间的师徒关系当做雇佣关系,强制执行过高的经济条例,这必然会影响到苏区经济的发展与巩固,为此,陈云指导工人与老板签订临时无限期的劳动合同,这是“很实际的”,也是“十分适宜的”。陈云经过深入调查后,不仅抵制和批评“左”倾劳动政策,而且坚持了正确意见。他认为:“我们应该领导工人坚持要求 8 小时工作与星期日的休息”,“但是 8 小时的工作时间的运用,每星期休息的办法是活动的不是机械的”,这要考虑到商店营业上的特殊性。如果机械的执行只适用大城市的劳动法,必然会使企业不能担负而迅速的倒闭。

由于陈云和毛泽东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主张的同志的抵制和批评,以及“左”倾劳动政策在实践中对苏区经济所造成的危害,使博古等“左”倾领导者终于认识到:“这一为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宣传机械执行的”。于是,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 38 次例会上,决议修改劳动法。1933 年 10 月 15 日,临时中央政府重新颁布了修改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新劳动法与原劳动法相比,在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福利待遇上作了一些修改,废除了某些脱离苏区实际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的条文,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劳动政策所造成的错误,这对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对苏区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

众的弊端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提出了纠正的实际措施。

“一苏大”《劳动法》一些过高规定的规定，既不符合苏区经济的实际，也反映出苏区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着极端危险的工团主义的倾向。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少数工人群众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发展苏区经济和巩固红色政权的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追求狭小的经济利益，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而许多地方的工人，在罢工中所提出的斗争要求，又都是抄录劳动法的规定，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而且条文也非常“呆板”，不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因此，实行起来也比较困难。在领导的方式上，党与工会也存在下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没有发动群众自己积极的讨论，也没有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是常常拿着已经起草好的合同等文交给群众去“讨论”，即使连这种“讨论”，常常也变成了简单的“赞成的举手”。

陈云到中央苏区后，对苏区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端没有作任何的掩饰，而进行了严肃批评。

首先，指出了它的危害性。陈云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中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经济斗争中间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不但妨碍了红军的作战的行动，而且却却（恰恰）被资本家利用去团结一致，来反对工人的斗争，来实施对于苏维埃经济上的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的错误”。

“这种”‘左’的错误的领导，非但不能发展工人阶级的觉悟与提高工人的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的生活，使工人群众不信任党与工会的领导”。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是破坏苏区经济的发展，破坏工农的经济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自己彻底的解放”。其次，分析了它的来源，陈云认为：这种错误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不深入群众与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是由于“工会在纠正经济斗争‘左’的错误中，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反对‘左，倾，发展着严重的危险的左倾社会主义的错误”，从一种错误倾向走向另一种错误倾向。因此，陈云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中大声疾呼，要求党与工会“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忽视工人利益，反对脱离群众的倾向”，“反对在工作转变中没有气节的对于困难投降的倾向”，“同时丝毫不放松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反对一切命令强迫群众的方式”，“因为这种‘左’的倾向是右倾社会主义的另一面”。很明显，陈云是从“左”和右两方面来深刻地分析其来源。这就足以说明，陈云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是一贯的，早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就有突出表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云在对工人经济斗争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并提出了纠正这一错误的许多实际措施。其一，提出“党与工会在经济斗争的领导上必须纠正官僚主义的一般的领导，必须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的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企业的实际情形，规定适当（合）于这个企业的经济要求”。^①同时，“党与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详细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经济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

看成工人自己根本解放的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不能解放自己，使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最密切的与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联系起来”。(12)

其二，提出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必须依靠于群众自己的最积极的行动，每个日常经济要求，每个集体合同的等文，必须是群众最迫切的需要，必须经过群众慎重的讨论”，“只有群众自己的要求，才能使群众有决心与信心来争取这些要求，党与工会的任务是要正确的了解群众的要求，抓住这种要求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为实现这些要求而坚决斗争，提高群众阶级的政治的觉悟，取得群众对于党与工会的热烈的拥护”。(13)

其三，提出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方式上，“要组织群众自己选举有威信的领导斗争的委员会”，“要领导工人自己起来选派代表与资本家谈判，在群众面前暴露资本家压迫与剥削工人的实质，即使对付那些顽强的资本家，要采取罢工手段时，必须在罢工以前采取交涉谈判、包围等各种方式的斗争，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去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14)

其四，提出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战术上，“工会应组织同业的与各业的工人用开会、慰问、示威、包围等各种同情援助的方式来提高阶级团结情绪与组织阶级团结的力量”。“只有这样的了解群众情绪，依靠群众力量，组织群众力量的各种斗争方式，才能正确的发展工人的阶级与政治的觉悟，发展无产阶级斗争与组织的力量”。(15)

其五，提出党和工会在领导经济工作中，不仅要注重实地考察，而且要讲究领导艺术。“要把正确的决议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与艺术的领导方式”。(16)因为“纠正‘左’的倾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不是容易的事，没有去解除工人实际上所遭遇的困难，一切企图用命令的方式来通过一切，这实际上丝毫不能解决‘左’倾的错误，而且在工人中间，可以发生更坏的不满意工会领导的情绪”。(17)

总之，党与工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的莫大的危险，要正确的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在经济斗争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对地方党组织不够重视白区工作的问题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

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的办法，严禁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使根据地出现工业商品奇缺，农副产品销不出去，价格上涨和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的现象。苏区的工农业生产衰退阻滞，军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于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沟通赤白内外贸易，活跃物资交流，成为解决苏区社会经济的迫切问题。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下，许多党的地方组织对白区工作还不够重视，党在白区的工作极大的落后于客观形势。

陈云来到中央苏区后，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面对白区工作的落后形势，他深入实际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

陈云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文中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党对白区工作的消极，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根本就没有考虑白区的工作。即使是已经开展了白区工作的地方，党组织也还存

在不少问题。在此文中，陈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有些地方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明确地指出了改进的办法。

首先是有些地方党组织，没有去积极参加并领导群众的自发斗争，没有发动与组织群众斗争去开展白区工作。陈云认为：我们党要发动群众积极斗争是完全可能的，环境也是极端有利的。“一些过去是苏区现在暂时被敌人摧残的地方，群众是在坚决反对国民党，为苏维埃政权而拼死奋斗”。(19)而且这种斗争已经由消极的拖租，发展到积极的武装斗争，问题是我们的各级地方党组织要积极去发动和领导群众。陈云认为，“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为政权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步骤”。(20)譬如，反抗强迫修路，反对限制卖盐，反对一切军阀、团匪、地主的压迫，在临近苏区的白色区域，主要是发动和领导白区群众反对靖卫团匪的拦路抢劫，反对敌人禁止贩运。通过这些自发斗争，来发动群众和组织开展白区工作。陈云还认为：我们党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时，“在乡村中建立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是绝对必要的”。(21)要使游击队成为群众的武装斗争以及一切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我们党必须真正了解群众的迫切的要求，而提出为群众所了解所接受所迫切需要的口号”，“我们党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工作方法”。(22)同时应该“分配最好的最适当最有能力的干部去担负游击区域的领导”。(23)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在白区的工作上坚持执行党的路线。陈云还认为：“党必须在白色区域中建立集体的领导”。(24)纠正过去地方党组织与游击队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的错误，纠正在白色区域中上面有广大的机关跟着游击队走，而下面的各区以及小的游击队缺乏领导干部的现象。为了建立集中的领导机关，应该选择区的独立团、工作团与游击队中最好的干部，组织集中领导的军事政治委员会；没有与游击队取得联系的县委应该改组，选择县委及最大的游击队中的好的领导干部组织新的县委，县委书记兼游击队的政委；游击队与地方党的领导合并成一个领导机关；区的军事政治委员会为全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各乡成立分区委，当军事政治委员会所在的那个游击队大队离开本区时，分区委即应成为全区最高领导机关。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取得白区工作的领导权。

其次是我们党在比较重要的敌人扼守的城市中的工作是极端微弱的。陈云认为：“这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对于争取城市工作的建立，与这一工作之时于革命战争与破坏敌人的堡垒，配合红军的进攻的极大的作用是估计不足”。(25)因此，我们地方党组织在“领导”白区工作时“常常只限于通报消息”，“还不是面向工人群众，面向企业”。尤其是在白军士兵中的工作，我们是“极端忽视的”，而且许多地方党组织觉得“这个工作不是他们的任务”，这是错误的。

再次是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国民党军阀带着假面具，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而我们地方党组织在揭破他们的欺骗宣传

上表现出极端的无能。陈云认为：我们党应该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应该去广泛的发动群众，开展真正的反帝反国民党新军阀的群众运动。在斗争中抓住他们每一个压迫革命的事实，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欺骗的反革命的实质，向群众和白军士兵解释苏维埃红军的宣言，使我们党的宣言与主张成为工农群众和白军士兵迫切的要求。

最后是我们党虽然在白区群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没有从组织上把

他们巩固起来，这是我们党在组织工作上的极大的弱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还不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名称去组织群众；二是在苏区的党与工会没有利用白区群众成千成万来往苏区做小贩的机会去宣传和组织他们，并利用他们去建立与开展白区工作，陈云要求苏区地方党与工会在边区来往要道与圩场，设立俱乐部、饭店，招待吸引白区工农群众，加强在白区中党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在苏区内部政府与税收机关，对于来往苏区的白区工农群众进行敲诈的阶级异己分子要严加处置。在以陈云为首的白区工作部的领导下，白区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支持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巩固红色政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陈云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胡松）

注：

项英：《劳动法的报告》，《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版。

陈云：《怎样订立劳动合同》，《斗争》第 18 期，1933 年 7 月 5 日。
(11) (12) (13) (14) (15) 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斗争》第 9 期，1933 年 4 月 25 日。

陈云：《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斗争》第 23 期，1933 年 8 月 22 日。

(16) (17) 陈云：《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苏区工人》，1933 年 6 月 30 日。

(18) (19) (20) (24) 陈云：《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斗争》第 37 期，1933 年 12 月 5 日。

(21) (22) (23) 陈云：《游击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斗争》第 72 期，1934 年 9 月 14 日。

陈云在中央苏区，从事经济工作的科学态度

陈云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是一贯的，早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就有突出的表现。1933年初，陈云从上海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后，在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同时，并从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会和白区等实际工作，担任过白区工作部部长。在这期间，陈云和毛泽东等同志一道，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做了大量的经济方面的工作，积累和总结了苏区工作的革命经验，并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及《苏区工人》上先后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为收集粮食而斗争》、《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等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从总体上看，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根据地农村实际的结合，从某个侧面体现了陈云从事中国革命运动的早期经济思想，以及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卓有成效的领导艺术。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领会陈云的经济思想，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央苏区的经济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工业比较落后。因为地处偏僻，生产力低下，边区的工业绝大多数处于手工操作的状态，如造纸、榨油、刨烟、染布、制糖、碾米等。这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苏区工业，又处于被敌人包围封锁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为了保证革命战争所必需的物质供应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苏区党和毛泽东实行了保护、发展城镇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可是，左倾教条主义却脱离根据地社会经济状况的实际，用城市观点来对待苏区工业和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实行了过左的劳动政策。1931年11月，王明教条主义者在新的形态下继续和发展了李立三的左倾劳动法，制定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个劳动法虽然提出了反对无故解雇工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人工资等这样一些从一般的抽象原则来说是维护工人利益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王明教条主义者不搞调查研究，脱离苏区实际，不考虑城市乡村、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区别，不顾私营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机械地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提出了诸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2到4星期的例假、休息日发双薪、预支服役工资、补助各种津贴等许多过高的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和福利要求。这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条文推行的结果，非但不能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保护工人的经济权益，相反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高要求超过了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许多私营工商业几乎破坏殆尽，企业垮台了，工人失业了。同时，也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干扰了公营企业，使苏区工业遭到了损失和破坏。

王明的“左倾”劳动法，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毛泽东、陈云等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在1932年10月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例假、发双薪、“八小时制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个正确意见未能被王明教条主义者所采纳。陈云目睹王明“左倾”劳动政策在苏区推行的实际恶果，对贯彻劳动法后所发生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他以大量的事实批评了“左倾”政策，坚持了正确意见。

丝毫不放松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1933年4月，陈云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中指出：“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存在着极

端危险的工团主义的倾向，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工人群众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许多城市中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的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担负而迅速的倒闭，或者不问企业的工作关系，机械的实行8小时与青工6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这种‘左’的错误，可以使许多企业作坊的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所以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是破坏苏区经济的发展，破坏工农的经济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自己彻底的解放。”接着，文章分析了工团主义倾向的危害，指出这种“左”的错误容易被资本家利用来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工会的领导，实施对苏维埃政权的总工。文章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工人在经济斗争中产生的“左倾”错误的根源，指出这是由“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和思想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所造成的，尤其重要的是，陈云并没有停留在对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倾”错误的批评上面，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切中时弊地提出了纠正这一错误的措施。首先，要教育工人放开政治视野，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最密切的与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联系起来”；其次，党与工会必须“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各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企业的实际情形，规定适合这个企业的经济要求”。比如：在某些企业的工作关系上，不能机械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如木船等），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不能船驶到中途便停下来。各企业要根据工作的具体环境订出切合时宜的条文。文章认为：“党与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结群众于我们的周围。”同年8月6日，陈云针对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出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病，又严肃指出：党与工会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忽视工人利益，反对脱离群众的倾向，“反对在工作转变中没有气节的对于困难投降的倾向，同时丝毫不放松纠正经济斗争中‘左’的倾向，反对一切命令强迫群众的方式，因为这种‘左’的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面。”本来，“左倾是右倾的影子”（斯大林语）。然而，在当时的中央苏区，动辄批判的是所谓“右倾”，而实际上广泛存在的“左倾”却是人们讳莫加深的。在这里，陈云却旗帜鲜明地指出“左倾”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面”，从而批判了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潮。

纠正“左”的倾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要耐心的说服。陈云不仅在思想路线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身体力行，亲自纠正左倾错误，解决实际问题。1933年6月，陈云在汀州工作期间，发现福建省工联、汀州市工会普遍存在一种“忽视工人利益”、“空讲原则不去联系实际”的倾向，一小部分工人由于失业或半失业造成生活不安、粮食困难等原因，对工会提出的“停止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的做法不甚满意，工会企业却以“命令”、“举手赞成”，的办法通过一切。陈云认为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批评了那种“不去了解工人情绪，没有耐心的说服工作”的做法。陈云亲自找党员和工人谈心，把他们“任何细小的怀疑与不满，统统解释了与实际的解决了”，有时同一个工人做说服工作，甚至“花了十一点钟”。陈云在《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这篇文章中，深有体会地写道：“纠正‘左’的倾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不是容易的

事。如果没有耐心的说服工作，没有充分准备工作，没有去解除工人实际上所遭遇的困难，一切企图用‘命令’的方式来通过一切，这实际上丝毫不能解决‘左’倾的错误，而且在工人中间，可以发生更坏的不满意工会领导的情绪。”

由于毛泽东和陈云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同志的抵制和批评，以及“左倾”劳动政策在一年半的实践中对苏区经济所造成的危害，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逐步认识到“大城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这个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有害处没有好处。”于是，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8次例会上，决议修改劳动法。经过反复讨论，于1933年10月15日重新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宣布1931年12月1日颁布施行的原劳动法作废。新劳动法修改和废除了某些脱离苏区实际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的条文，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左”劳动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对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工明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笼罩根据地的迷雾中，陈云在政治上头脑清醒，力排错议，敢于和毛泽东一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根据地农村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立场，一切从实际出发，忠诚地为苏维埃事业进行不懈地斗争，这种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

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从事苏区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一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二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对此，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并大声疾呼：“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陈云在苏区工作期间，同样也始终把握着这个出发点，思虑做经济工作的具体途径。特别是在当时“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往往容易产生忽视和轻蔑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的倾向。陈云却能时刻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在经济工作中既能顾全革命战争的大局，又能以人民利益为重，脚踏实地，讲求实效。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1933年六七月间，陈云在苏区农业工会召开的两次基层支部会议上，发现有的巡视员在工作报告中无视农业工人的实际生活困难，向农业工人一口气提出了加紧查田运动、扩人工人师、经济动员退还公债谷票、发展农具生产合作社、工会经费的统一等7大任务，让工人们讨论。但工人沉默不语，只是说：“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有饭吃。”“区政府还是要我们交土地税，这件事请上级想想办法。”陈云认为这样不分轻重缓急乱说一气的做法，是领导方式的“大忌”，只会使下面同志感到“你们是外来人，不了解我们实际情形与困难”，“上级是打官话的”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及时提出农业工会“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提出工人所迫切的要解决的问题”。在工人已经提出了自己两个要求——没饭吃，要求免土地税——的时候，要善于引导大家抓住这两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解决的办法。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拿注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全盘工作。”

(11)陈云坚定地呼吁：“职工会对保护工人日常利益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但是过去重要，今天也是重要，而且将来以至永久是重要。只有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愈好，愈能够使群众了解‘左’的错误的实质”。

(12)多么精辟的论断，多么深邃的眼光，这种远见卓识真是难得！

实现给群众看。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残酷的破坏，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和经济上的过“左”政策，造成根据地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其中以粮食短缺最为突出，不仅红军缺粮，群众也很吃紧。为了战胜粮荒，保证军需民用，中央政府及其粮食系统的同志把主要精力投入了收集粮食的艰巨斗争。1934年2月2日中央召开了粮食会议，对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作出了具体部署，但是，在这个会议的纪要中忽视了在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同时，如何考虑群众的生活安排，因而在收集粮食运动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群众积怨甚多。据此，陈云体察民情，极力支持实行粮食调剂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困难。他强调指出：“收集粮食正因为不仅保证红军给养，而且是改善群众生活的一个工作，因此在群众中间不仅要组织粮食合作社，而且要把粮食合作社实际的成立起来，……把运输调剂的工作组织起来。实现给群众看，粮食调剂对于群众实际生活的改善，用事实来说明合作社对于有多余谷子的群众可以得到高价卖出，缺乏谷子的群众，可以不受奸商的操纵而得到廉价的谷子。从这个工作中更加开展合作社运动。”⁽¹²⁾

不是呆板的，而是活泼的。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注重实地考察，讲究领导艺术。他认为：“要把正确的决议，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与艺术的领导方式。”⁽¹³⁾他曾于1933年7月亲自指导汀州市京果业订立了一个“有弹性”的劳动合同。在此以前，陈云了解到，中央苏区的职工会过去虽然领导工人与雇主订立了许多合同，但是很多合同的条文，都是照抄劳动法与江西、福建两省工会所发斗争纲领，所以各地大半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时间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合同的条文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形，没有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而是凭着工会工作人员的脑筋“想出来的”。陈云在指导汀州工人订立合同时，深入实际，打破常规，采用了如下办法：第一，首先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形和工人的要求。陈云找到两个工人党员，详细地询问了汀州京果业的营业情形、利润、上半年合同的实行情况以及工人对订合同的意见与要求等。经过这样的考察，掌握了汀州京果业大量的具体的第一手材料。第二，以党的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陈云依靠党的组织迅速打开局面，并且做过细的工作。他先后召开和参加三次京果业党的支部会议。首先传达了“五一”大会对于纠正“左倾”与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的精神，并“诚恳的要求”与会同志“把每个细小的怀疑提出讨论”；然后组织大家对上半年所订合同的执行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找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条文，提出了对于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等的具体意见；在广泛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要求的基础上，选举了“五人签订合同委员会”，作为领导工人向每家店铺老板签订合同的权力机构，第三，订立切实可行的“有弹性的”合同。这种合同签订后，符合京果业的实际情形，没有超过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同时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实行的切实保证。正如陈云所说：“我以为这是很实际的”。⁽¹⁴⁾例如：“对于第三条八小时工作与第四条星期日休息的两个条件上，不是呆板的而是活泼的。”⁽¹⁵⁾工人可以按照每日店内营业时间的忙闲（忙时在闲时休息）每日平均计算不超过及不少过八小时工作。这正是估计到商店营业上特殊的情形，既坚持了工人的正当权益，又切合企业的实际状况，灵活机动，富有弹性，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必须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为了组织和调动工人参加经济斗争的积

极性，发展苏区经济，陈云针对党与工会在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发表了《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严肃指出：十分严重的现象表现在工会脱离自己的下层群众，在工会的日常工作上不能反映出下层群众具体的情绪，从执行局、省工会直到有些县工会不了解下层工会的实际情形。因此，他提出党与工会“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必须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必须坚决反对只有决议没有执行的具体步骤的倾向，坚决反对脱离下层群众的现象，心须使工会机关面向支部，深入到工人支部中去，要冷静的估计各地方不同的情形，去抓注可以开展工人积极性的一个基本环子，组织工人积极性于工会领导下。”⁽¹⁶⁾陈云指出，这是保证工会完成自己任务的“重要前提”。为此，陈云要求各级工会多做实际工作，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各方面保护工人经济利益，依据工人群众要求与生活程度，估计企业的力量签订合同，救济失业，建立社会经济部工作，反对资本进攻，发动工人去参加与领导经济建设，巩固各级苏维埃政府。“只有反对了肃清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有了这种下层工作活跃的前提，才能克服工作的落后。”⁽¹⁷⁾

总之，陈云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对于如何做好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很好的见解。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温陈云在中央苏区的重要著作，备感亲切。

(余伯流)

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苏维埃中国》，1931年12月。

刘伯承同志回忆录，1962年7月。

陈云：《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斗争》第9期，1933年4月25日。

⁽¹⁷⁾⁽¹⁸⁾陈云：《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斗争》第23期，1933年8月22日。

⁽¹²⁾陈云：《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苏区工人》第3期，1933年6月30日。

洛甫：《五一劳动节为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10期，1933年5月7日。

⁽¹¹⁾陈云：《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斗争》第18期，1933年7月5日。

⁽¹³⁾陈云：《为收集粮食而斗争》，《斗争》第45期，1934年2月2日。

⁽¹⁴⁾陈云：《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

⁽¹⁵⁾⁽¹⁶⁾陈云：《怎样订立劳动合同》，《斗争》第18期，1933年7月5日。

实事求是的楷模

陈云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他一贯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就是大家熟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9个字。陈云曾在中央苏区战斗、工作过。他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等职，在这期间，他和毛泽东等同志一道，为巩固和建设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卓越的工作。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直提倡和实行对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一直同脱离实际，只从主观愿望出发，只从本本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他的求实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陈云一贯注重实际，每当解决重大问题之前，他都要全面了解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然后反复比较，做出符合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1933年1月，陈云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正值施行1931年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劳动法的施行，工人的生活有了部分的改善，工人的积极性也有了提高。然而这一劳动法，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因为劳动法虽然提出了反对无故解雇工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等维护工人利益的条文，但由于王明教条主义者不调查，不研究中国国情，脱离实际，只知道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不考虑城市乡村、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区别，不顾私营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提出了脱离实际的许多过高的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和福利要求。从执行劳动法的一年多情况来看，职工会领导工人与雇主虽订立了许多合同，但很多合同的条文都是照抄劳动法，大半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没有企业的特殊性，没有时间性；有些合同的条文，连工人也感觉到难于实行，如合同机械规定店员和木船工人8小时的工作制和星期日休息等。这就影响了工人积极为合同的每一条文的实现而斗争。在苏区内，由于机械地执行劳动法，还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倾向，影响了工农联合，使苏区的经济衰退，生产力下降，工商业凋零，部分工人失业。

鉴于上述情况，陈云带着怎样订立合同这个问题，于1933年6月到汀州考察。他首先找到两个党员详细了解在京果业的营业情形，生意利润；上半年订的合同执行情况，工人对于企业在现在情况下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考察，陈云亲自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对企业情况和工人情绪有了大概的了解。

为加强支部对工人订合同的领导，以党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陈云在京果业亲自召开了3次党支部会议。在第一次支部会上，他详细地给党员解释“五一”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左倾”的决议及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条文，消除疑虑，直到统一大家对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的认识。第二次党支部会，党员报告各店上半年签订的合同执行情况，大多数党员对工资、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例假、社会保险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致主张修订出一个临时性的合同。在陈云的引导下，支部集思广益，把党员提出的意见，归纳为六七个主要条文，由党员到工人中征求

意见。第三次支部会，根据支部提出的意见，并考虑工人群众的要求，拟定了合同的条文，党员再一次分头征求工人意见，然后经过京果业工会支部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合同的条文。就这样，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汀州京果业订立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合同。陈云亲自到汀州考察，领导帮助京果业工人订立劳动合同，那种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科学求是的态度，为苏区内订立合同作出了榜样。

摆事实，讲道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1933年3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党和政府发出扩大红军的号召，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5月1日，临时中央提出：以红五月力扩大红军的冲锋日，要扩大红军1万人，6月、7月两个月，每月扩大6000人，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领导群众来完全实现的切身任务。于是，根据地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扩大红军高潮。

1933年夏，蒋介石总结其历次军事“围剿”失败的教训，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策划进行第五次“围剿”。经过半年的准备，共调集100万军队，并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红军。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有8万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也比前有了发展，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严峻。6月6日，苏区中央局又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全总苏区执行局加快了创造工人师的步伐，1933年8月1日，在瑞金正式成立红军工人师。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于8月5日在瑞金成立少共国际师。8月7日，中央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召集10县地方军事干部会议，研究扩红等问题。会后，各县代表订立8—11月扩大红军及归队竞赛条约，决心以“冲锋的精神”来完成任务。

根据地自5月开展扩红运动以来，红军增加了5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体现了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和人民力保卫苏维埃政权，开展革命战争而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但在扩红运动中，也有少数干部却表现出消极情绪，他们看不清形势，惧怕困难。干都县岭背区突击队队长谢绍武就是这样。他担任突击队长的岭背区，一个月扩大红军26名，归队7名，逃跑的倒有10名，淘汰的2名，是干都县突击扩红运动中落后区之一。对此，陈云于1933年12月21日写信严肃地批评了谢绍武。但是，谢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于1934年1月4日写信给陈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说明自己不但没有错误而且工作很好，完全拒绝陈云对他的批评。为了帮助谢绍武提高认识，也为了教育大家，1934年1月7日，陈云又一次写信给谢绍武，在信中摆事实，讲道理，对他的错误作了尖锐的批评。

陈云在信中指出：“考察一个同志是否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是否为这个路线而斗争，不是在心头上，也不容许空调的辩驳，而要在实际工作上来回答。”陈云还指出，干都县岭背区的工作落后，不是群众不好，不是全区各个组织不好，也不是所有突击队员不行，关键是因为谢绍武思想方法和领导方式存在问题。他们扩大红军不是根据中央政府的训令和中央局的指示，以深入的政治动员为基础，而是敷衍塞责，向困难投降，“去找支书找不到时，也不愿意找支部中其他同志，回来区时即说召集不到。”陈云还批评谢绍武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正确看待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把扩红任务没有

完成好推到客观原因上，不从自己主观方面检查，对在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出现的动摇、消极怠惰等，不开展思想斗争。由于上述原因，因而影响了于都县岭背区扩红任务完成。为了保证扩红突击任务的完成，在群众中首先是在干部中克服谢绍武等人的错误影响，是于都县乃至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广泛开展的前提，因此，陈云要求谢绍武将此信公开。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由于批评揭露了谢绍武的错误，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只有坚定信心，肃清消极影响，才能完成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中扩大红军的重要任务。随后，苏区内又一次掀起扩红高潮。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在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国民党对苏区封锁破坏，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使苏区本来就困难的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缺粮成了影响革命战争胜利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 17 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收集粮食，保证红军的给养，对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党中央和全苏大会主席团于 1934 年 1 月 23 日作出决定，动员全党、政府和一切群众组织进行收集粮食来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

然而，决定下来后，一时收效不大，“全中央苏区已收到的谷子，还只有 150 万担，许多县份收到的谷子还不到十分之一”。陈云作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思考着这个问题并作了调查研究。他在调查中了解到，粮食收集下道，并非因为群众不愿意交谷子，是由于：“（一）当群众承认了推销了公债以后，许多地方是没有立即进行收集谷子……许多地方收集公债谷子的工作，是相当的停顿了。（二）由于在一些地方反革命分子对于收集公债谷子的阻挠破坏，我们没有及时开展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三）许多地方借口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没有做深入的鼓动群众，为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热忱来迅速交纳公债谷子，来克服这些可能克服的困难。”

分析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陈云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分析在找到粮食收不到的原因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首先，他除考虑群众的积极性这个因素外，根据各县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最落后的县，2 月底要完成收集粮食任务；未交粮食数量又最多的县，如于都等县要力争 2 月底完成收集粮食任务；已经收到较多的粮食的县，如兴国等县要在一星期或两星期内完成收集粮食任务。根据当时收集粮食工作的实际，陈云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一）要派最得力的突击队到收集粮食任务重的县去突击收粮。（二）在收集粮食中，既要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还要做过细的深入的思想工作，提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响应中央号召，积极交粮。反对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做法。（三）对于公开或隐蔽的故意曲解，强迫命令、制造群众对苏维埃怀疑不满，吞没和挪用群众已交的谷子，自己营私利；对于乘机抬高价格，破坏群众依照政府定价交谷，阻挠收集粮食运动的奸商等要予以打击。镇压“破坏收集粮食运动的阶级敌人。”（四）组织粮食合作社。使粮多粮少的地方互相调剂，时多时少、时贱时贵的现象得到解决，打击奸商的不法活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由于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从苏区各县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各县实际

收集粮食状况出发，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重要意见，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收集粮食工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使收集粮食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得以顺利进行。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开展工作

列宁在谈到斗争方式问题时指出：“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立脚点。”陈云也一贯提倡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开展工作。他指出：“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他对白区工作很重视，不仅亲自给白区布置任务，而且要求他们注意工作方法。如他要求白区党组织，在发动和领导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减捐减税，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抽丁筑路等日常斗争中，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是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斗争的口号”，提出的口号要“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到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

对在被敌人占领的区域中开展游击战争，陈云也十分关注。在被敌人占领的区域中，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以保卫苏区，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创造新区。然而，1934年以来，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却一度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挺进游击区域的游击队，非但队伍缩小，而且经常退回苏区。有些游击队在游击区域中坚持活动，也还没有发动当地的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游击区域中游击队和党的活动还没有给前进的敌人以极大的困难，还没有起吸引敌人到自己方面和阻止敌人前进的应有的作用。”对此，陈云指出，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没有开展起来，首先是思想认识上，一部分人对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把发动游击战争作为党的第一等任务。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没有最适当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去担负游击区域的领导，没有发动群众，“秘密支部甚至脱离群众”，在游击区域中照搬苏区的斗争方式。因此他强调，要开展游击战争，除了要提高对开展游击战争重要性认识，注意游击区域的组织方式，还要注意斗争方式。在斗争方式上，要运用适应环境的工作方法去发动群众，“要改变把中心苏区所用的发动群众的方法一成不变地拿到游击区域去运用的做法。必须善于去了解各种环境的不同。善于采取适合于当时当地的环境的工作方法。”⁽¹¹⁾在游击区域中，要提出群众眼前迫切要求的口号，如反对国民党白军杀人、强奸、抢劫，反对地主催租逼债、牵牛牵猪等等眼前不能忍受的压迫和剥削。而不能机械地像中央苏区那样进行“扩红突击”、“借谷运动”，否则是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其结果也只能是“劳而无功”。

深刻的分析、纠正了一些同志对游击区域中开展游击战争的错误认识。

从而也使我们再次看到陈云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从陈云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可以看出陈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始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他为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掌握真实情况，从而进行正确决策，指出了切实可行之路。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堪称一代楷模。

（黄益姣）

注：

《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第9期，1933年4月25日。

《陈云同志给谢绍武同志的信》，《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26日。

陈云：《为收集粮食而斗争》，《斗争》第45期，1934年2月2日。

列宁：《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陈云：《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1934年6月7日。

(11)陈云：《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1934年9月14日。

